



孫德成

毛泽东

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卷

毛泽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萍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张秋人的信	3
(1923年1月24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子玉先生电*	4
(1923年2月20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衡珊先生电*	5
(1923年2月20日)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	6
(1923年2月)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	7
(1923年2月)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	8
(1923年3月7日)	
《新时代》发刊词	10
(1923年4月10日)	
外力、军阀与革命	11
(1923年4月10日)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15
(1923年4月10日)	
给孙中山的信	17
(1923年6月25日)	

农民问题议决案	18
(1923年6月)	
省宪下之湖南	21
(1923年7月1日)	
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	32
(1923年7月2日)	
北京政变与商人	33
(1923年7月11日)	
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上的建议	37
(1923年8月5日)	
“省宪经”与赵恒惕	38
(1923年8月15日)	
纸烟税	40
(1923年8月29日)	
英国人与梁如浩	42
(1923年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45
(1923年9月6日)	
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	46
(1923年9月28日)	
贺新郎·别友	49
(1923年)	
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联	55
(1923年)	
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的讲话	59
(1924年1月29日)	

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四项议案	60
(1924年2月9日)	
给民智书局的信	65
(1924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66
(1924年4月19日)	
给平民教育委员会诸同志的信	68
(1924年5月26日)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69
(1924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	71
(1924年8月31日)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72
(1924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76
(1924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	77
(1924年9月25日)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	78
(1924年9月27日)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79
(1924年11月1日)	
挽陈子博同志联	81
(1924年)	
题安源工会联	82
(1924年)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85
(1925年10月20日)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	94
(1925年10月26日)	
在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	95
(1925年10月27日)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96
(1925年11月21日)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99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105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07
(1925年12月1日)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17
(1925年12月4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120
(1925年12月5日)	
三三三一制	124
(1925年12月5日)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126
(1925年12月5日)	
如果讨赤志同仇讐亦吾良友	127
(1925年12月5日)	
颂声来于万国	128
(1925年12月5日)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129
(1925年12月5日)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130
(1925年12月5日)	
邹鲁与革命.....	131
(1925年12月5日)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132
(1925年12月13日)	
向左还是向右?	133
(1925年12月13日)	
赤化原是如此.....	135
(1925年12月13日)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	136
(1925年12月13日)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137
(1925年12月13日)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143
(1925年12月20日)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145
(1925年12月20日)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146
(1925年12月20日)	
右派的最大本领.....	148
(1925年12月20日)	
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	150
(1925年12月26日)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52
(1925年冬)	
沁园春·长沙	160
(1925年)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175
(1926年1月1日)	
宣传报告.....	182
(1926年1月8日)	
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	191
(1926年1月10日)	
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	192
(1926年1月10日)	
关于宣传决议案*	198
(1926年1月16日)	
关于党报决议案.....	202
(1926年1月16日)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07
(1926年1月18日、19日)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217
(1926年1月19日)	
宣传报告决议案*	220
(1926年1月)	
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电.....	222
(1926年2月14日)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224
(1926年2月28日)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226
(1926年3月18日)	
《国民运动丛书》书目	230
(1926年5月19日)	
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	234
(1926年8月14日)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235
(1926年8月)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247
(1926年9月1日)	
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	252
(1926年9月16日)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259
(1926年10月25日)	
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264
(1926年10月27日至28日)	
挽罗宗瀚烈士联	266
(1926年10月)	
目前农运计划	267
(1926年11月15日)	
湖南的农民*	269
(1926年11月30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280
(1926年11月)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88
(1926年12月20日)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291
(1926年12月)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297
(1926年12月)	
在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341
(1927年1月4日)	
和农协干部的谈话	344
(1927年1月)	
在询问唐家圫农民运动情况后的谈话	345
(1927年1月)	
土地问题草案	346
(1927年)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349
(1927年2月12日)	
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	353
(1927年2月1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	357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362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	367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370
(1927年3月)	
给省农民协会的信	373
(1927年3月14日)	

农民问题案	375
(1927年3月16日)	
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致辞	381
(1927年3月18日)	
对农民宣言	386
(1927年3月19日)	
中央农运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391
(1927年3月26日)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	393
(1927年3月26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96
(1927年3月)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434
(1927年3月)	
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441
(1927年4月9日)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43
(1927年4月12日)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444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447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448
(1927年4月22日)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报告的补充说明	450
(1927年4月22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关于讨蒋通电	452
(1927年4月)	
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	455
(1927年4月)	
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457
(1927年4月)	
土地委员会报告	459
(1927年5月9日)	
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	463
(1927年5月26日)	
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	464
(1927年5月29日)	
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欢宴会上的开会词	468
(1927年5月31日)	
全国农协致陈嘉佑电	470
(1927年5月)	
全国农民协会要电六则*	471
(1927年5月)	
菩萨蛮·黄鹤楼	474
(1927年春)	
农运策略*	478
(1927年6月1日)	
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	484
(1927年6月3日)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487
(1927年6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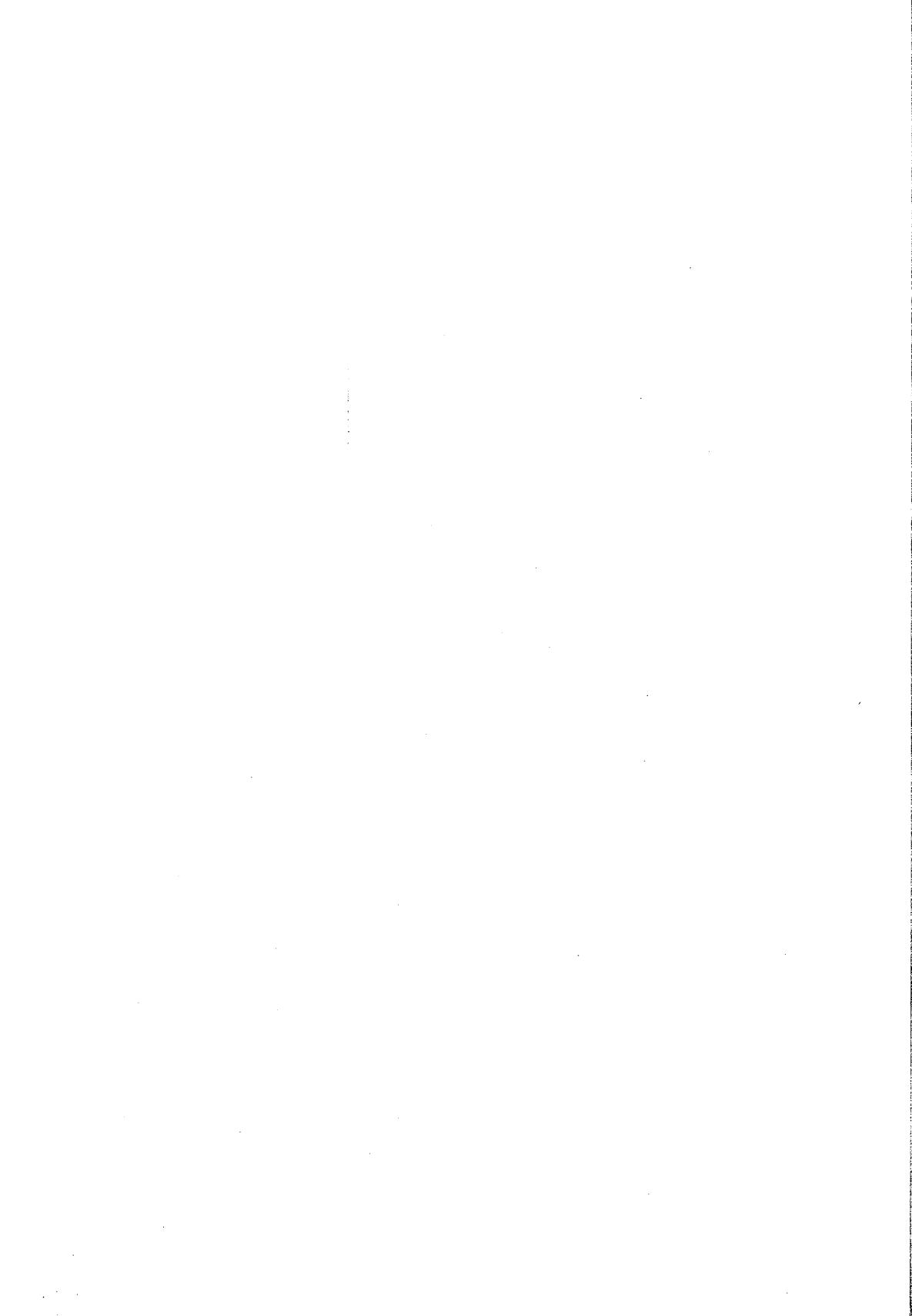
目 录

全国农协请颁布乡村自治条例*	491
(1927年6月7日)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496
(1927年6月7日)	
全国农协最近训令	499
(1927年6月13日)	
农运策略的说明*	501
(1927年6月14日)	

1923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发言》（油画）



给张秋人的信^[1]

(1923年1月24日)

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2]。

[1] 这是毛泽东致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信的部分内容。

[2] 1923年1月25日，张秋人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近日空气很恶，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为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恶之。元旦日把CY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亦大惊小怪了！湖南已挂着自治招牌，关于运动方面，理应自由些，我此去当与子任兄一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子玉先生电*

(1923年2月20日)

洛阳吴子玉先生鉴：

京汉路工以要求集会结社自由，惨遭死戮三百余众，近世文明国家所未闻也，国家养兵，所以卫民，今以残民，北起长辛店，南迄武汉，杀声遍地，冤呼震天，先生安坐洛阳，指挥若定，金口掘堤，重庆犯顺，方之是役，犹未为勇。吾闻古有民变，今则工变。俄罗斯工变矣，数百年盖世威棱之尼古拉斯，一旦如摧枯拉朽。如德如法如意大利，旦晚有事，其军阀政客资本家悉属尼古拉斯第二。先生力抗皖奉，国人尚存好感，然遽谓吾拥直鲁豫湘鄂正副巡阅使之尊，人莫予毒。则国人鸣鼓而攻，将随此念以俱至矣。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二十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衡珊先生电*

(1923年2月20日)

武昌萧衡珊先生鉴：

先生指挥所部，杀路工三十二人，冤惨所中，江水为寒矣，先生狐也，假吴子玉虎威以临江汉，鱼肉人民，再接再厉，一战而胜京汉路工，何其勇耶。世曰劳工神圣，先生必曰军阀神圣，以武汉近事观之，军阀则诚神圣矣，然吾闻世有杀不绝之劳工，未闻有杀不绝之军阀，先生试思先生之左右，除百数十师旅团长镇守使警察长如万恶不赦之杜锡钧、何锡藩等辈而外，何一而非吾劳工阶级同志耶，今日兵士实弹以杀劳工者，明日吾劳工挥泪一为指点，便可反戈以杀军阀，先生则曰乱党，而岂知遍地皆乱党，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属乱党也。不务得民，而务残民，不惟自省，而惟多杀，怨愤所积，铤而走险，枯木朽株，尽起为难，天地虽宽，将无先生立足地矣。特进忠言，诸维善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二十日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

(1923年2月)

全国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及各报馆、各团体均鉴：

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长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伤者无数，同时枪毙工界首领施洋、吴汝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联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清此人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公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噍类矣。临电神驰，不胜盼祷！

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

(1923年2月)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鉴：

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惨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在同胞睹此背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彻，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湖南全省工团会叩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

(1923年3月7日)

光亮^[1]兄：

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2]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3]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4]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

文化要劳动史^[5]四百本，请速照发。

弟 子任

三月七号

[1] 光亮，即施存统。1922年5月至1923年8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2] “全国大考”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原计划在湖南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时局恶化，改于1923年8月在南京举行。

[3] “教务会议”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

[4] “西校大会”是代号，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 文化，指长沙文化书社。劳动史，指施存统编著的《劳动运动史》，该书于1922年4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行。

志光之：
才子莫作私刻！全国青年在
内事行此固有其名流解决
公力。然初生之月宜在肩而
乘肩底，即在腰板上空也。此
立身之本，请勿为！
毛泽东
青年团中央
的青年情况
的青年情况

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的手稿。

《新时代》发刊词

(1923年4月10日)

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的机关报。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虽然自修大学创办伊始，同人的理想还在试验时期，将来成绩如何，不能预告，但是这出发的目标，自信非常正确，若凭着那种精神和志气做去，必有成功的希望的，本刊便是一个试验的标准了。

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外力、军阀与革命

(1923年4月10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1]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2]，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适、黄炎培^[4]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

[1] 张绍曾（1879—1928），河北大城人。当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曾主张迎孙中山进北京协商南北统一。

[2] 进步党，1913年5月由民主党、共和党等合并组成，拥戴袁世凯，同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相对抗。1913年9月，该党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1913年和1914年，袁世凯先后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该党自行瓦解。

[3]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被称为研究系。

[4]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办事部主任，主张“使无产者有业，使有产者乐业”，提倡手脑并用，注意实践。

云台、穆藕初^[1]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2]（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

[1] 聂云台（1880—1953），湖南衡山人。清末继承其父聂缉楨的事业，任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建吴淞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穆藕初（1876—1943），上海市人。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担任经理或总经理。1922年赴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任首席代表。后任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

[2] 直、奉、皖是北洋军阀的三大派系。直系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得到英、美的支持。奉系是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天省（今辽宁省）军阀集团，1919年在日本支持下，控制整个东北。皖系是以段祺瑞、徐树铮为代表的安徽省籍军阀集团，投靠日本。

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1]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2]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3]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

[1] 华盛顿会议，指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代表1921年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2]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分别致送英、法、德、日、意、俄的照会中首次提出：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也要在一切“势力范围”内取得通商自由，享受低税率和一切特权利益。1900年7月3日海约翰再度照会六国政府，主张把门户开放政策应用到“中国一切地方去”，以分沾侵略利益，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共有的半殖民地。后来，美国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作为它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独霸中国的外交手段。

[3] 白狼，即白朗，人名。1912年在豫西聚众反对袁世凯的统治。1913年夏，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进军豫鄂皖边境，于1914年改称“公民讨贼军”。老洋人，一说为李鸣盛，一说为张庆，又名张国信。1922年10月27日，老洋人率万余人联合一部分赵倜旧部在豫西起事，称建国军援豫军。

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1923年4月10日)

(一) 我们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人设的，是由一些有学问兴趣的学生感于现时教育制度不好，要合古时书院现时学校两样之长，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基于这个意义之上设的。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其实努力才能断定他有没有好成绩。但我们极愿得到许多有志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

- (1) 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
- (2) 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 (3) 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 (4) 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
- (5) 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 (6) 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的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

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 (二) 入校者每月须照交伙食费、杂费及学生费。
- (三) 入校后有投稿本校月刊的义务。
- (四) 入校后有服从本校公约的义务。
- (五) 本校为经济所限，目前采完全自修主义。凡自揣无自修能力者不必入校。

给孙中山的信^[1]

(1923年6月25日)

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 1923年6月25日，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农民问题议决案

(1923年6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开幕。图为会议旧址。

第三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決議案及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

二二二二年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图为《中共三大决议案及宣言》。

省宪下之湖南

(1923年7月1日)

省宪下的湖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湖南人恐怕知道的很少。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新近发生的劳动运动，若说详细，不是一篇短文可了，简括地叙述大略如下：

(甲) 政治

(一) 省宪 省宪之议自湖南始，至今也只有湖南有省宪，这原因是很寻常的。湖南介于南北之中，经汤乡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北洋派武力的蹂躏，人民恨北派武力至深。及谭赵湘军驱逐张敬尧，适值北方直皖两派开始分裂之时，乃有省自治省宪法之议，这完全是北洋武力的反响。湖南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在人民不愿，在军阀更不愿，结果成为军阀利用民意借省宪以自保全，故省宪仅为在湖南这不利的地势上一个弱小的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兼有几省强大的军阀如吴佩孚固然不要省宪，张作霖也只要自治不要省宪，即力量弱小但因地形僻处不甚怕别人侵略有时还想就军饷于邻省的军阀如唐继尧也不要省宪。故省宪只在湖南这个地方有出现的可能。然也万难长命，因省宪虽以时机的关系得侥幸御外患于一时，但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如湖南省宪规定军费缩小至岁出三分之一，现在预算不能照省宪规定已有不能不撕破省宪之势；加以谭派与赵派相争，事实上一定要迫令一派勾引外兵

争此位盘：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联省自治更是万无实现之望的东西。

(二) 政派 谭延闿、赵恒惕、林支宇分为三派。谭派的民康社、赵派的民新社、林派的湘社为他们的政党。林派在军事上无势力，仅有一组卑污政客为牟利的目的而结合，伺谭赵两派的盛衰以为趋避，三派中最为下品。赵派现在当权，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建设在南北相持中吴佩孚的威劫和恩养上面（省宪也建设在这个上面），故虽军事势力不及谭派而能持久不倒。谭派失势已三年，然在军事上尚有大部分势力，近来投入国民党，欲仗孙中山援助恢复政权，和赵派争斗异常剧烈。此外政学系则依附赵派以谋福利。

(三) 政府 本年一月依省宪产生的新政府，分内务、交涉、财政、实业、教育、司法、军务七司。七司司长统于省务院长，俨然责任内阁，省长则一虚设的总统。省长赵恒惕、省务院长李剑农、内务司司长吴景鸿、交涉司司长杨宣诚、财政司司长袁华选、实业司司长唐承绪、教育司司长李剑农、司法司司长徐钟冲、军务司司长李石文，这就是政府的组织。

(四) 议会 政府由议会选举，故议会颇有力，议员的来源完全由金钱买卖。其类别官僚一部分，滥绅一部分，政客一部分。其党籍三分之二属赵派，三分之一属谭派及林派。这次湖南新省议会，充分表现了贪鄙、专横及愚蠢，舆论恨他们入骨。

(五) 军队 现有军队二师五旅。其组织及分布大略如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第一旅旅长贺耀祖，团长郑鸿海、谢煜焘，驻常德及益阳。第二旅旅长唐生智，团长刘兴、李品何，驻常德。骑兵团何健，驻桃源。炮兵团黄耀祖，驻常德。又汪磊一团亦属第一师，驻郴州。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第三旅旅长刘硎，团长叶琪、袁植，

驻南县及湘潭。第四旅旅长唐荣阳，团长唐生明、唐振铎，驻澧县及石门。骑兵团唐希忭，驻湘潭。炮兵团戴岳，驻长沙。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团长蒋锄欧、刘重威、邹鹏振、朱耀华，驻长沙、醴陵、湘阴一带。炮兵营尹甫龄，驻长沙。衡阳镇守使兼混成旅旅长谢国光，团长谭道源、成光耀、刘雪干，驻衡阳、桂阳、永州三县。宝庆镇守使兼混成旅旅长吴剑学，团长吴家铨、张湘砥，驻宝庆及武冈。沅陵镇守使兼第九旅第十旅旅长蔡钜猷。第九旅旅长刘叙彝，团长何隆干、谭润生，驻湘西之黔阳、洪江。第十旅旅长田镇藩，团长彭寿恒、杨毓棻，驻湘西之辰州及黔阳。此外尚有陈渠珍所部驻湘西，保靖、乾县、镇筸、绥静各处之巡防营十余营，夏斗寅所部驻浏阳之鄂军一团，王得庆所部驻永州之宪兵一营。总计湘军人数共约四万。内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三派属赵恒惕派，叶开鑫之混成旅数近一师，号称赵派的主干。鄂军夏斗寅一团中立。其余均属谭延闿派。湖南因系瘠省，又无兵工厂，所以不能多养兵。兵不甚多，则军饷难不足，而尚可勉支一时，不至发生重大事变，与四川、云南等省养兵过多有时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不同。故湖南只要别人不来侵略，自己亦无须侵略别人，所谓门罗主义的省自治，其内的经济的方面，乃建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得保有二三年生命，以至于今。

(六) 财政 湖南岁入共千四百万元（国家地方均在内），截留应解中央之国家税为省用，此亦省自治之一个经济的动因。依省宪规定军费占三分之一，教育费占三分之一，行政费占三分之一，这是新预算，尚未实行，也万不能实行。财政系统紊乱已极，政府直接收入只有省城一点税捐，及榷运局、造币厂二三机关的收入以度日。外县从田赋以至，切正杂税捐，大部分均被军人就地截用。

故财政不能整理。军费，以至行政费、教育费，以前积欠甚多，无法清偿。旧债不清，更无整理办法。赵政府谋借外债，又被谭延闿派多方破坏，数次无成。湖南业已四年无事，这四年中以全省之财力，养尚非巨额之军队，济之以军队私抽之鸦片烟税，故能勉强相安无事。今则承平稍久，军队之欠饷暂多，搜括已穷。借债又无着，而军队一人不能裁，赵政府之财政基础现在已很薄弱，倘谭派乘虚进击，赵非变到投降吴佩孚，则必须倾倒无疑。

（乙）经济

（一）工业 湖南境内全部在手工业时代，除省有第一纱厂及官营水口山铅矿，商营锡矿山（新化）、铅矿外，无他较大的产业可指。商营小矿颇不少，小规模炼铅炼锑厂设立颇多，但资本极小，欧战后铅锑砂价又贱，故营业甚不振。第一纱厂系官有资本（二百万元），租商开办，营业活动资本不及二十万，但营业情形尚好，股票价每百元值百十五元。湖南、光华两电灯公司在省城营电灯业，两公司竞争颇烈，但营业均不振（湖南较光华为好），股票跌至六十元或四十元。造币厂官办以铸轻质当廿铜元采取其余利为目的，月铸二百一十万串，可获利十五六万元。铜元价在市面每二百一十枚当银一元，害民极大，除水口山有外人小规模炼砂厂外，湘省无外人经营之业。

（二）商业 全体为小资产商业以长沙、湘潭、常德为三个大埠。外商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德又次之。四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

（三）农业 湖南山地多平原少，除洞庭沿岸略有较大规模经营之农业外，余均小资产当自耕农及佃农。佃农生活比雇工还苦，因雇工必家累少生活简；佃农则必人口甚多之家，纳租于田东，普通

东佃各半，重者东七佃三，最重东八佃二。故佃农如单靠田里收获断不够生活，全靠喂猪、种杂粮等副业为之补足。湖南前数年连遭兵祸，荒歉不少。近二三年稍稍复业。全省米产除沿湖下游一带年有一部分输出省外外，余均仅足自给，故“湖南熟天下足”的话现在并非事实。每年冬初开岳州关，春初闭关，政府利有每石一元之米捐作财政之补助。

(丙) 一般文化及教育

(一) 一般文化 小农民思想略无变动，他们政治的要求但求有清官有好皇帝。女子尚有十分之三四是小脚，惟男子辫发即僻地亦没有了。教育上大致已采用新学制，惟办学人物依旧，根本上並未有大变。最好的代表是省议会议员，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新政治制度，而言论动作，充分表现宗法社会之一切旧式样，丝毫没有变动。耶苏教、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为尤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省城有日报九家，只有大公报销数有二千三四百份。其余自一百份至五百份，内容多不成样子。

(二) 教育 所谓教育就是指学校，湖南办学的人派别最多，略纪于下：

大农派 前清高等学堂、求实书院、求忠书院三校出身之合体，因西洋留学归国者多，又名西洋派。以教育司司长李剑农为领袖，党徒之思想大半顽固，以大农学校为本营，散布教育界颇广。

优级派 优级师范出身。思想腐旧。在教育界颇得势。

高师派 本省高等师范出身。思想较新颖。

北高派 北京高等师范出身。思想在诸派中为最新颖。青年教育社为其集合体。

高工派 前清高等工校及现在工业专门出身。盘踞工校，议会政府均有其势力。最为顽劣。

城南派 清城南书院中路师范出身。思想腐旧与优级派等。盘踞教育会。

平大派 研究系及创造社人物易家钺、罗敦伟、张资平等组织平民大学，俨然一小派。思想在各派中算最杰出。

一师派 第一师范出身。其势力在小学教育。思想顽固新颖各半。

东洋派 日本留学生。以甲种工业学校为根据。顽劣与高工等。

君子派 此派以陈佩霖、朱剑凡、胡子靖、彭国钧等为代表。最早的日本短期师范出身。以楚怡、明德、修业、周南四校为根据。思想顽固而颇有正气，故素有君子之称。

诸派中优级为老前辈，大农人物虽老而结合则新，两派在教育界目前要称两霸。高师与优级本为弟兄行，却因地盘之分配，反脸特甚。高工、东洋近颇失势，然其潜力仍不弱。城南则鼠窃狗偷，依附赵恒惕以为活。君子一派从前清末年以迄民国八年，号称教育界之专卖，最为烜赫，民九以后各派崛起，其势稍衰了。北高、平大、一师三派号为新派，颇有结合联立战线以御旧派之势。湖南私校多于公校，各派亦多以私校为母国而以公校为殖民地。教育经费连留学经费在内数近二百万，私校例得受津贴，津贴多者至万余，少亦数千数百，是为私校发达的原因。

(丁) 劳动运动

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

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今将各种工团及罢工统计。列表如下：

(一) 新式组织的工团

名 称	组织年月	人 数	工会所在地	备 考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去年五月	11000	萍乡	组织完备颇有力
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	去年十月	3000	水口山	组织完备颇有力
粤汉铁路总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工会合组
粤汉路岳州工会	去年五月	300	岳州	
粤汉路长沙工会	去年八月	600	长沙	
造币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一月	150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
第一纱厂职工俱乐部	今年三月	1500	长沙	因与职员合组组织不甚完备但颇有力
泥木工会	去年九月	2000	长沙	力量较弱
缝纫工会	去年九月	15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力量亦弱与店主争执尚未解决

名 称	组织年月	人 数	工 会 所 在 地	备 考
铅印活版工会	去年十月	35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石印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无多力量
电气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100	长沙	组织尚未完备
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人力车工会	去年十月	185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机械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与湖南机械工会对抗而设
理发工会	去年十月	500	长沙	与店主抗争两年 颇有精神
笔业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力弱
靴鞋技师工会	去年十一月	2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力弱
碾谷工会	今年四月	500	长沙	遭官厅解散
茶居工会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无甚力量
砂船工会	今年一月	200	水口山	与水口山矿工俱乐部 连结颇具力量

名 称	组织年月	人 数	工会 所在地	备 考
铜官陶业 工会	今年二月	3000	铜官	铜官为湘省 瓦器窑业大埠 工会颇具力量

以上二十三工团总计人数约三万人

(二) 旧式组织的工团

劳工会	有两个，一为赵恒惕解散之劳工会现设办事处于上海，一为第一纱厂资本主组织之劳工会，目的欲取旧劳工会而代之
机械会	一班工业专门学生里挟少数工人艺徒所组织宾步程领袖
工业总会	省城手工业店主之团体政府所承认为法团者
中华工会	流氓陈家鼐所组织设总会于省城设分会于各县
工人同志会	造币厂宾步程派一部分工人为对抗造币厂工人俱乐部而设

以上五个工团，除工人同志会确有四百余入机械会有二三百人外，劳工会、工业总会、中华工会完全是空体，并无工人。旧劳工会在未封前有二三千人，因系各业糅合的旧法组织，故一被封便都散去了。

(三) 罢工统计

罢工者及次数	加入人数	罢工要求	罢工日期	胜败
安源矿山及株萍 铁路一次	11000	集会结社自由 加工资	五天	全胜利

罢工者及次数	加入人数	罢工要求	罢工日期	胜败
粤汉铁路二次	800	第一次加工资 驱张苗 第二次援助京汉	第一次十九天 第二次一天	第一次大部胜利 第二次失败
长沙泥木工一次	4000	加工资	廿四天	全胜利
水口山矿工一次	3000	加工资	廿三天	全胜利
长沙印刷工一次	350	加工资	十七天	全胜利
长沙纫綴工一次	800	加工资	十天	小胜利
长沙织造工一次	1500	加工资	廿天	半胜利
长沙理发工一次	500	集会结社自由 加工资与店主平分公产	廿天	大部胜利
长沙笔业工一次	300	加工资	三十五天	半胜利

共计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自由。罢工时期均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

前鋒

創刊號

本誌露布

一，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	孫鑛
二，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	瞿秋白
三，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	屈維它
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	屈維它
五，中國農民問題.....	獨秀
六，中國最近婦女運動.....	警予
七，寸鐵.....	
八，省憲下之湖南.....	石山
九，法西斯主義之國際性.....	太雷
十，近代印度概況.....	太雷

1923年，广州平民书社出版的《前锋》杂志创刊号。毛泽东以石山的笔名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1]

(1923年7月2日)

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

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1] 这是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共产国际信的主要内容。

北京政变与商人

(1923年7月11日)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上海总商会复于六月二十三日经会员大会议决，发表对全国国民的宣言，这个宣言里说：“用敢掬诚宣告中外，自本月十四日起，所有曹锟高凌蔚等因僭窃政权对内对外种种行为，凡我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除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各自维持其境内之治安以维现状外，其善后建设事宜，谨当与全国国民共谋解决。”

总商会同时议决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和上海总商会这次举动，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

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害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是军阀一天一天瘦而商人一天一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更决不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稽滑的起身炮命令所能做到的。我们再看最近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纱业公债为曹锐斯云鹏破坏，要求国家禁棉出口又为外国公使团破坏，更足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些都是上月二十三日到了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斋先生们亲自尝到的苦味！

商人们历来“酷爱和平”，未想到政治的改造需要革命，不是几个“裁兵制宪理财”的电报所能收效；更未想到革命需要自己出马，号召组织全国国民，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革命的实力；甚至以为改造政治不必需要一个政党，而怪国民党之努力革命为多事；商人们从前这些幼稚而且怯懦的心理，试将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岂不要哑然失笑？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

手，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举动看来，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得非常之快。至其对于美国阴谋侵略中国的愤恨，我们从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反对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乘我国民于民治运动奋斗期中，高唱隐含共管中国的论调，而以中国商会及银行界已予同意之谬说，建议本国政府”的文电看来，“中国商人媚外”的恶名，至少也洗去了一部分。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现在的时机是火烧眉毛尖一样的迫切，再不容我们躲懒睡觉；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更不容于商人之中还分出派别。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汉口的商人不为吴佩孚所劫持，一齐起来和上海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末了，我们还有须警告全国商人的：第一，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要实践总商会“与全国国民解决”的宣言，不要再蹈从前商教

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复辙。第二，现在商人们既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去踏上第二步，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办法，整严步法，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正；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 第六次会议上的建议^[1]

(1923年8月5日)

(一) 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 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 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1]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共5人。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3点建议。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

“省宪经”与赵恒惕

(1923年8月15日)

“……自湘西问题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令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钱买公团通电，或作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维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辈发信以工人团体为多，以为工人头脑简单，必有千余人可来，讵是日候至十时，不特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只彼辈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乃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徒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讲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请百数十人，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会幻灯场开会，一党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 和尚炽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

省宪法不如谓之省宪经，如佛家之有佛经……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 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二面———书省宪维持会———书省民请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马褂队，俨然省民代表，约二三十人；

第二队——中华工会，约五六人；

第三队——佛化讲演团，光头博衣，约四五十人；

第四队——养济院，约四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

(见民国日报)

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证。赵恒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有省宪以来——惨杀劳工（黄庞等），勒封报馆（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剥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剥夺集会结社自由（封人力车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生工人的集会），庇护其军队贩卖栽种鸦片烟，贿买选举（派遣属员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钱私造省议会，用钱买的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屡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赋（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破坏法定的预算此例减教育实业费增加军费，勾结吴佩孚萧耀南，何一不是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蔡钜猷争鸦片税（所谓特税）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纸烟税

(1923年8月29日)

我们时常说：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或者有人不相信；我们不时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现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结果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征收纸烟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六月三十一日杭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维奢侈征税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论，每岁销场竟逾千万，消耗之巨，骇人听闻，流毒之烈不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闻外商借口条约权利迭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涉；纯粹浙人所输之捐，外商又劳干预！且系国内行政主权，断不容外人侵犯，自应据理力争，勿任有所借口，主权幸甚。”

原来美英据了协定关税条约，不许中国对外来奢侈品自由抽税，任凭是“纯粹浙人所输之捐”是“国内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货，所以到底不许抽税。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向我们“亲善”到底是什么？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

(1923年8月29日)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绍唐。据陈绍唐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布梁如浩罪状说：“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梁氏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继续的租借，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交换，专谋利己。……梁氏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谋，始则托人向余疏通，饵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支将来均可代为报销，且结束后之种种利益，亦可分润。经余屡次拒绝，且仍要求其完全公开，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氏往往拍案厉声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某英人睹之大惊，向余劝阻，梁氏毫无所动也。……”

梁如浩与英人所订之威海卫草约计甲乙两部二十三条，八月二

十三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经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一) 变接收为续租 草约允许英国续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续租之权。且将历来未经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城，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续租之。

(二) 断送领土领海 草约规定 (1) 中国地方长官应换给英国原租人(永租)凭照；(2) 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续费；(3) 英国保留官地，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认。其断送领土为如何。草约又规定：(1) 刘公岛海面之抛锚所，须俟英国海军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 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派兵登岸操演打靶；(3) 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抛锚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规定，英国占领刘公岛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没于我领土领海。

(三) 断送国家主权 草约规定刘公岛威海卫间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统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真正统属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须由英国人统带，财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则由中英合组之中英委员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虚名，担负英国债务之偿还及公费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送。

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了我们的在哪里？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威海卫交还是要把威海卫变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粤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

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

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3年9月6日)

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两函均收。

兹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

出版物已嘱出版部每期赠送贵会《向导》二份，《前锋》《新青年》各一份。《工人周刊》等请以贵会出版物直接与之交换可也。

九月六日

给林伯渠、彭素民^[1]的信

(1923年9月28日)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2]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3]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4]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5]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1]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彭素民（1885—1924），江西清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

[2] 赵，指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

[3] 1923年夏，湘军内部谭延闿和赵恒惕为争夺对湖南的控制权爆发战争。当时支持赵恒惕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称为北军。

[4] 谭，指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

[5] 1921年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争夺湖北地盘进行战争。吴佩孚部前敌总指挥张福来率领军队击败湘军，攻下湖南岳州。吴佩孚与赵恒惕从各自利益出发停战议和。吴佩孚在取得驻防岳州便于控制赵恒惕的有利条件后，停止了南进。

关于本党^[1]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2]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3]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在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4]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廿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 指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毛泽东当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湖南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2] 夏希，即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省学联干事部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曾参加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3] 这里的本部，是中国国民党当时的最高领导机关。

[4] 苏中，即徐苏中。1923年曾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

東都事

此作社之帶序寄上。因極重。特別書。李仲清。易文。毛石山。空谷。寫毛澤東詩。

第十六日到長沙，時局又變化，即趨於一
三月由軍人商大張布告恢復湖南政府，此第一期事
已到手，前途尚有幾種。惟湖南現時優
勢，必以不廢物為準，若以上列堆有殘
伍，當任其殘缺，如前省張福喜等，只圖其
博取人議和而過份之餘。

毛泽东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手稿。

贺新郎·别友^[1]

(1923年)

挥手从兹去^[2]。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3]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4]，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1]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9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年底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此，本词可能作于这年12月底离开长沙的时候。当时革命形势在上升，作者“割断愁丝恨缕”而为革命事业献出全副身心的豪情，以及作者所预想的未来革命风暴的猛烈壮阔，在词中“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比喻中得到强烈的表现。

[2] 挥手从兹去，本于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

[3] 《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惨然无绪”。

[4] 过眼滔滔云共雾，云雾比喻误会。本句意为误会再大也只是过眼即逝的云雾。

人有病，
天知否？^[1]

今朝霜重东门^[2]路，
照横塘^[3]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4]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5]，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6]

[1] 《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曾不记，倚楼处”。

[2] 东门，指长沙城东的小吴门。古诗词中常用东门泛指送别之地。

[3] 横塘，指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因塘东西长，南北窄，作者特称横塘，并暗用横塘之典，借指妇女居住的地方。唐崔颢《长于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清水塘附近有火车站。

[4] 凭，意思是借以，包含两方，非单“请求”彼方。

[5] 昆仑崩绝壁，昆仑山的峭壁倒塌。这和下面的“台风扫寰宇”，都用来表示“割断愁丝恨缕”，参加革命斗争的强大决心，同时也烘托了未来的大革命的声威。《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我自精卫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

[6] 重比翼，和云翥，指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晤时再在云霄中比翼双飞。翥，鸟飞。《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重感慨、泪如雨。”

挥手从兹去。更那
里向苦情重诉。昨夜风
惊破枕，故人音信杳无书。但记得
年少初离家。三船行，一叶孤舟，
算人情已多如海。人情何未老
否？今歌未竟，未一语。送君千里
中，有明月，薄酒以次。气涌
能长歌，送此千里之旅。酒斟时，歌
罢，相如醉。而今，都寄此酒杯而已。
子瞻修道风流，得室。重此
和声。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别友》。

贺新郎

挥手从云去，
至那遙遠路相向，
修然去往。
願負荷擔御征衣，
被塵數寒風送。·
未報金闕喜高飛。
遇艱危，身生勞苦，
與人間知己空無少。
莫忘記：
修然去！

今朝霜至東門破，
但搖頭未可憐，且
留待次第。
汽酒一樽隔已難，
此行非久旅。
乘剝跡故返他鄉。
載前轎禽坡帆馬，
輕扇羽翼參珠樹。
垂感懷光，
願此而！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别友》。



《人间知己》(油画)



新郎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
鶯，酒酣胸膽尚開張。忽從萬里風
飛渡，驚天動地，萬象更新。一
時多少豪情壯懷，頓時如醉如
癡，猶如夢幻，醉裏不知身是客。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嬌色。



《贺新郎》(诗意图)

城中一有文豪，不識伊處居。更不為多憂。
增重^四，何為有心士不憂。是容易而且必然的。
稱莫^五，一望而知，是義的最高級最優美
上的意義的。然也知道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
到的，而且著之以人是還不到這頭來的。然而
如此的詩，不能够随便，一句廢話好的話可以生
出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章句」，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厚愛的父親死了，
免難已，但那裡又說是得到了解脱，因
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好運，得到了一个女人，
十分的孝顺；自然聽到了很多的喜事，
多之又多，我從來沒有見過这样的一天。

杨开慧作《偶感》一首，表达她对毛泽东的思念。

一九二九年十月

偶感

元落遠湖風濃寒入肌膏。念茲遠行人。

波光起伏連丘山。天涯寒衣是。否備。孤

瘦。是不。亦。遠。否。書信不可通。故。則

浪。多。效。飛。調。飛。去。見。茲。人。茲。人。不

能。歸。已。時。

勿。一。秀。娘。長。茲。為。所。親。曉。者。向。家。寫。
月。五。日。偶。去。三。五。日。適。有。水。人。至。狂。

二

盼。并。賜。風。人。內。雲。主。川。住。岳。急。切。如。娘。眉。通。行。八。福。湖。伊。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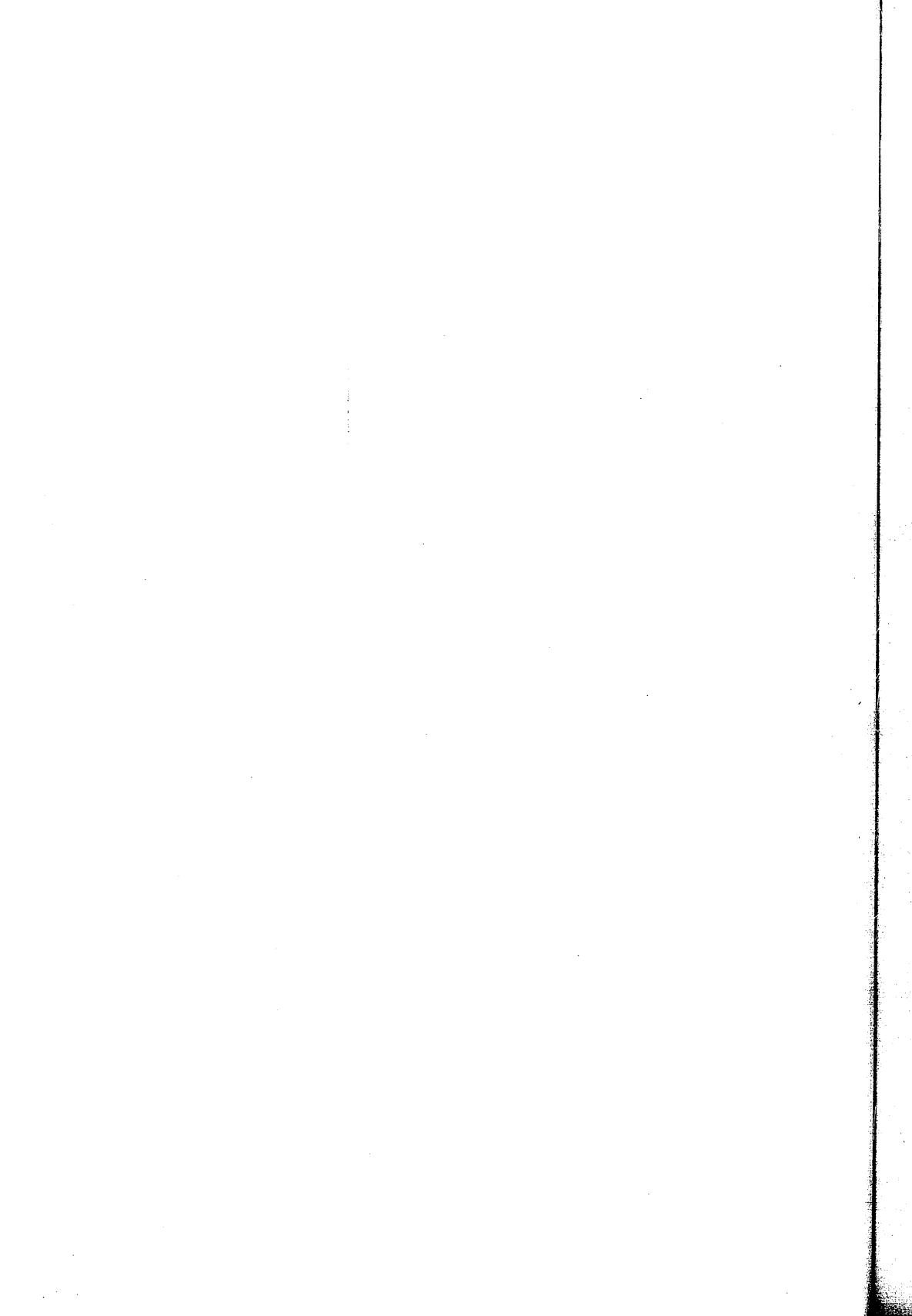
後。得。相。親。仍。復。歸。長。以。急。切。思。

人。情。亦。復。如。逢。宣。傷。秋。遠。

人。情。亦。復。如。逢。宣。傷。秋。遠。

人。情。亦。復。如。逢。宣。傷。秋。遠。

人。情。亦。復。如。逢。宣。傷。秋。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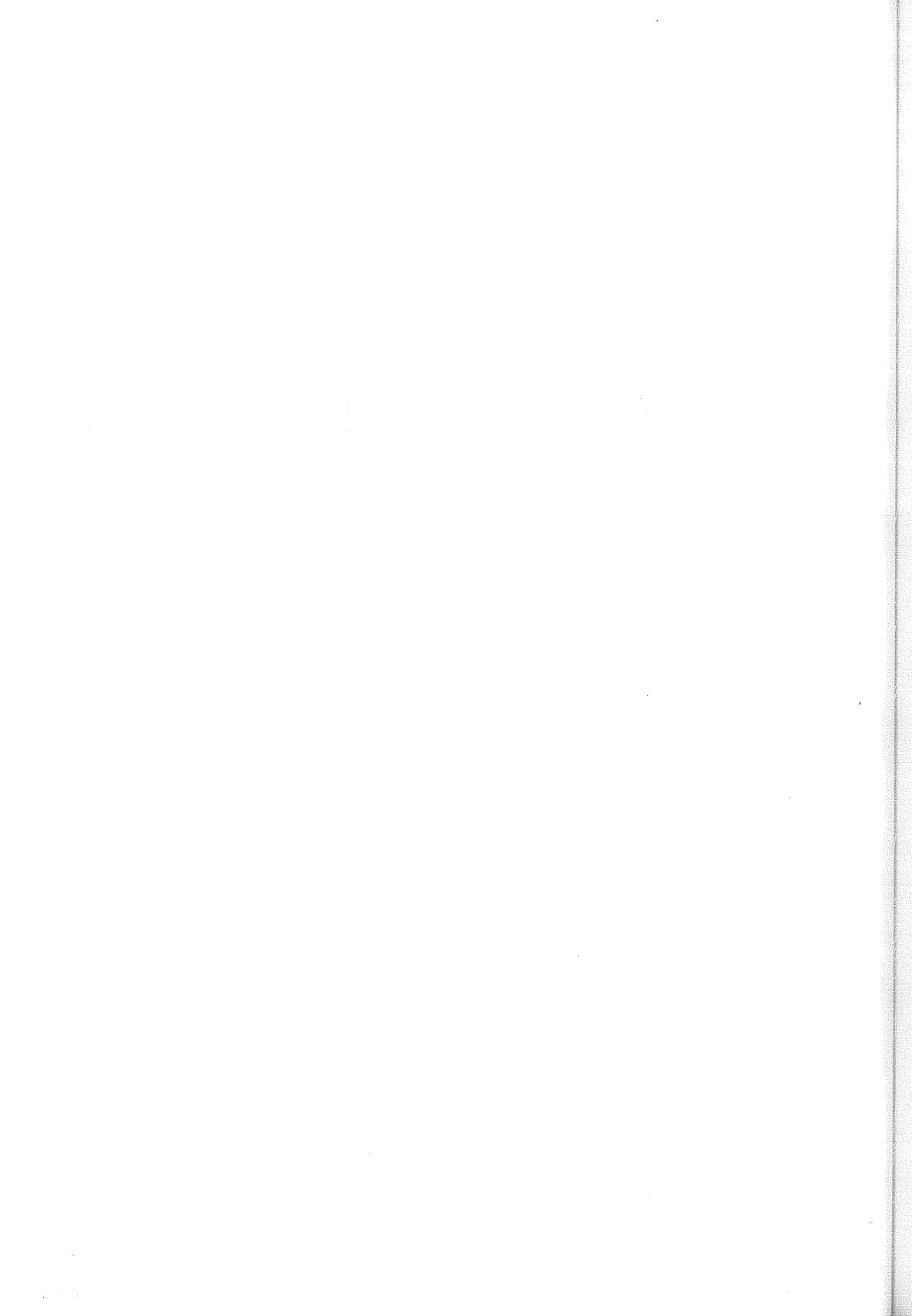


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联

(1923年)

俱人盖世英雄汉，
乐以忘忧让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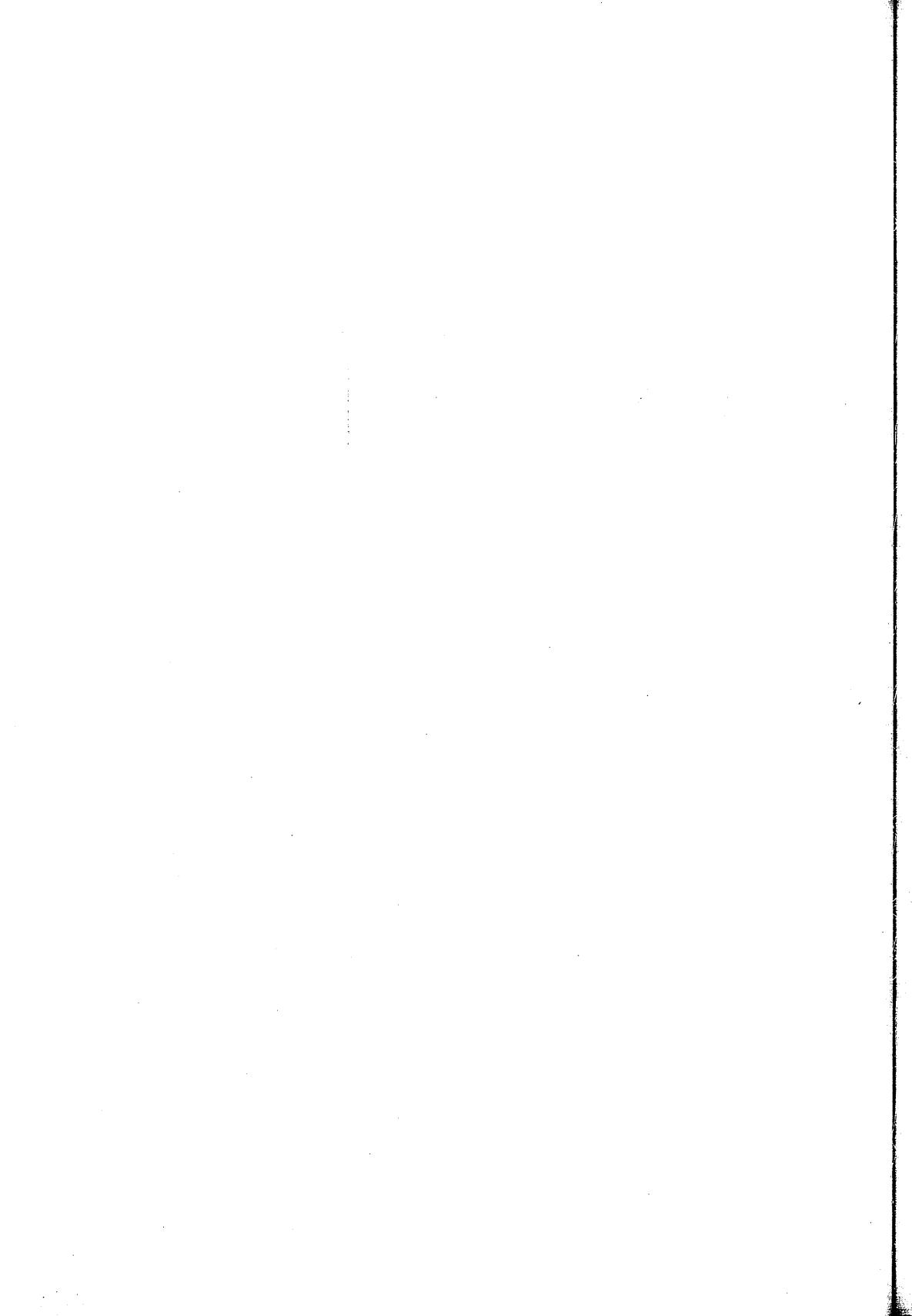
[1] 1921年冬毛泽东在安源提出办夜校，组织工人团体，并将这个团体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1924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的讲话^[1]

(1924年1月29日)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1] 1924年1月29日，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此决议未通过。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 提出的四项议案

(1924年2月9日)

(一) 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助案。(毛泽东提出)

(理由) 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之二级(实在的党部)非补助经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因党员所纳月捐，至多只能供给区分部之用费(区分委员会生活费及活动费)，不能提供区党部，更不能提供市党部、县党部。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惟普遍补助需费太多，补助穷僻不重要地方党部实亦没有意义。宜择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际工作之市县区党部补助经费。此等党部之须补助经费，较之省党部须补助经费更为紧要(省党部若不兼所在地市党部则专用巨额经费殊无充足的理由)。

决议 交预算委员会审查。

(二) 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案。(毛泽东提出)

决议 应照章程组织此案不能成立。

(三) 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案。(毛泽东提出)

(理由) 中央及京沪哈汉四执行部组织干事以上职员，共有六十余人，大会后半年内断不须设置职员如此之多。因为：(一) 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二) 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三) 此刻决找不到如此多的有用之人，滥竽充数则全失本意，因此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事实上需要一部才开一部，需要一人才用一人。

议决 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四) 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立定一计划案。(毛泽东提出)

(理由) 地方组织不宜务广，选择重要地方若干处立定一计划，集中人才财力于此一年内，专心致志于此等地方。办出个头绪来，到第二次大会方有实际效果可看。本年内应该专力的地方应把列成两等：第一等：最重要而现时有发展之可能者，如上海、北京、广州、汉口、哈尔滨……等至多八九处宜用十分之七的力量（人力财力）去做。第二等：次重要而现在有机会着手者，如太原、安庆、杭州、南昌……等至多十一二处用十分之三的力量去办。此外各地如无可为机会，在本年内均可不注意，以免分散精力得不到好结果。

决议 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中央执行委员廿一人

胡漢民 汪精衛 張靜江 廖仲愷
李烈鈞 居正 戴季陶 林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瑛 鄭魯
譚延闊 袁振 譚平山 石青陽
熊克武 李守常 恩克巴圖 王法勤
于右任 楊虎蘭 葉楚僑 于樹德

中华民国 十二年八月一日

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十七人

大本營公用人慶
鄧九沖 鄧家彙 沈定一 林祖涵
茅祖權 李宗黃 白雲梯 朱如本
彭素民 毛澤東 佛波黎 于方舟
張善初 袁秋白 袁秋如 蔡麟符
張國焘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1924年5月，国共两党在广州附近创办黄埔军校。毛泽东积极推荐青年到军校学习，并到黄埔军校讲演。图为黄埔军校旧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图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址。

给民智书局的信^[1]

(1924年3月16日)

请将配好的书经汉口转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1] 这是毛泽东为长沙文化书社进书的事致民智书局信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关于“五一”“五四”“五五” “五七”之纪念与宣传

(1924年4月19日)

同志们！

“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都快到了，在此四日中，我们都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严重的压迫之下，今年的“五一”，除广州外，当然没有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之可能，同志们应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召集工人（以工人为限）讲演会，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民^[1]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在广州的工人集会中，应解^[2]工人组织集中与统一的必要，痛驳安那其派独立分权之谬误；应解释工人参加政治运动的必要，痛驳安那其派“只要面包不要政治”之谬误；但同时须说明政治运动非猎官运动。

“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1]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族”字。

[2]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释”字。

“五五”纪念恐不能成为社会的运动，然亦应集合C.P.及S.Y.同志（如不便全体集合，C与S分别集合亦可），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

“五七”纪念日，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不但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1]，并要援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弃不平等的条约，改定平定^[2]的条约与关税。

各地同志活动的结果，望总来一报告。

委员长 T.S.Chen^[3]

秘书 T.T.Mao^[4]

[1]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大”字。

[2] “改定平定”似应为“改订平等”。

[3] 签名是陈独秀。

[4] 签名是毛泽东。

给平民教育委员会诸同志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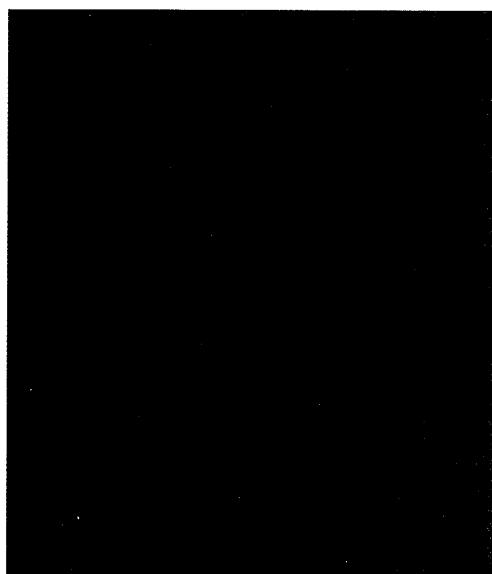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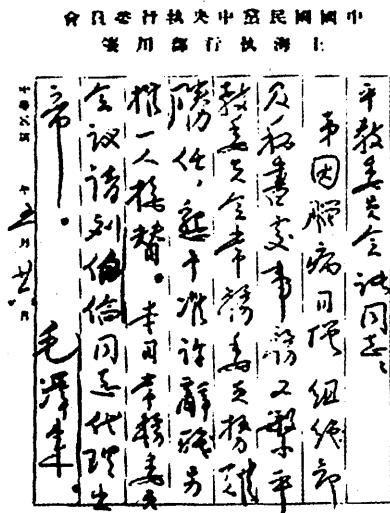
(1924年5月26日)

平教委员会诸同志：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平教委员会诸同志信的手稿。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4年7月21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做之事如下：

(一) 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A) 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B) 反对中俄协定，并且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C) 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D) 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E) 排斥共产派。

(二) 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 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 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 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T.T.Mao

中共中央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 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1]

(1924年8月31日)

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工作，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局。个人有特别意见的，可以写成书面意见，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拟将各地讨论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决议讨论的材料。

[1] 这是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致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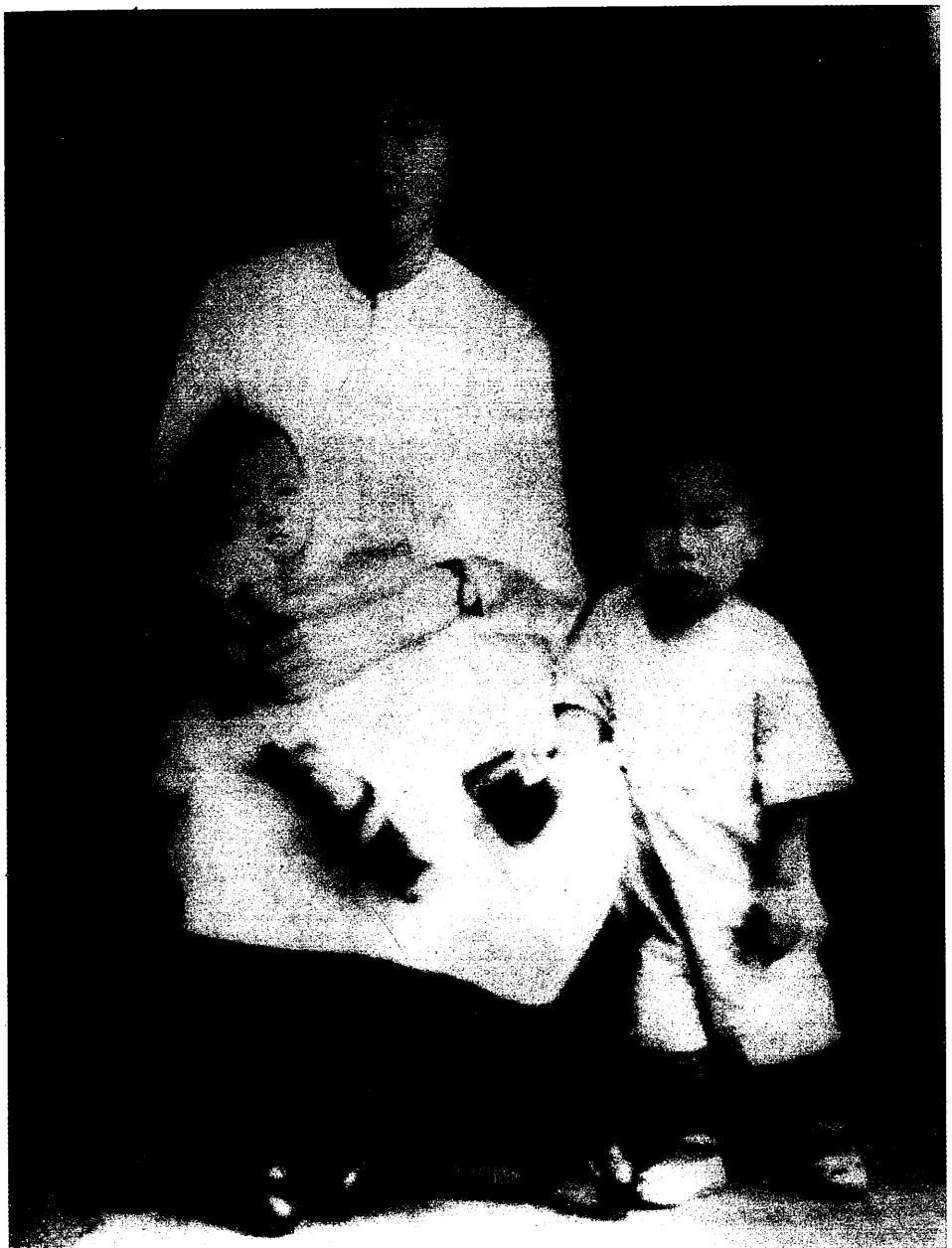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1924年9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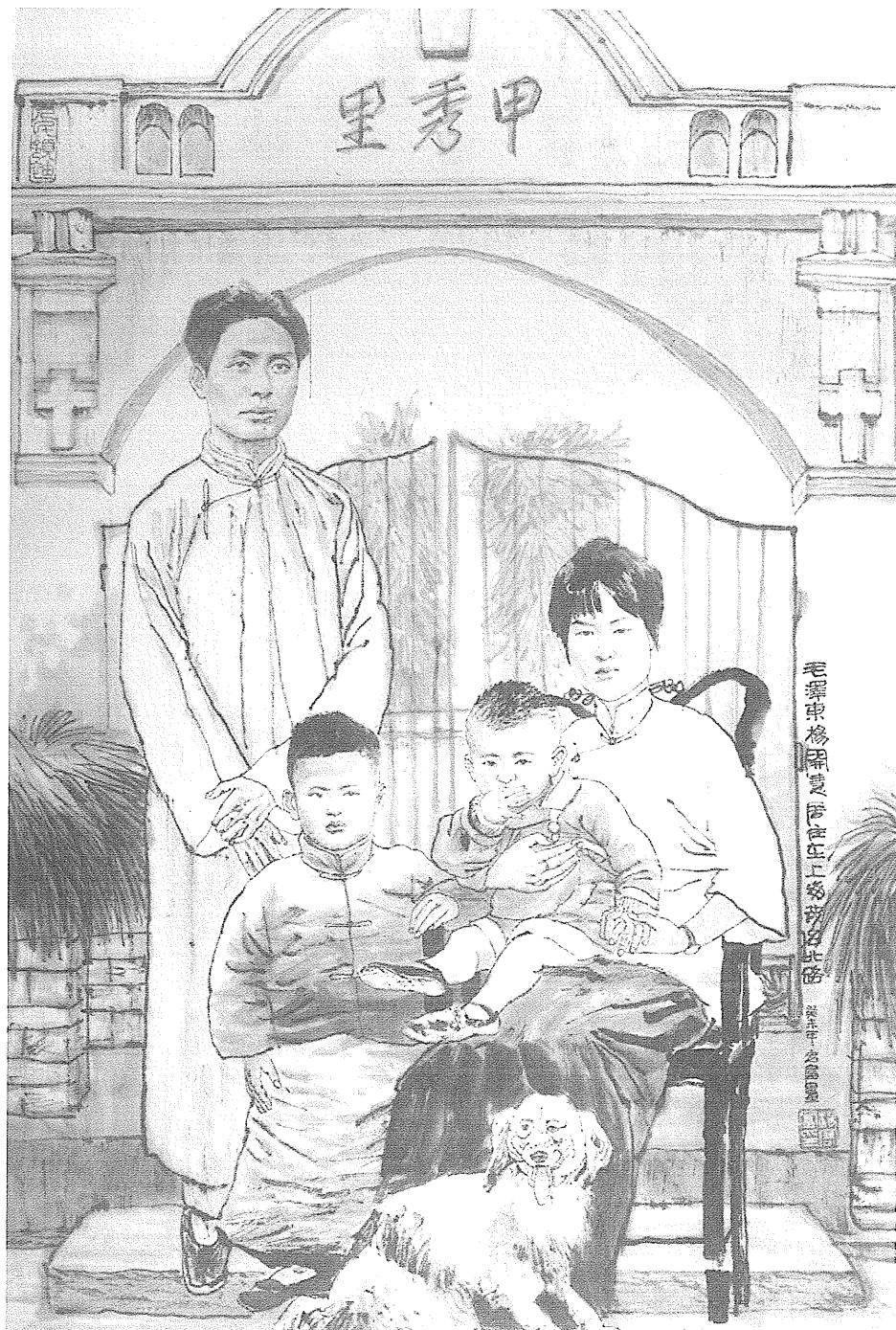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地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T.T.Mao



1924年，杨开慧和幼年的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合影。



《毛泽东、杨开慧和他们的孩子》（中国画）



《父子情深》(中国画)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

(1924年9月15日)

各地同志对通知中所列议案和前次扩大委员会所作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于十一月一日以前汇交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

[1] 这是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 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1]

(1924年9月25日)

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

[1] 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工作，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这是通知的主要内容。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1]

(1924年9月27日)

第一点，系因和森^[2]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现推德隆^[3]同志出席。第二点，C.P^[4]中央自有自由调遣其党员之权；至张伯简^[5]同志应否改在C.P中央长期做事，俟稍后决定了自当通知S.Y^[6]中局变更前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7]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8]即可返沪，并未变更前议。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信的主要内容。

[2] 和森，即蔡和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向导》主编。

[3] 德隆，即项德隆，又名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4] 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

[5] 张伯简，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出版发行工作，次年元月调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执委。

[6] S.Y是英文Social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7] 赵世炎，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接办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8] 仁静，即刘仁静，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秘书。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1924年11月1日)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 (一) 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 (二) 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 (三) 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 (四) 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 (五) 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 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地说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T.T.Mao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挽陈子博同志联^[1]

(1924年)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2]

[1] 1922年1月16日，赵恒惕公然杀害了长沙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一天，赵恒惕坐车经过长沙市坡子街，突然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在他的车前爆炸，吓得赵恒惕仓皇逃命。他立即命令全城戒严，挨户搜捕，后来才知投弹的是青年陈子博。陈子博在粪池里待了3天，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但因大粪中毒遍身发烂。由于当时时局紧张，无法在长沙就医，只得坐轿回湘乡老家调养。回家后病情加重，不幸于1924年1月22日病故。噩耗传到长沙后，文化书社于3月15日举行3天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这副挽联。陈子博（1892—1924），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参加筹办文化书社，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长沙执行委员会非宗教运动委员长。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陈子博任委员。1922年，毛泽东因反对赵恒惕离湘后，陈子博代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8月曾组织长沙织造工人罢工。

[2]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语出唐代杜甫《蜀相》一诗。意思是说，诸葛亮壮志未酬，溘然长逝，这是使英雄志士最为遗憾、最悲痛的事。这里用来悼念陈子博不幸逝世。

题安源工会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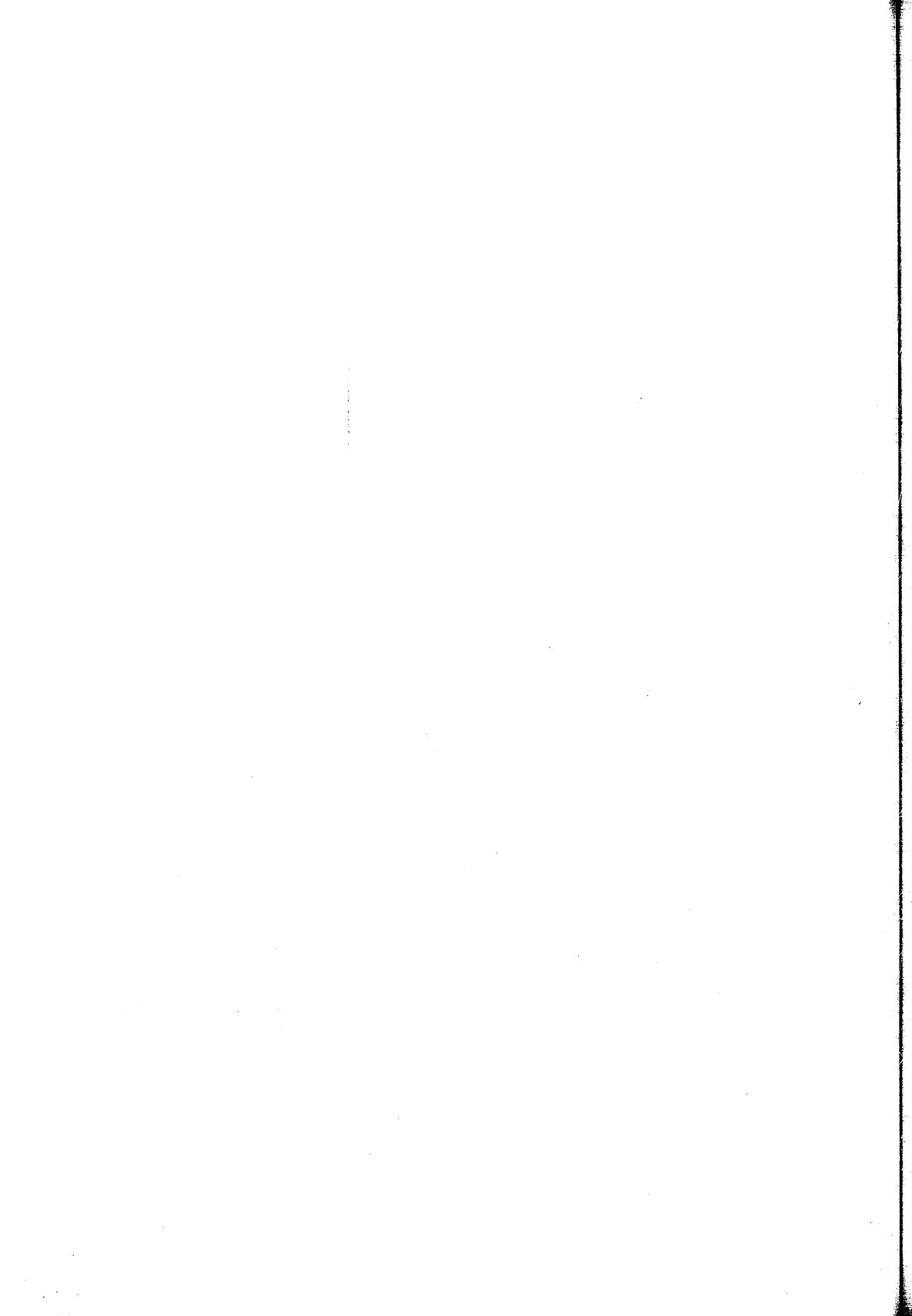
(1924年)

有团结精神，有阶级觉悟；
是劳工保障，是人类福星。

1925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 会场日刊》发刊词

(1925年10月20日)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十四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1] 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10月20日至27日在广州召开。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1]，打倒杨、刘^[2]），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

[1] 陈，指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林，指林虎（1887—1960），广西陆川人。1912年3月任江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2年冬受陈炯明委托，到湖南联络赵恒惕，推行联省自治。1923年3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广东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1924年5月被任命为广东督办。

[2] 杨，指杨希闵（1886—1967），云南宾川人。当时是盘踞在广东的滇系军阀。刘，指刘震寰（1890—1972），广西柳州人。当时是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

努力。

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临的地方，是陈、林、邓本殷^[1]等落魄军阀狡然思逞的地方，是陈廉伯^[2]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乃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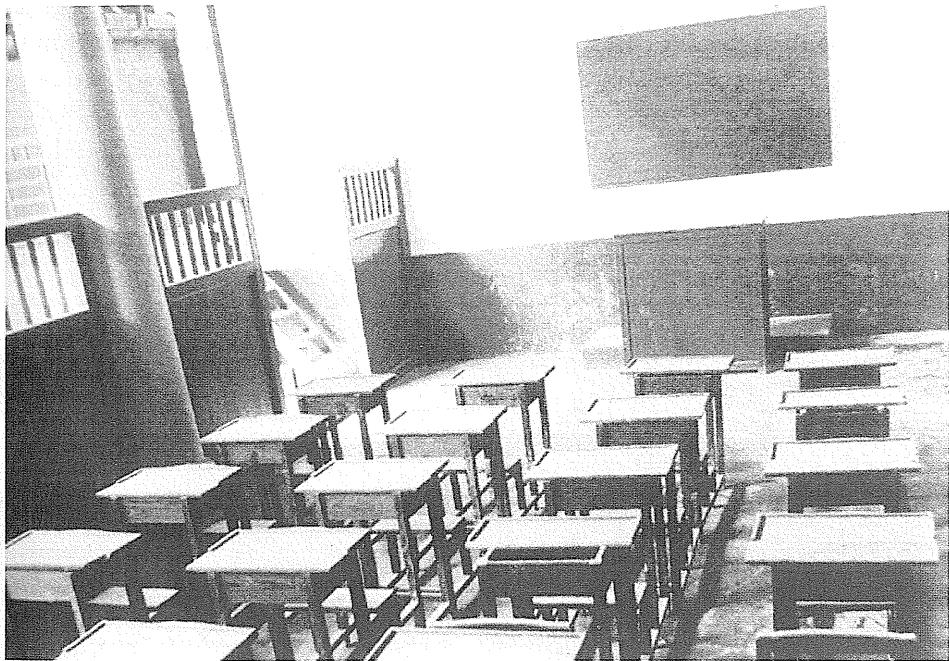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1] 邓本殷（1878—1926），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陈炯明的部属，曾盘踞广东廉州（今合浦）、雷州（今海康）等地。

[2] 陈廉伯（1884—1945），广东南海人。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1919年任广东商团团长。1924年秋，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商团武装叛乱，遭革命力量镇压后逃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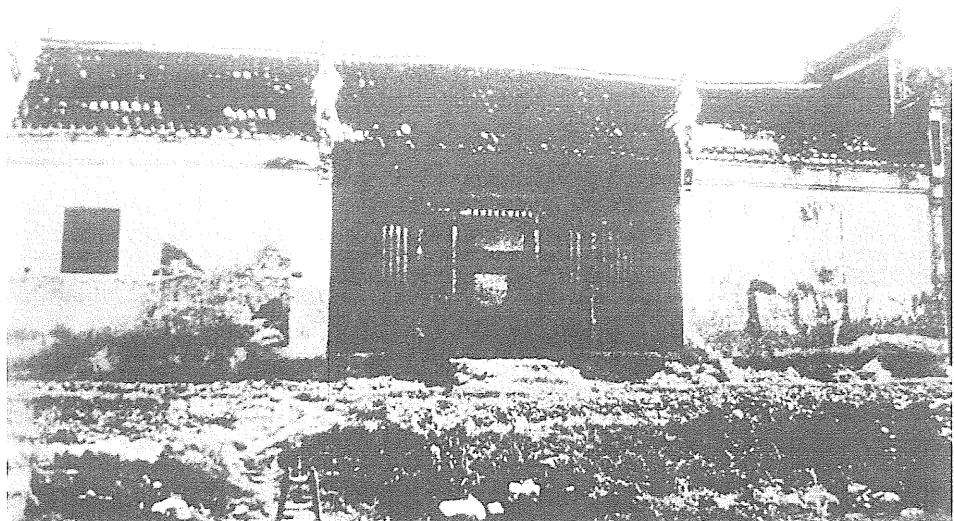


毛泽东在毛氏宗祠开办的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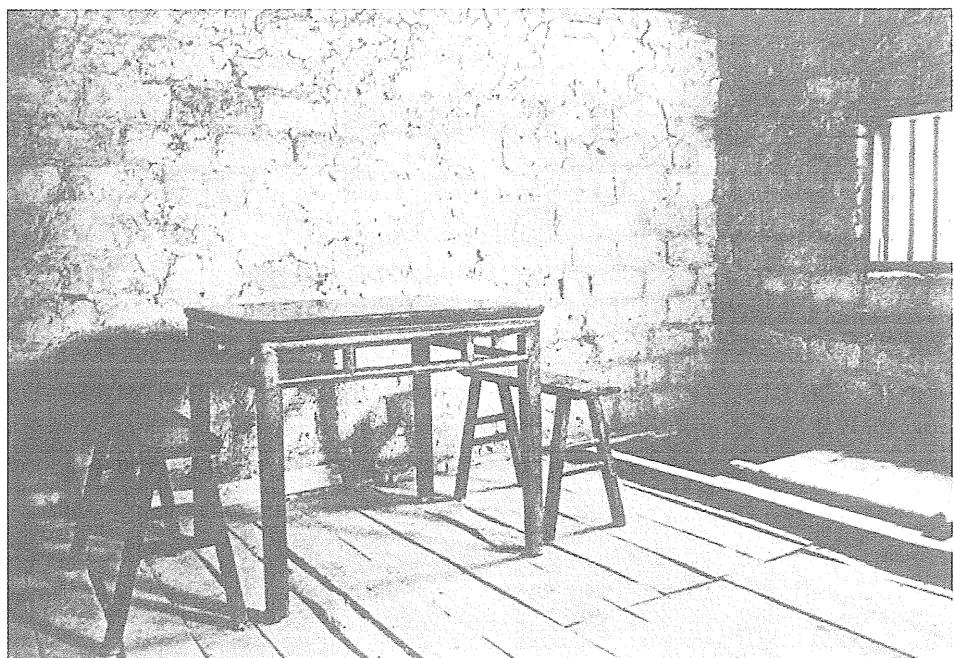
雪耻宣言

不好好念好书不好
讲起就事真伤感
東方有个日本国
自来已且四月底
日本鬼子真光棍
一派同魔都不服
美国巡捕没良心
打死受伤有几百
肉中有的是商人
英日美法酒国人
此事交涉未解决
父亲同胞百余入
大马路上血如海
青岛上海和广东
同胞被杀心里痛
报仇雪耻一条心
如今中华是民国
树倒猢狲走不开
莫靠北京段祺瑞
莫再提起吴佩孚
那班傢伙莫再讲
只要经济能独立
本外商人争口气
替他销货不领情
不分男女一齐来
香水洋皂洋糖它
洋装洋打与洋布
只有工农真个好
还有两样要留心
莫把粮食对化送
果然是这样行
洋人来到眼淫了
想必人人都晓得
青岛勢厂罢工起
杀死工人人倾江
造工排演个个哭
拿起枪炮就打人
这样横蛮透了得
多的工农和学生
道理不讲专逞兇
汉口英人又猖狂
你看伤心不伤心
相比牛馬遭屠宰
处处杀死中国人
各省各县各乡领
工农商人与学生
有事大家要负责
有事都要人家来
他的天良早丢棄
圈守岳州洞庭湖
大家郡齐法子想
百年仇恨立时消
莫和洋人做生意
还要开枪打我们
他们外国出得多
濟南人丹都可恶
大布衣裳穿到老
莫替洋人去鑿工
冒饑飯吃是死靈

韶山雪耻会宣言。



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旧址郭氏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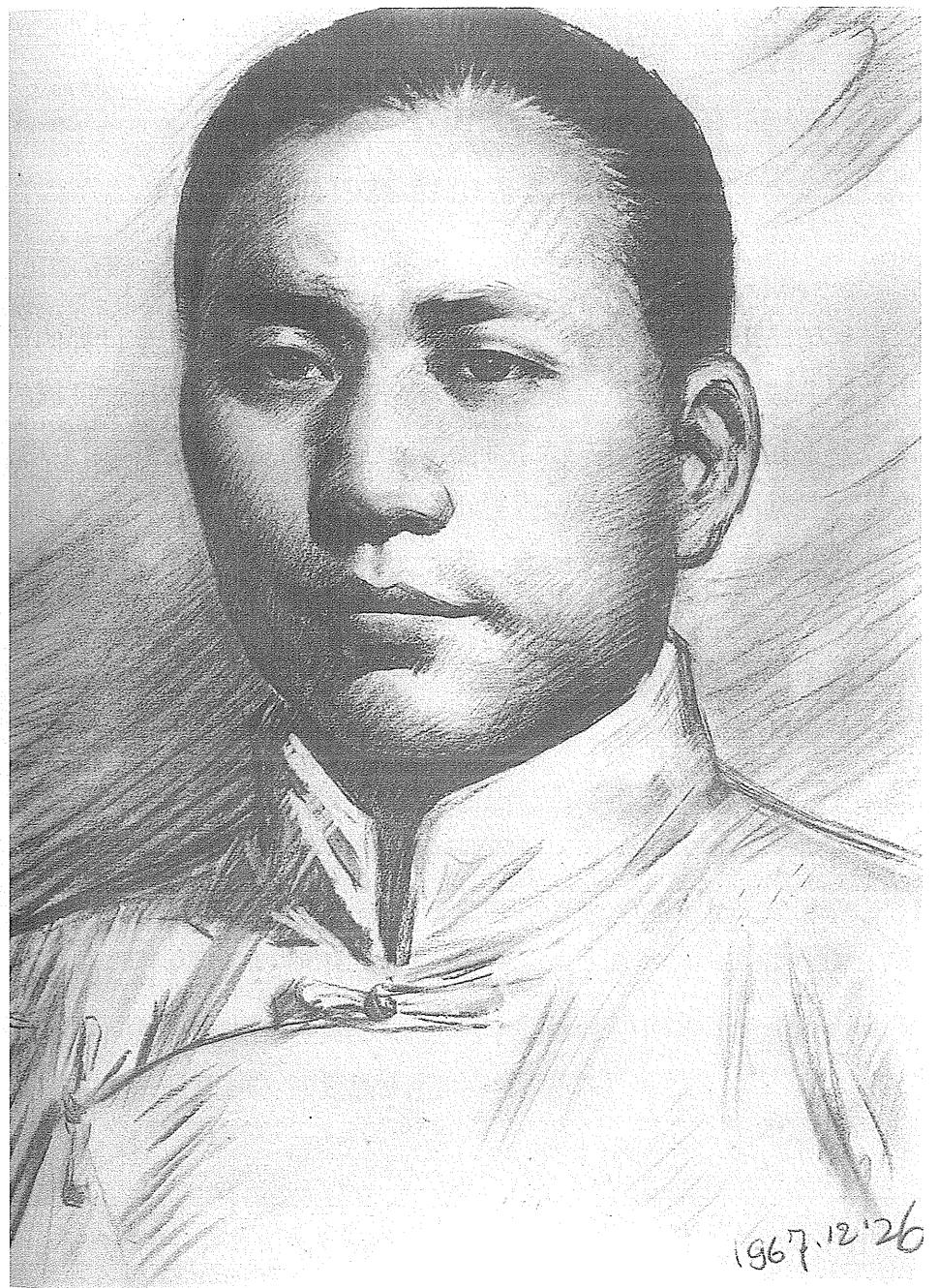
毛泽东故居的阁楼。1925年，毛泽东在这里为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组建中共韶山支部。



《毛泽东教育亲人干革命》(油画)



《韶山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韶山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素描)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1]

(1925年10月26日)

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

[1] 这是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宣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上，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在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 闭幕式上的演说^[1]

(1925年10月27日)

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

[1] 毛泽东出席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的千人发表演说。这是演说的一部分。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

(1925年11月21日)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注意

(一) 国内会员以本年九^[2]月三十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国外会员以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逾期不缴者即照本届年会议决策第四条办理，取消其会员资格。

(二) 答案务请缮写清楚措辞明确，否则发生误会，应由本人负责。

(三) 调查表正副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均请按式填缴，由邮局双挂号寄交南京网巾市六号黄仲苏收转。

姓 毛 名 泽东 号 润之 省 湖南 县 湘潭

最近通信地址 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永久通信地址 长沙文化书社

[1] 本篇文内用楷体字排印的为调查表原有的，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于1920年1月参加该学会。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2] 原表此处为“九”，毛泽东将其改为“十一”。

问题请逐条答复

(一) 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二) 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自己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三) 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

(甲) 学业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乙) 事业 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此纸本日由长沙转到

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

意◎注◎

(一)國內會員以本年九月三十日為止，國外會員以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為止，調查表請定期報者即應承擔，未定期報者由本人負責。

(二)調查表請定期報者即應承擔，未定期報者由本人負責。

(三)調查表請定期報者即應承擔，未定期報者由本人負責。

收存

姓毛 名澤東號潤之 省湖南縣湘潭

最近通信地址 廣州國民党中央委員會
永久通信地址 長沙文化書社

問題請逐條答覆。

(一)對於目前內憂外患，必須改造的中國究竟抱何種主義？

(二)對於本會會務之改進，究竟抱何種態度？

(三)入會以後之經歷請簡明告知。

(甲)畢業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

(乙)畢業都過一年，吉爾遜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一年，國民大會組織工作

日本由上海轉到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在广州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925年11月27日)

甲 反奉战争各方面的分析

(一) 帝国主义方面 去年直奉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于江浙战争，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垄断江苏无线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线电报借款。故其时美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燮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唯英国帝国主义在去年奉直战后鉴于直系之不中用，于五卅运动全国反英时，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后且相传英国以巨款助奉扩充奉天兵工厂，企图以奉系统一全国之说。此时直系以杨宇霆督苏上海增兵和在北京所开关税会议有利奉张之故，不得不早日发难。狡猾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役内究竟助奉助直，此时尚难完全断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计，宁愿拉拢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吴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将看何方胜利把握较多即助何方。

(二) 军阀方面 在直奉对峙的局面中，直系方而有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地盘。四川之袁祖铭支配下之贵州，名义上也属直系。但这几省内部各有特殊的派别，吴佩孚、孙传芳亦必相互分裂。在反奉战争剧烈时期，孙吴自须联合作战，现在战事停顿已现裂痕，将来战胜奉张，必然分裂无疑。奉系方面，自来即有老少两派。去年胜直以来，因权利的分配，内部暗斗日甚。财政竭蹶，奉票跌至五折以下。前之攫取直鲁苏皖，即为解决财政问题。此时苏皖已失，又因国民军之威胁，山东及直隶之京汉线亦将不守，关内财源尽矣，聚数十万饥军于山海关内外，其势力于速战而不利于持久。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唯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一员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三）政派方面 在此次反奉战争中，政派之态度可注意者为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之买办阶级。安福系在军事上的势力此时可说已经没有，其在政治上的势力，早已裂为亲直亲奉二派。唯因亲直派失势，亲奉派在北京当权，故北京政府变成完全代表张作霖的东西。研究系自曹吴当国即附曹吴。曹吴虽失败，仍为吴佩孚主幕。此次直系抬头，研究系蒋方震等及该系猪仔议员猾集汉口，借以攫取利益。联治派乃合政学系益友社及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派政客如章炳麟等许多小政派而成，现时亦均聚在吴佩孚旗帜之下以谋活动。顾维钧一派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卖国运动。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

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以上各政派，除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僚利益的安福系属于奉系一边外，其余代表官僚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研究系联治派，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新外交系，与上海南通买办阶级，都站在直系一边。

（四）国民军方面 国民军与英美日本帝国主义都没有关系，因此同情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国民军最大的特点。此时因策略上必须尚未与张作霖决裂，或且取暂时的妥协，但这是一时的事。本党欲图接近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反奉战争后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则国民军在北方之胜利实为重要关键之一。

（五）国民政府方面 本党在广东的基础现已十分巩固，北江熊克武部早经解决。东江陈炯明部又已肃清，其小部窜入闽边者已派兵追剿，务绝根株。南路邓本殷部亦不日可以解决。全境统一可说业已告成。英国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等消灭本党革命势力之企图，业已完全失败。省港罢工问题，港商港政府知无别法可以对抗，现正力图转圜，不日可得到胜利的解决。目前本党在广东方面所致力者，为革命军军力之精练扩充，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之刷新整顿，工农商学民众运动之扩大。总之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俟南北形势发展到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本党业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明反奉战争之目的，并用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致电直奉两方重要将领，勉其一致推倒奉张，并于奉张势力倒后建设合于民众目的之政府及政策，以验其对于本党拥护民众利益主张的迎拒。

（六）民众方面 此次反奉运动在民众意识方面，乃为反抗拥护英日帝国主义压迫爱国运动之奉系军阀的运动。故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

不能算作主体。此时民众之愤怒奉系军阀为历年所未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胜利即反英日胜利的观念，与广东民众之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故此次反奉战争在民众意识方面与在“直皖”“奉直”几次战争时都不相同。

乙 我们的宣传及准备

各地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觅得各种机会，于同志中尽力解释，于民众中尽力宣传以下各点：

（一）各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争中的阴谋。

（二）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如胜利，则民众将受到绝大的危险。

（三）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险，直系当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宜注意宣传此点。

（四）各种反革命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买办阶级都是与人民利益绝不相容，不可不揭其阴私一律排斥。

（五）在各派反奉势力中，冯玉祥一派与吴佩孚孙传芳一派不同之点，即冯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吴孙则受帝国主义指使，反对国民革命。故人民于友敌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六）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因为国民

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人民痛苦的慰劳者（举广东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此次统一广东和积极建设的事实）。

（七）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八）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主张之四条：（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乃结束此次战争的唯一方法。不照此四条，则战争结局，仍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合作支配的局面。人民仍然要受与从前同样的危险。

（九）为实施国民党的主张计，应该赶快准备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在各种人民团体中，“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之必要”应继去年的宣传重新奋起一个普遍的宣传。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于必要时，应该在所辖范围内全体动员，对于国民会议作猛力之宣传，以期唤起民众之注意。

丙 口号

- （一）打倒张作霖、段祺瑞。
- （二）打倒英美日本帝国主义。
- （三）打倒一切阴谋政派。
- （四）人民起来指挥反奉运动。
- （五）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

- (六) 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 (七) 取消不平等条约。
- (八) 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
- (九) 一切革命分子速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1]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

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铣^[2]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覆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磐石，纵使交通颇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十

[1] 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等给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通电。

[2] 铑，即11月16日。

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征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

中央执行委员 汪兆铭 谭延闿 谭平山

林祖涵 李大钊 于右任

于树德 王法勤 丁惟汾

恩克巴图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 瞿秋白 韩麟符

于方舟 张国焘

感^[1]

[1] 感，即11月27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

(1925年12月1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

[1]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重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

[1]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 戴季陶（1891—1949），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1925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9年2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 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改名为《晨报》，1928年6月停刊。

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1]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2]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3]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4]，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

[1] 1922年和1923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2]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3]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1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60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布解散。

[4] 这里是指中农。

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1]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

[1] 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緊，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1]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2]，（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3]，（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

[1] 指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5月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8人。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100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2] 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3] 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1]、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2]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3]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

[1] 指1922年和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2月7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2] 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1924年7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7月15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3] 指1925年6月1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6月19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20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25万工人参加，坚持了1年零4个月，是截至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

[1] 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第四期

革命

刊 月 半

第 月 收 期 每 命 行 民 國 社 報
軍 部 司 令 部 軍 每 約 每 月 費 邮 郵 每 月 費

年 十一月 日 份 六 分 日 月 不 寄 即 命 版 出 南

小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第四期目錄▼

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泽东

湖南大饑餉問題與革命運動

陳嘉任

湘軍的進步和以後改造的着手點

李富春

廣東統一與奉直戰爭

黃繁

蘇俄革命成功的研究

羅介夫

致譚軍長的一封信

劉小山

本軍第三團歡迎江西省立中學校旅行

李壽

●中國近事述評

反奉戰爭

關稅會議

湖南軍閥

世界近訊

蘇俄經濟發展的近況

日本已正式成立無產政黨

敘利亞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

●本軍紀事

政治部十一月以來的工作簡略報告

本軍特別黨部會議紀

整理處的報告

本軍電摘要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发表《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 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5年12月4日)

全国及海外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均鉴：

溯自先总理在日，鉴于革命之历久无成功，毅然决定改组本党，当时即有一班懒惰右倾党员，欲回避真正之革命，知改组刷新之不利于偷惰垄断升官发财，阻挠备至。及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革命策略以后，彼辈知阻挠之无济于事，乃公然叛变。冯自由、马素等勾结段祺瑞、张作霖另组团体倡之于先。杨希闵、刘震寰勾结英国帝国主义举兵发难于后，梁鸿楷、郑润琦、莫雄、朱卓文等更不惜出以最残酷之手段，置我最忠勇之廖仲恺同志于死地，欲一举推翻广州革命根据地。本当于此存亡绝续之交，为保持本党革命地位计，不得不出以严厉之手段以处置诸叛党党员。幸赖先总理革命精神之感召，诸同志强毅勇猛之努力，于本年六月扫平杨刘，于九月肃清廖案诸叛逆，使广州根本之地，危而复安，革命事业，挫而愈奋，团结淬厉，进展可期。不图彼辈毒心不已，又复勾结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与英国帝国主义指挥之陈炯明、邓本殷三方夹击，以期破灭我革命势力。复赖同志一致努力，于两月之内，使三方顽敌，以次肃清，革命权力，因以巩固。常此之时，北京少数同志忽又以开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闻，查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

议，迭经五月二十一日及五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只能在广州开会。因第二次全国大会，系决定在广州开会，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系为议决在大会提案等事，十月三十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第四次全体委员会须在全国大会前三星期召集，即是此意。且广州为本党革命根据地，北京乃军阀及反革命派麇聚高压之区，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安能舍广州而至北京。显系一班叛党党员，假借机会，怂恿少数革命观念动摇之中央委员，谋不利于本党之行动，邹鲁即其中之一也。查本党自改组以迄于今，反动党员自冯自由以迄邹鲁，所同然一词以攻击本党及本党政府者，曰共产，曰联俄，曰容纳共产派分子，夫共产云云，乃帝国主义军阀用以离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一种策略，吾同志苟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即不应助之宣传，以淆乱国民视听，且事实俱在，谣言之兴，必难持久。惟联俄与容纳共产派分子，则为本党求达到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先总理决之于先，第一次全国大会采纳于后，乃有客观之根据及深切之理由。盖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决斗之一幕，与历史上一切革命异其性质，则革命之进行，亦当然异其策略。今帝国主义之对吾党，早已为国际联合的压迫，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本党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因当时反革命派势力已有国际的联合，而吾党革命势力尚无国际联合，在国内亦未唤起大多数民众为之基础，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故不得不妥协迁就以驯至于失败。时至今日，岂可复蹈故辙？彼帝国主义军阀正惟吾今日所探革命策略之可畏，乃多方离间破坏，务令吾党尽绝国内外之一切友助，回复从前孤立地位，使革命事业永

无成功，而后彼等始得遂其永久统治中国之愿望，其计之毒，宁有逾此。我少数同志观察不周，辄为此等离间政策所惑，年来党内纠纷，大抵肇原于此。须知今日之局面，不为革命，便为反革命，无丝毫不回翔之余地。然欲革命，必须联合国际及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团为一体，始能与反革命派决战而不败。否则未有不失败者。不惟失败而已，其自身且有随时陷入反革命派之危险，冯自由以致邹鲁诸叛党党员，其明证也。此次北京开会之事，已由本会去电严驳，且已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一月一日，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开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甚议于广州，业经电促京沪各委员刻日南下与会，多数委员意见一致，本已毫无问题。惟因近来党内外谣诼之兴，多由不明了本党政策而起，因将改组以来与反革命派奋斗之经过及先总理所采革命策略之根由，通告各地同志，望各同志坚持总理之主张，勿为异说所迷惑，革命前途，实利赖之。特此通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

(1925年12月5日)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2]、研究系、联治派^[3]、国家主义派^[4]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

[1] 这是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

[2] 安福系，是北洋军阀皖系操纵的政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进行政治活动，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系”。1926年段祺瑞垮台，安福系瓦解。

[3] 联治派，即“联省自治派”。北洋军阀统治期间，部分军阀政客为保持地方割据，并反对民主革命，而提出联省自治的反动主张。

[4]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的公开名称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

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1]，肃清郑、莫^[2]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讳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

[1]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2] 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1925年他们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政治週報發刊理由

（毛泽东）

我們要出版政治週報，爲了革命。爲什麼要革命？爲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爲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爲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我們爲了革命，擯棄了一切敵人——全體反革命

主義，全國大不羣，各地反革命分子，反革命

政府，反革命機關在開始。還有許多擾亂治安的土匪，還有許多擾亂人民的土豪劣紳富商，民收財政司法裁判委員會內部內幕機密還有許多未被除去，我們不是說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我們是說我們已有一個革命的

政府，已有一個革命的機會，已有一個興上民主政治教育文化運動之，我們已有一

一大本孫中山先生革命遺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新聞紙頭

政治週報

第一期

以打倒反革命分子，反革命

1925年9月，毛泽东从韶山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12月，创办了中央宣传部机关报《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图为第一期《政治周报》和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

三三三一制

(1925年12月5日)

“何谓共产？财产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已得三成，一成会用。”这是杨坤如贴在惠州城厢内外的“反共产”四言韵语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颇算得清醒的朋友问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回事没有？”我听了纳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吗？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他说：“《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载着。”于是我知道所谓《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鲜议论。原来《香港晨报》在杨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党有过关系。杨刘叛变香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谓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绝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岛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许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许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饱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谓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作他们的

机关报。这正如冯自由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嘴里还说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祺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别有恨于《香港晨报》和冯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一个例子点破给国内外许多朋友看，于观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杨坤如的告示做的词章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败笔，所谓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锅汤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1925年12月5日)

杨坤如的布告已经领教了，还有刘志陆等给“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萧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吴子玉先生，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许多人的电报，那上面却稍不同。他那“其罪七”中说：“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常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合。今乃诱以均地之说，乱其互利之序。”不免与杨坤如冲突。照杨坤如说：“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已得三成，一成会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倒可以说是“互利”。刘志陆说的却是“均地”，其意谓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没有租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说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说地主一点没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哪个的话。

如果讨赤志同仇讐亦吾良友

(1925年12月5日)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呜呼”一段，接着说：“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讨赤志同，仇讐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负无待交绥。得天者昌，仁暴无难立判。”刘电列衔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张萧赵方周各位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吴康梁诸先生，固然是讨赤同志。但香港金总督伦敦包总理，何尝不是讨赤志同？却不将台衔列上去。而且金总督帮助了如许金钱军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设总司令部，讨赤之志，炳若日星，却偏将台衔漏列，真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师直为壮数句说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德颂。

颂声来于万国

(1925年12月5日)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煽惑粤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见旌旄所指，浆食争迎，拉朽摧枯，大勋立就（记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赖以铲除，国基由兹奠定。岂特与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纪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1925年12月5日)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共产印刷品上面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军”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像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吴子玉先生所部，实在可算得“反共产中国国民军”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1925年12月5日)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戳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掷以图幸胜，竟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他竟捏造所谓“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们的传单中有一张题目叫做“劝粤民协助粤军讨伐赤党”，那里面说：“呜呼！我父老兄弟知蒋中正拟订之共产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蚩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于一般贫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贫民也。而抑知大谬不然。吾综厥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谓三三三一制者，盖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谓四四二制者，盖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商场资本稍厚者，则更完全没收之。”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载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俱乐部，请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会议磋商解决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绅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简琴石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简石琴的话去问陈炯明，我料陈炯明必将答道：“简石琴自己扯谎，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说未共呢。”

邹鲁与革命

(1925年12月5日)

邹鲁说：“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觉悟，切不可因人家说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们同志屡仆屡起，哪能有民国。若不是讨袁护法讨贼北伐诸役一向无前，哪能有今日的历史。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毁商团，乃需要靠杨刘。打杨刘仍需要靠许梁。即今日之制许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邹先生！就请你革命罢！实在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须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须得现在还是革命，须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杨刘，老同志许梁，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1925年12月13日)

“革命派团结起来！”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故即舍违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议决与不由中央秘书处召集等法律及手续不计，单就事实说，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这是什么意义？此事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京严驳，并由中央委员汪精卫、谭组安等十余人将驳斥要点通电全国各级党部，又由中央委员会发出详明通告历举两年来右派党员之反革命行为以警戒党员勿为所惑，均志上周本报。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二十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我们料到全国党员不但不附和，而且将因此引起一个更大的团结。“革命派团结起来”是廖仲恺同志倡导的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边去”是汪精卫同志倡导的口号，在今日这两个口号必然要普及于全国各地革命同志及革命民众之间。我们从听到下列各处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声浪，推知这两个口号之必然普及于全国。

向左还是向右？

(1925年12月13日)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见，而在江浙颇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一齐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能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假如有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间，则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现在还没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议论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三十日甲方的大炮已经在南京一带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没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罢工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议论还可以公开地宣传，“留正气于两间，存自由于天地”。但我们若假设一个局面，假设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将，又是汪精卫蒋介石带领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领工部局，所有“红头阿三”之类一齐变了俘虏；马上

封锁吴淞口，在南北塘狮子林驾上大炮（像虎门一样），炮台上起扯“炮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闹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设置了卫戍司令部，请着王懋功先生之流做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车在马路上飞巡。《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那自然还有北京。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较张家口还要自由——话虽如此说，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开会，那里不是段政府管辖的地方吗？如果段执政不在——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不是听说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吗？咳！段执政辇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真是难说！更可痛着：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驱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议决三条，第一条组织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的样）。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诛朱深，枪毙国贼，解散关税会议，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真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之前标题道：“可骇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骇的示威”，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赤化原是如此

(1925年12月13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是粤详报，识蒋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民颇爱护，反之反共产军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化，安得染遍着全中国！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

(1925年12月13日)

陈炯明的反共产宣传文章里，有一篇是“敬告青年学生”，末尾几句说“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我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知识的青年学生，一个一个杀尽”。要知陈炯明的话对不对，起先把中国知识阶级的地位，作一个分析。我们觉得有知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知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他们有的做了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的秘书或参谋；有的做了张口、穆藕初、陈口伯等的辩士或书记，说农民不应减租和工人不该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投入农工阶级的战线里了。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知识的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却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是有知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 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1925年12月13日)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独中国人景仰，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无不景仰，厌恶他的只有各国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与军阀。苏俄当革命之际，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台尼金、蓝格尔、柯尔恰克等白党反革命派四面侵袭，其危急情形殆仿佛两个月前之广东。此时孙先生曾有一勉励的电报致列宁。据俄代表鲍罗庭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所述，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故当孙先生遭陈炯明叛变避走上海之际，其时势力颇为薄弱，但苏俄派遣代表越飞到沪，致意孙先生，期以合作，共同推倒帝国主义，是为中俄两国大同盟之起点云云。确实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大敌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全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一致，方能和他决战而不失败，中国所需于苏俄者在此，苏俄所需于中国者亦在此。京沪等处一班高等知识分子哗然以联俄为异，乃不识现今世界上革命、反革命双方争斗的形势，不识国民党革命策略的意义之故，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设，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设此大学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据莫斯科来信，孙先生

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两巨著已由彼邦学者翻为俄文，孙文大学现在积极筹备中，照目前预测，将来必有非常可喜之成绩。该校董事会主席为著名之越飞博士，曾任俄国驻华代表，董事会会员则为该校校长拉突、普拉夫打报主笔卜哈连、克鲁斯加耶夫人、职工联合会执行部主席汤斯基及其他名流。中俄两国各社团及个人捐助者甚多，经济方面，甚为充足。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该大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课程主要科为近代经济思潮、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独立之研究，及创造的著作。各种成绩，并于著名报章杂志发表。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闻第一次定额五百名，在广东方面招百五十名。现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考取一百四十七名，从一千零三十人中选出，其方法分笔试、口试两种，必两种成绩均优者方能及格。考取各生姓名列下：

梁福文	梁干乔	钟树棠	黄永伟	朱国贞
区就宪	邹仕恬	林耀寰	刘口珠	白瑜
郭明生	朱瑞	谢振华	龙其光	陈复
陈璧光	林爱民	邓公武	缪任衡	钟基本
汤学海	梁少强	刘马欧	黄甘棠	郑重民
林侠	林协文	叶恩溥	周学鑑	廖化机
邵页昌	吴仲良	黄发	李淋	方陶
聂甘雨	冯德恭	曾任良	陈正业	徐康
沈苑明	冯声南	陈造新	扬华波	张民权
翟荣基	林叔山	林道文	李文达	甄兆权
董良史	郑奇	董正兴	李文琯	黄大钧

董 煜	韩亮兼	郑介民	杨家腾	梁振阳
唐君粹	郅文仪	马维禹	刘慕强	徐 莹
李惠芳	阮 篓	张任权	黄仲理	岑延藻
张恕安	曾 上	黄毅民	萧 豪	叶君好
刘达元	李彦良	黄永洪	黄 菊	黄文杰
张 星	刘福鑫	方 檐	罗 英	王志鸿
吴 鲁	张引岚	陆那杰	邓汉钟	郑仁波
麌 开	钟琨瑜	冯洁芬	韦碧辉	刘漫舒
黄鼎新	周 爱	赵 愚	陈道守	吕魁文
黄夷白	萧爱贤	康 泽	骆德荣	吴 肃
王光樾	万徐如	张元良	李冠英	郑国琛
彭文畅	王觉源	陈声孚	张远猷	邓敦厚
徐君虎	余 鹳	余楚帆	李 煄	彭涛高
杨振西	杨振藻	胡铭勋	周咏南	高云裳
蔡日秋	段世援	陈海洲	潘新卫	段 平
王佐才	吴国谦	吴君实	陈志陆	黄昌光
温 忠	赖芳赓	陈显尚	张思南	刘武琨

以上共百四十名，尚有七人姓名待查。至学生性别、籍贯、年龄等项，政治委员会已制有统计表，录之如下：

- (一) 姓名：男一百三十九人，女八人。
- (二) 省别：广东七十一人，湖南二十八人，江西十人，云南七人，四川七人，江西五人，湖北五人，浙江三人，贵州三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未详三人。
- (三) 年龄：二十岁以内者三十六人，二十五岁以内者八十六人，三十岁以内者二十人，未详五人。

(四) 婚嫁：已婚嫁者四十五人，未婚嫁者九十六人，未详六人。

(五) 职业：学界五十五人，教育界七人，报界二人，农界一人，其他七人，未详十人。

各生现正准备放洋，分为数批出发，第一批日内即可登船，直放海参威。每人须带路费二百五十元，由国民党津贴一百元，自备一百五十元。连日各方面开会欢送者有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国民政府亦邀集学生聚会一次。在此聚会中，汪精卫曾致勖勉之词，并与学生约定下列三事：(一) 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两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 孙文大学之中国学生，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 关于赴俄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在此叙会中，俄代表鲍罗庭有一长篇演说，说明孙文大学之目的。谓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则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诸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则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兹录其演说全文于下：

鄙人今天参加此盛会，殊为欣幸。诸君不久将往俄国，入孙文大学肄业，我和诸君，将来或者可以在莫斯科见面，或者诸君回国后，才得与诸君见面，均未可知。俄国革命以来，中国人往俄国去的，不只这一次。俄国革命的发生，在八年以前，当时许多中国人前往俄国，并有许多中国人都是为赞成俄国的革命，加入革命军，他们为革命军牺牲的也不少。诸君到俄国后，见中国人为俄国革命牺牲者的坟墓，便知道有许多中国同志曾为俄国革命尽力。他们的

力量在红军里是很有影响的。关于此事，报纸也曾记载，并说过苏俄政府有许多地方，是靠中国人才能成立的。当俄国革命成功，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在东方民族想自求解放而为革命运动的时候。时欧洲战争未竟，他们表面上，说是为民族自决，但其结果，非常使人失望。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的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不特失望，且渐觉悟。尤其东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遂□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这般人厌弃巴黎，舍之而往莫斯科，但那时候，巴黎与莫斯科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比较比较。巴黎在那时候有煤，有面包，有牛肉；莫斯科在那时候，无煤，无面包，无牛肉。一方面于物质上有优良的享用；一方面天寒无所抵御，饥饿迫人，亦不遇得些乌黑的面包，饮些清淡的汤水。时适东方大学成立，埃及、中国、波斯、高丽各民族的国民前往求学的不知几多。他们尽可以到居住舒适、饮食丰足的欧美各国去读书，为什么一定要到饥饿交迫的莫斯科去求学呢？这也没有别的缘故，他们都是想去莫斯科研究革命的学说，求得革命的经验。有了这种学说与经验，他们便可回去救国救民。所以他们为要安慰他们精神的饥饿，就能够敌得过一切肉体的饥饿了。自此以后，俄国的状况，渐渐地变更了，反革命派也渐渐扫清了。阻碍既除，发展便易。生活问题亦因之而解决，煤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牛肉饼干比巴黎还要充裕，起居饮食都很舒服了。但是这种物资的进步，并不使我们抱着丰衣美食的思想，而忘了革命党人的精神。在一个大团体中，自然难保没有一部分不肖的党人。惟此是例外，那般大多数党人，依然保存革命的精神，努力革命工作。现在于东方大学之外，又有孙文大学之设立，孙文大学的目的何在？他的组织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不能以短少的时

间，向诸君作详细的报告，诸君抵莫斯科以后，自然可以明白。今日不过随便述其大概。欧美各国见人家去那里留学，多表示欢迎，并且说科学是无国界的，是无党派的，科学是大家所公共的。按之事实，究竟对不对呢？这不过帝国主义者的面皮话罢了。我们相信科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就用以压迫弱小民族了。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就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我们相信无论何种学校是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的宣传机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银行家摩根所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为反对银行资本利益的宣传。芝加哥大学，是美孚火油公司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反对托拉斯制度的提倡。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的。至于德国的学校，何曾不如是。英国的学校，也何曾不如是。帝国主义者以学校为他们帝国主义宣传的机关，我们便要有学校为我们国民革命宣传的机关，每个学校，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孙文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将来在此校毕业之学生，可以代替在帝国主义的学校受过教育的留学生，担任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在许多留学生均不知道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日诸君由俄国回来，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全靠诸君本着革命党人的精神，为革命学说与经验的研究。将来回国之后，便可用之以达我们解放中国的目的。这种大工作，一定遇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值得牺牲，以征服这种困难，因为我们所抱的目的，是最伟大的，是求中国民族的解决。诸君将来都是为中国国民革命努力的。中国的命运，是在诸君的手里。诸君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祝诸君的成功！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 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1925年12月20日)

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军阀宣传机关之一种。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个报从前是叶楚伧等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节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文字之该报所认为“过火”者，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善无微不至；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能宣传；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告。工人的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本年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远不及研究系的机关报；近数月来广东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军阀运动肃清反革命派等重要消息该报多不肯登载，而对于孙传芳的军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凡此皆该报反动的预兆，个个革命派党员都早已十分不满意该报，该报此时不过借北京右派会议为“正式反动”的宣告而已。该报自从十一月二十日表明了“正式反动”以后，连日做了许多攻击

左派的宣传，这自然是该报的本分。因为该报如果不做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资格，便不能向上海工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们承认该报的反革命地位，便不能达到该报反动的目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我们觉得十分有理由。这个证明了国民党左派之强固，证明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之发展，证明了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证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已是快要到来。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晨报》《醒狮周报》等何以近来攻击国民党、共产党比从前特别激烈，以及国民党右派领袖们何以必须于此时在北京开会以反对广州左派领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关于上海《民国日报》之处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业经议决派员查办并通电各地各级党部申明该报之反动荒谬行为。兹将电文录下：

分送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并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哈尔滨各党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江苏省党部，杭州浙江省党部，长沙湖南省党部，南昌江西省党部，武昌湖北省党部，重庆四川省党部，厦门福建省党部，南宁广西省党部，广州广东省党部，并转各级党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馆，海外各地党部，各同志均鉴：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已派员查办。谨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寒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1925年12月20日)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国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郑润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麟，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能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俄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雇用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庭；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增加一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1925年12月20日)

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既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现今日北京右派会议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鸿楷、郑润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恺后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怒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比在“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说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部分并无诚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

实际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右派的最大本领

(1925年12月20日)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论说：“只有怕革命党的军阀，哪有怕军阀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话：“中央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有军阀的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而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以为中央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军阀。《民国日报》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的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言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到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祺瑞容许了右派在北京公开地开会，他能容许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北京公开地开会吗？该报又谓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祺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未稳固，压迫国民党的政权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冯玉祥手里。没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的。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许他在北京公开地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须秘密起来，

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反动军阀盘踞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员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议，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组织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地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他们也能不看党的决议案背得出；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们一听见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嘴，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傻了。他们议决了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们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龙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们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地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1]

(1925年12月26日)

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该报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外来电常常加以压抑，或删削不肯尽量登载，以致有同一之文电或新闻，《民国日报》不肯登载，别家报纸反肯登载之事。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抛弃本党地位，极力拥护安福系卢永祥，有“义存卢存，义亡卢亡”之语。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之大登压迫工人有理之广告，工人之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之宣传尚不及研究系之机关报。近数月来本党在广东方面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革命的争斗，凡属重要消息，该报均不肯发表，以致各地党部及社会均不明白广东真相，而对于孙传芳之战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自十一月十二日起该报竟公然拥护北京右派会议，攻击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完全站到反动地位，其言论记载荒谬已极，以较上海申、商等报对于本党的态度该报还差得多。处置之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

[1] 这是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至新报如何办理，当另案计划。奉函审查该报并拟具办法见复等因，兹将审查并办法结果报告如右。此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5年冬)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本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

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1]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

[1] 黄兴（1874—1916），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领袖。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任执行部庶务，曾直接领导多次反清的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去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未参加，转赴美国。章炳麟，即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理事、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1]，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

[1]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在加拿大组织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自任会长。其宗旨是保救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

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央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1]。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自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2]

[1] 欧事研究会，是民国初年建立的政治团体。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另一部分党员同孙中山意见分歧，另组欧事研究会，参加者有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等百数十人。黄兴虽已赴美，仍列名其间，会员隐以他为领袖。该会反对以急进的革命手段对待袁世凯，而主张缓进。后改名政学会。在袁世凯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亦参加反袁联合战线。

[2]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曾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曾任云南省督军、省长。熊克武（1885—1970），四川井研人。曾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1]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2]

[1] 茅祖权（1883—1952），江苏海门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 指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等10余人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爱国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

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多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多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1]，扫平郑、莫^[2]，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

[1]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2] 郑、莫，指郑润琦、莫雄。

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沁园春·长沙

(1925年)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2]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3]争流。
鹰击^[4]长空，
鱼翔^[5]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6]寥廓^[7]，

[1] 沁园春，词牌名，由东汉的沁水公主园得名。

[2] 橘子洲，又名水陆洲，在长沙西面的湘江中。

[3] 舸，大船。这里泛指船只。

[4] 击，搏击，这里形容飞得矫健有力。

[5] 翔，本指鸟盘旋飞翔，这里形容鱼游得轻快自由。

[6] 怅，原意是失意，这里用来表达由深思而引发激昂慷慨的心绪。

[7] 寥廓，指宇宙的广阔。

问苍茫^[1]大地，
谁主沉浮^[2]？

携来百侣^[3]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4]。
恰同学少年^[5]，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6]方遒^[7]。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8]
粪土当年万户侯。^[9]
曾记否，

[1] 苍茫，旷远迷茫。

[2] 沉浮，同“升沉”（上升和没落），比喻事物盛衰、消长。

[3] 百侣，很多的伴侣。侣，这里指同学。

[4] 峥嵘岁月稠，不平常的日子是很多的。峥嵘：山势高峻，比喻超越平常，不平凡，不寻常。稠：多。

[5] 同学少年，毛泽东于1913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毛泽东和萧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动。

[6] 挥斥，奔放。

[7] 遒，强劲有力。

[8]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指点，评论。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抨击恶浊的，褒扬清明的。

[9] 粪土当年万户侯，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粪土，作动词用，视……如粪土。万户侯，食邑万户的侯爵，借指大军阀，大官僚。万户，指侯爵封地内的户口，要向受封者缴纳租税，服劳役。

到中流^[1]击水^[2]，
浪遏^[3]飞舟？

[1] 中流，江心水深流急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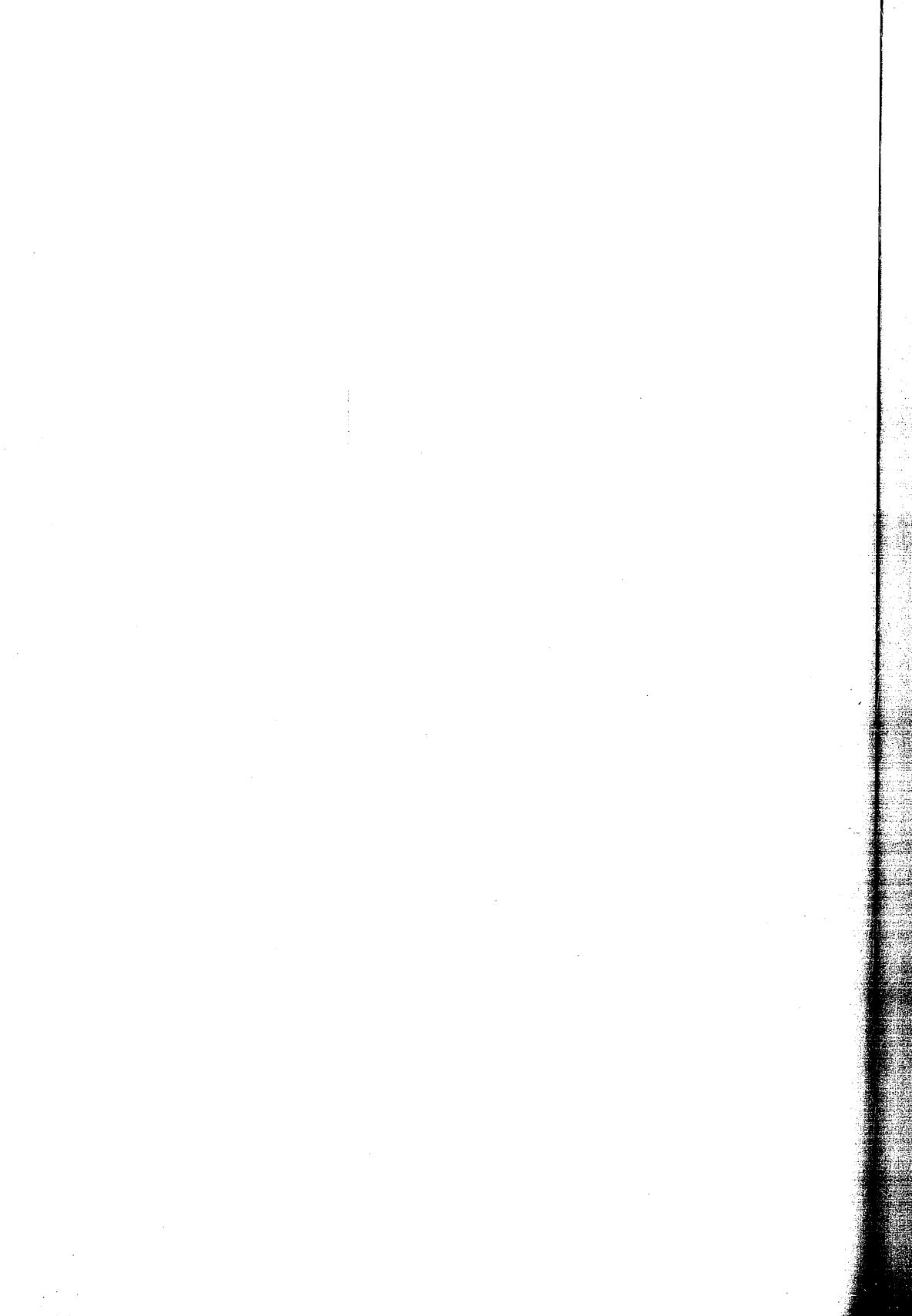
[2] 击水，这里指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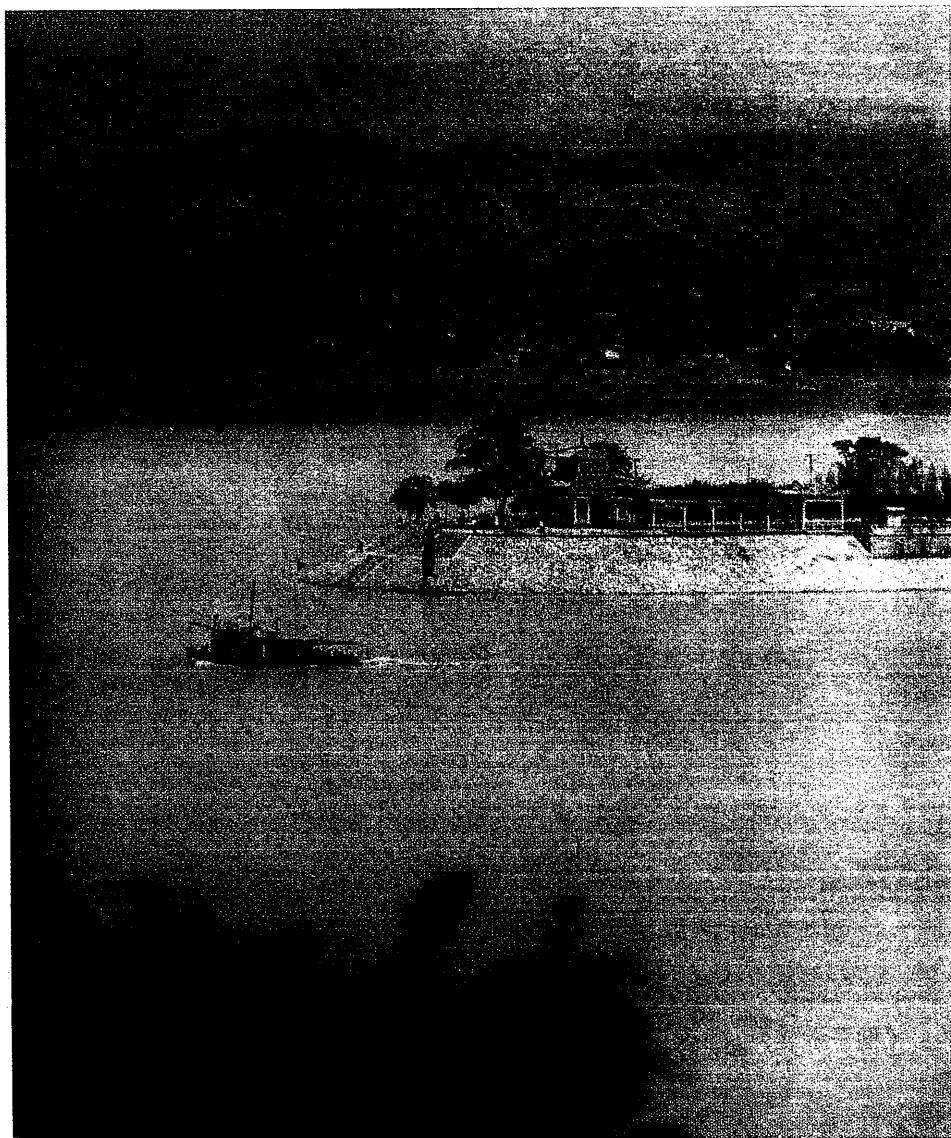
[3] 遏，阻止。

月相。恰因過水，
橫綫著，崎嶇處。
手，因之而僵，
者生焉。其後，
掉床方通。指點
法，激揚文字，
畫，也為手焉。
修。舊記云：船中流
擊水，浪遏飛
舟。右以固其言。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

三度秋深北
去猶子洲以。第
山故道。唐風古漢。
江浦江邊。古廟
爭流。鹿鳴鶯
鳥。萬物相得。萬
事無往不順。因。
後重慶門。舊
聞此。誰主濟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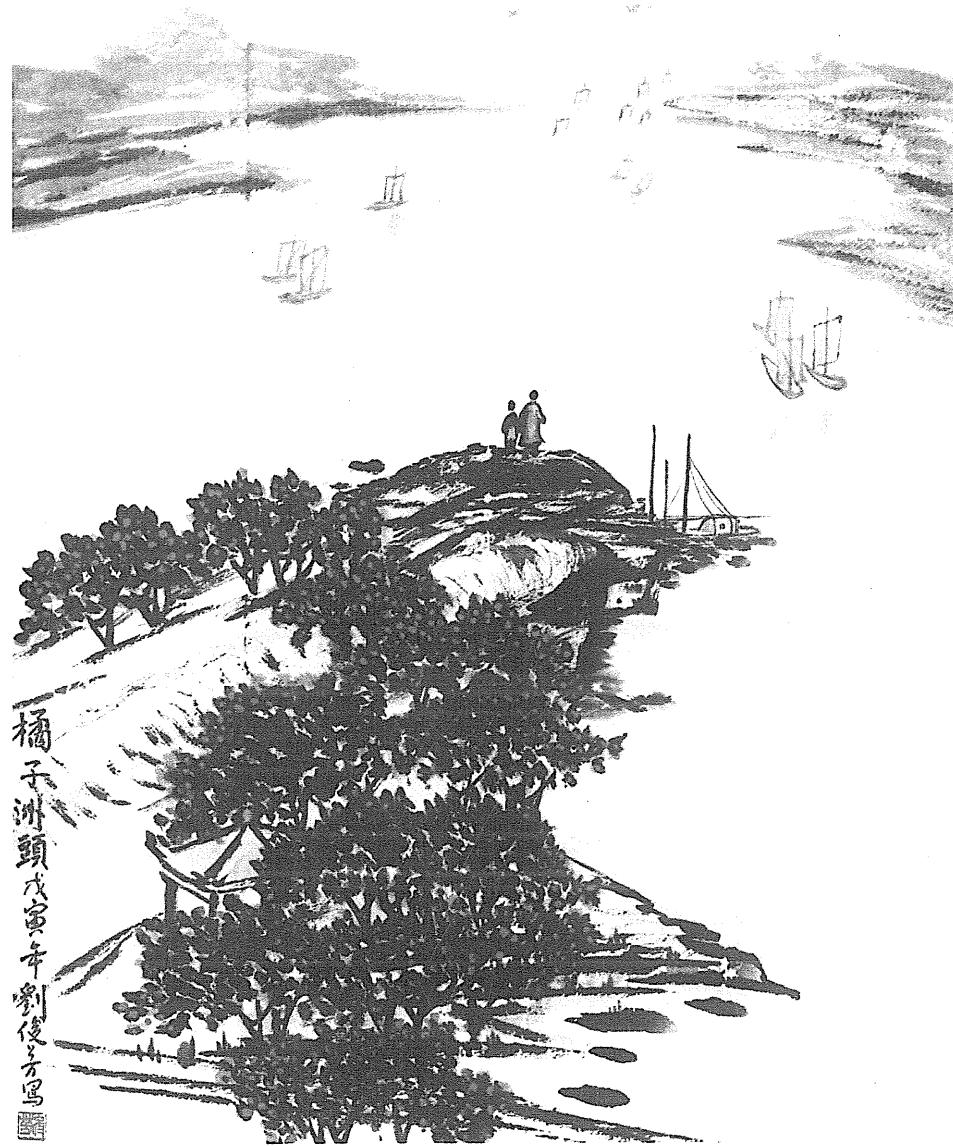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友人常到湘江橘子洲游泳，然后登上洲头，畅谈人生和未来。图为橘子洲望江亭。



《橘子洲头》(油画)



《橘子洲头》(诗意图)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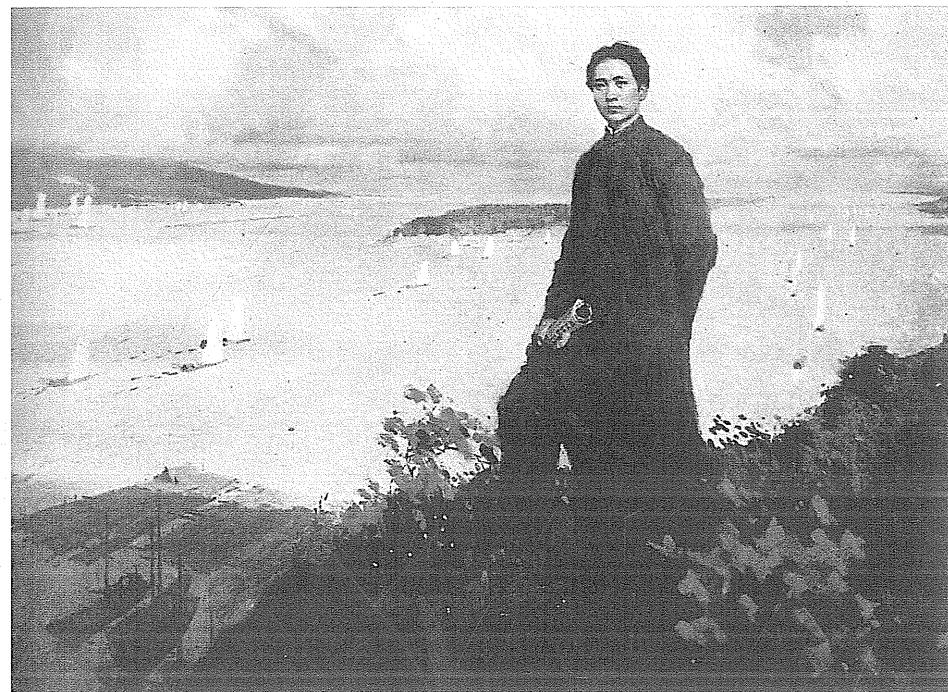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宣传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意图)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意图)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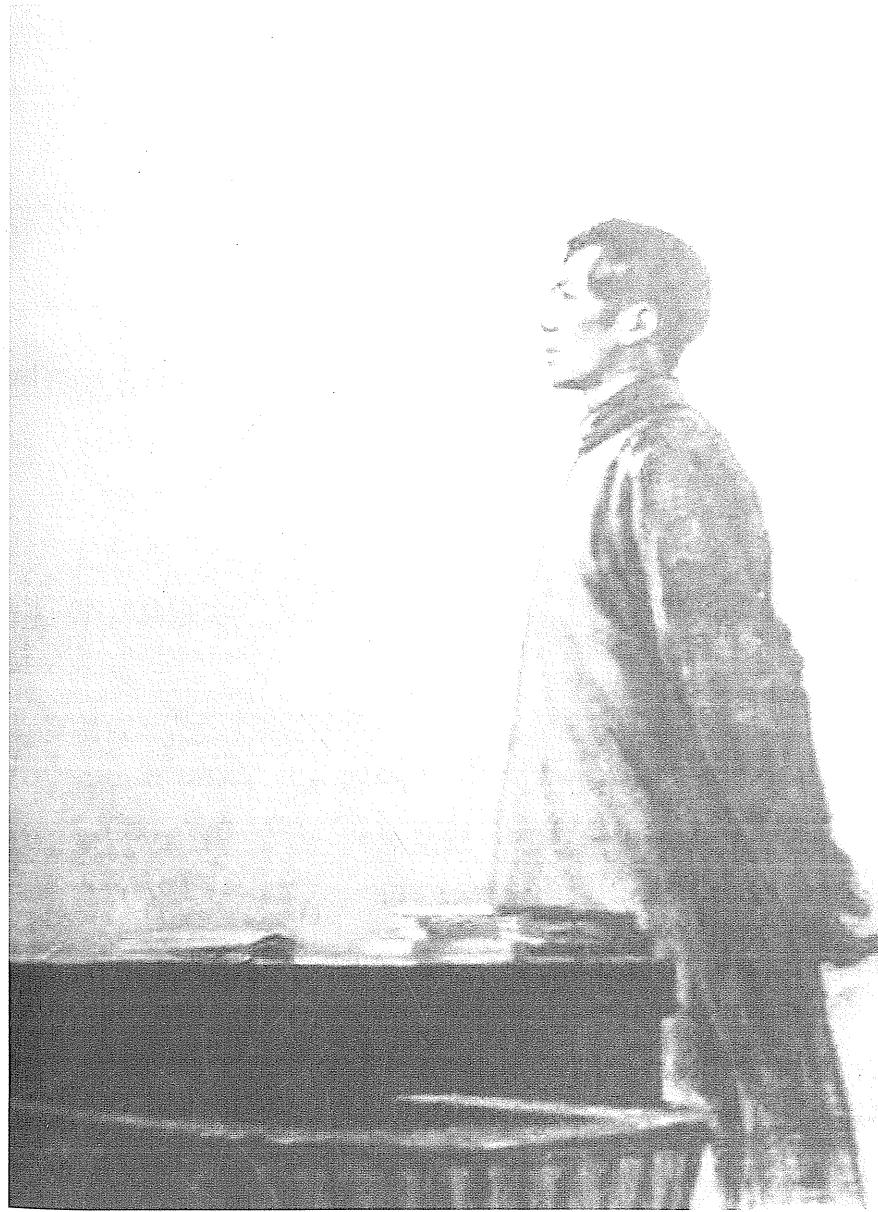


《鹰击长空》(诗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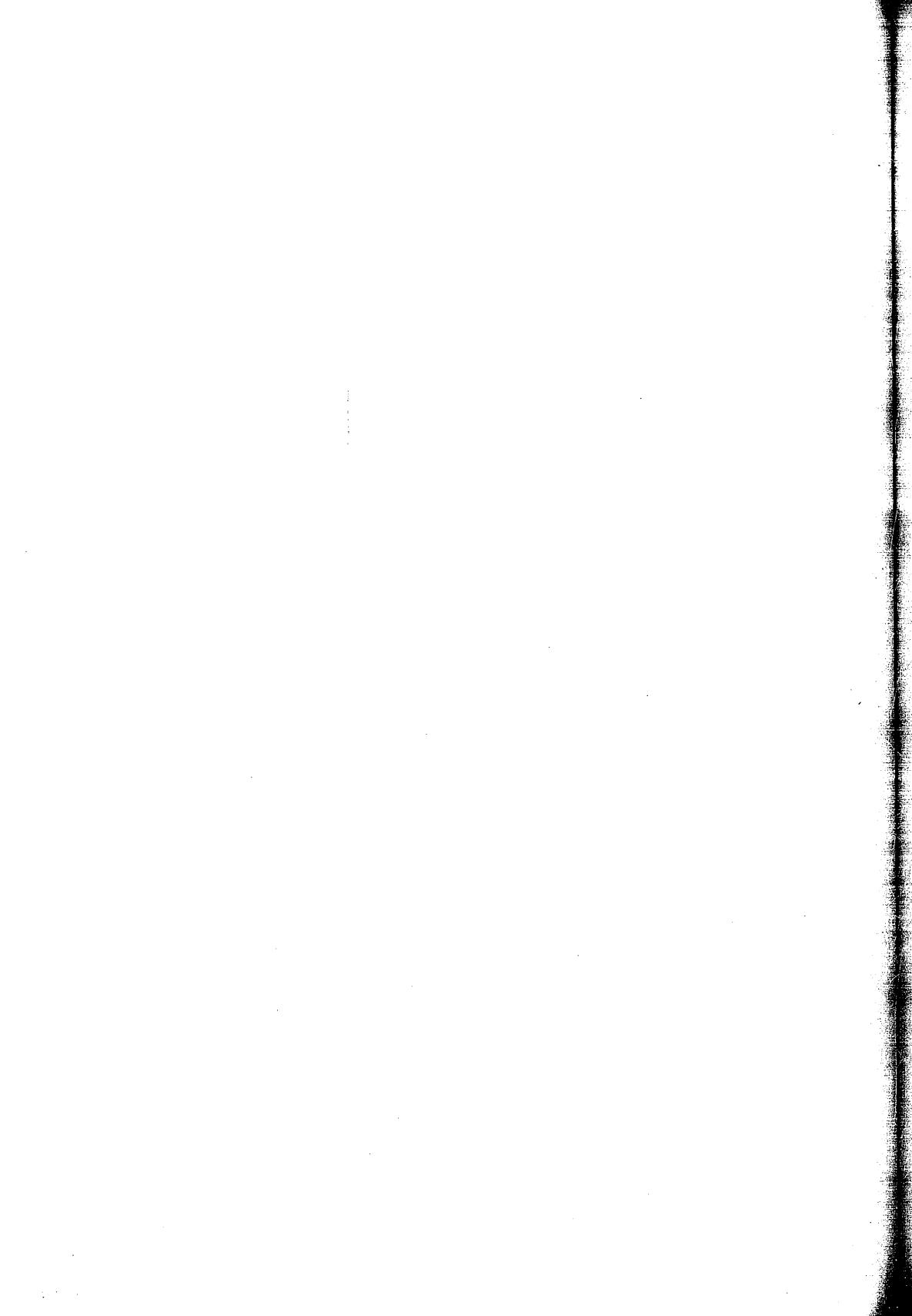


《激扬文字》(中国画)

1926



《夜尽（毛主席在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油画）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 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1926年1月1日)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贫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

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的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为都市商人购买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

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现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刻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农民协会的忙。但其性质极易妥协，其血统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剩余，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的小地主颇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们中那些什么“老”什么“公”什么“胡子”的“谨防过激党”“谨防共产”的宣传颇相信，自然这些谨防的话又是从大地主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嘴里出来的。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于现代的革命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

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说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是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只能保守，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较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三种自耕农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

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为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做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粜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

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扣”，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毛澤東

你跑到農村中出去，無論你到甚麼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見有下列八種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農

半自耕農

半益農

貧農

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

度慈的命草公對其及拆分的銀陪各中民農園中

這八種人分成八個階級，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於其心理即其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

中國大地主的來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貴族後裔及現在的官僚軍閥，一小部分

是城市富商買賣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極少，其利益建築於對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五種農民的嚴重剝削之上。其剝削方法分為五種：第一種重租，自古百分之百至百分之八十。乃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此種剝削極其普遍而慘酷；第二種高利貸，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這種剝削之慘，有時較重租更甚，往往石固借貸利息，數年即完本破產者；第三種重捐，乃用一種壓力強迫自耕農半自耕農按畝出捐以充圍防局經費。此兩防局（或名民團）乃地主階級的武裝，為鎮壓農民暴動維持地主階級剝削制度之必要的武器。第四種為對於雇農的剝削，即剝削其剩餘勞動。但中國尚少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多不親自經營土地，故此項剝削小地主較多，大地主較少；第五種為與軍閥及官吏更合作，在本年包徵並征田賦，而來年索取倍於原額的餘款，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國的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後原因。大地主階級人數，以收容農五百畝以上者計算，在農民中大概約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屬在內），在全國三萬萬三千萬農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占三十二萬人。

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

宣传报告^[1]

(1926年1月8日)

文字宣传

(一) 日报

(甲) 党办者：

(1) 上海民国日报 以前系叶楚伧等的私人报，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收归党办，支扩充费数万元，以后月支经费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然自始即不能算作真正的党报，其言论记载荒谬之处甚多。西山会议后，变为反动派的机关报。

(2) 广州民国日报 以前系广州市党部办，十三年十月始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发行数由千余份增至一万一千余份。

(3) 广州国民新闻 以前系反动派机关报，廖案后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改为党报，广东省党部成立归省党部管理。目前日出七千五百余份。

(4) 香江晨报 曾有一个时期收归党办。后叛入敌党，现已停刊。

(5) 香港新闻报 十三年七月起脱离陈炯明关系，属本党指

[1] 本篇是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挥。罢工事起被港政府封闭。被封前销数达八千余份，销路海外多，香港次之。

(6) 北京民报 出版未久，被张作霖封闭。

(乙) 同志个人办或用社团名义办的日报，调查未周，不计。

(丙) 海外华侨党部所办大小日报颇多，调查未周，不计。

(二) 周报

(甲) 党办者：

(1) 中国国民党周刊 第一次大会后中央所办，不久停刊。

(2) 广州民国日报 曾附属有文学、科学、孙文主义研究、经济、平民、农业、妇女、影画等八种周刊，然不久即停。

(3) 党声周刊 归中央宣传部主持，初附属于广州民国日报，后独立，然不久亦停。

(4) 评论之评论 第一次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附属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不久停刊。

(5) 上海民国日报 附属之科学、平民等几个周刊，不久均停。

(6) 浙江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浙江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7) 新民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湖南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8) 中国国民 西山会议后由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主旨在于对抗西山会议及右派之言论，现改为三月刊。

(9) 武汉评论 湖北省党部主持，继续未断。

(10) 政治周报 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于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乙) 广东方面各军及各军校所办周报半月刊等，如黄埔军校的《黄埔潮》、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攻鄂军的《人道》等。

(丙) 同志主持用社团名义办的刊物，此类颇多。如学生团体的刊物，各地都有，如《中国学生》等。工人团体的刊物，如《工人之路》等。农民团体的刊物，不多，广东方面稍有一点。军人团体的刊物，如广东方面之《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之《新海军》等。妇女团体的刊物，全国约四五种。其他团体所出刊物。

(三) 月报

前年有《新建设》《新民国》二种，不久即停。现只有中央农民部主持之《中国农民》一种，初出版。

(四) 通讯社

- (1) 中央通讯社 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颇有成绩，办理已两年了。
- (2) 其他有关系之通讯社数家。

(五) 书本

(1) 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三十种（内关于孙先生的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十二种，关于其他同志的如汪先生讲演集等十一种，中央宣传部编纂的约五种），共发行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册。惟散发偏于广东方面。

(2) 各地的 不明，无统计。

(六) 传单

(1) 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共发传单八十三种。惟散发尽在广东方面。

(2) 各地的 不明，无统计。

(七) 标语

(1) 中央的

广州市中央宣传部与广州公安局合作，做了两种标语：一种钉在电线柱上，一种写在墙壁上。均取材于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及孙先生之遗言。

(2) 各军的

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海军，黄埔军官学校，及第二、第三两军附设之军官学校，由各政治部主持，发布各种标语，为数不少，收效极宏。

(3) 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方面农会工会印发颇多。

图画宣传

(一) 图画宣传的重要

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

(二) 经过之成绩

(1) 中央的 去年四月起才实行，做得颇少，又偏在广东方面，分为下列三项：

- (甲) 每周供给四幅小讽刺画于广州民国日报（间有缺）；
- (乙) 每周出一种宣传画（间须两周或三周出一种）；
- (丙) 印刷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之小照片。

(2) 各军的

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的影响很大。

(3) 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的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北京、上海两处也有一点。

口头宣传

(一) 口头宣传，在宣传中，在分量上，在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

(二) 在农民、工人、兵士、学生中召集会议，在此会议中作各种内容的演说，是为经常的口头宣传。

(三) 在各种政治变动或示威运动时，作各种的演说，是为临时的口头宣传。中央党部曾数次组织宣传队。各省各埠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五卅运动中及以后，做得很多。

(四) 负责同志于开党员会时，作政治的党务的报告，是为对党内同志的教育。中央党部于总理纪念周常行之。

两年来十四重要事件之宣传

(一) 本党改组 发布宣言政纲，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

其结果：

(1) 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效果。

(2) 统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粤海关事件 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很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

使民众认识了买办阶级的罪恶。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 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国同盟奋起。“反帝国主义”口号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争 民众从此对强大军阀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 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议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地认识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运动 使民众认识孙先生，认识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绝交宣言。

(十)五卅运动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地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

宣言。

(十一) 廖案 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不少。

(十二) 反奉战争 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军阀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驱逐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驱逐吴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恒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紧张。

(十三) 反教运动 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侵略。

(十四) 军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 本党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广东各次战役时所作之军民联合的宣传，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此一事仍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之一部分，不能不针对敌人的宣传去做，现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 帝国主义

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诬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

通信社之造谣诬蔑挑拨中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二) 各派军阀

国内各派大小军阀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 买办阶级

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比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可为代表。

(四) 研究系

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向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 安福系

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 联治派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 国家主义派

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

(八) 国民党右派

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议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

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缺点

从两年来的宣传中，发现了如下各缺点：

- (一) 党报不健全；
- (二) 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地做；
- (三) 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间，完全失去联络，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部负责人因此放弃职务；
- (四) 检察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
- (五) 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
- (六) 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
- (七) 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

(1926年1月10日)

国民党右派林森、邹鲁、谢持、张继、居正、覃振、石瑛、叶楚伧、沈定一、傅汝霖、茅祖权、邵元冲等，于全国反帝国主义高潮之际，左派同志苦战奋斗之时，在国民革命战线上，临阵退缩。酝酿渐久，由革命地位退入不革命地位，由不革命地位退入反革命地位，因而有所谓西山会议之召集。此西山会议，完全与帝国主义取一致态度，对于左派国民党及广州国民政府取了攻击的形势。消息传播，全国哗然。因为真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左派国民党国民政府，乃全国人民所爱戴，岂有号称国民党党员而反图攻击破坏之理？于是左派党员与革命的民众团体，群起反对，函电纷驰，目不暇给，十二月初旬情形，已略记前期本报。兹将十二月中旬收到各地攻击右派文电，列之于次，以供众览。盖全国数十万党员中，真正之右派不过数千人，最大多数均属革命的左派。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观于元旦日大会阅兵典礼场中，“打倒右派”之呼声震彻天地，可以知其趋势了。反右文件前回记至二十号，兹从第二十一号记起。

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

(1926年1月10日)

最近京沪民众起来反对段张，郭松龄倒戈相向，各重要省区民众均认此次政变为全国国民革命之表示，联叠向应，满于全国。因为此次战争，一方面可以看出全国反奉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倒段易于成功；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使直奉战争变为民众与军阀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将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各地民众有鉴于此，乃奋起作暴动示威，自北京勃发而后，上海、郑州、武昌、长沙各地一致奋起，革命热潮，震荡域内。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当此革命基础巩固全国反奉潮流高涨时候，自应急起直追，领导全国国民作统一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巡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必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各团体开过数次筹备会，决定十二月二十日为当示威巡行之期，发布宣传大纲如下：

援助京沪反段示威运动宣传大纲

(一) 素以用兵出名的吴佩孚去年失败之容易；张作霖自打败吴佩孚后声势之大不可一世，然而与孙传芳一接触而溃退，与国民军未开战而瓦解；此可证明中国的军阀已在崩溃极速度之中。

(二)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运动，因军阀张作霖之摧残，未能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因此民众对于张作霖欲加以铲除，使反帝国运动能得胜利。以日益增长之民众势力，以与日趋衰亡之军阀张作霖争斗，张作霖之倒败为当然之事。孙传芳所以能以少数军队在最短期间内未经一战，而将数十万奉军赶出苏皖，是因孙传芳适站民众势力的工具之地位故也。奉军因民众势力之压迫，内部必得发生破裂，此即郭松龄起兵反奉之事之所以发生。

(三) 去年□□□□，虽有中山先生之提倡兴□□，奈民众势力未能团结崛起，致使人民抢夺政权之时机丧失，而使军阀势力重新凝固，遂复藉政柄而继续其服务帝国主义以剥削压迫人民。此次执政军阀奉张已倒，如人民不起而代之执政，则政权将仍落于军阀之手。此次奉张之倒，系靠人民之不自觉的工具直系的孙传芳与奉系的郭松龄，而非直接靠人民自己的势力或其自觉的工具之势力。如人民现时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则军阀必将继续其统治于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之压迫与痛苦。因不论其继续之军阀为谁，其趋媚帝国主义与压迫人民则一，盖军阀之本性然也。

(四) 最近北京民众之暴动，即人民不愿再受此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压迫，而企图夺取政权之表示也。各地的民众应响应北京的民众运动，要求政权归诸人民，打倒段政府，组织人民的政府，保障

人民的自由，召集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五) 人民此种要求能否达到，颇系于国民军之态度，因北京政局自奉张失势，其重心完全转移于国民军。然而国民军之态度，完全依民众势力之雄厚与否而定，人民如果能有大规模的运动，对国民军以严重之表示，则国民军必可早日决定其对人民执政之态度如何。

(六) 广东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广东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极端重要的地位，广东之强固与发展，影响及全国运动之发展。广东在短时间内，已能将全省反革命势力肃清，香港已屈服，愿派代表解决罢工。广东人民而能在商议中一致拥护罢工工人，则罢工工人之解决必能保障罢工工人将来第二次的大运动。□□□□省已先后与广东表示亲善与不敌视的态度。广东政府已得人民的拥护，现更实行财政统一，整顿吏治，除盗安民等事，广东政府必能得人民更大的拥护。广东革命基础既已巩固，则国民党能向全国发展其运动，即国民党组织之全国发展，北伐军力之扩大。广东人民与全国人民，应协助国民党巩固革命基础与发展全国革命运动之各种计划。

(七) 人民夺取政权。国民革命之成功，有赖乎全国革命势力之团结与国民党之左倾。去年中山先生所号召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党内反动分子之破坏实为一大原因。此班反动分子今又在北京预备破坏国民党之组织，以摇动革命运动之领导，以阻碍北京民众之倒段运动。如国民党不能将此班反动分子肃清，则革命之领导不巩固，国民党革命之政策将受影响，全国的运动必受重大之损失。

(八) 口号：(1) 武装中国革命民众。(2) 打倒卖国的段政府。(3) 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4) 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5) 拥

护革命的国民党。(6) 召集国民会议。收回人民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 恢复各地爱国团体。(8) 拥护省港罢工。(9) 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准备出兵北伐，实行革命的统一。(10) 革命民众夺取政权。(11) 收回关税自主。(12) 驱逐关税会议的各国代表。(13) 释放反帝国主义被捕的战士。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十万群众集合于广州市之东较场，最多为工人，次为兵士，次为各界人民。会场旗帜纷飞，满场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青天白日党旗，及各工会的红旗。会场中分设三坛，中坛农工商界，主席为全国总工会李森，省农会何友述；右坛军政界，主席周逸群；左坛学界，主席为革命青年联合会沈宝同，广州学生联合会黎兆葵。坛之四周高竖“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收回关税自主”“恢复各地爱国团体”“打倒段政府”等等标语。正午十二时半开会，于簇拥高呼声中通过下列各项决议案：

(一) 对北方倒段运动之议决案

广东根深蒂固的军阀，在最短时期中，已被广东革命与代表民众的政府所铲除。有精兵数十万，并有强大帝国主义为后援的张作霖，未经攻击，而一败涂地。这正证明军阀崩溃之速度日加，而不能再延残喘。五卅运动以来，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虽有军阀之摧残，与反革命势力之破坏中伤，仍日涨不已。近日在北京、上海等处民众，又有大暴动之勃起。盖民众为发展其革命势力起见，及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起见，已急于夺取政权，使人民各种自由得保障，使革命的战线能一致，使指挥反帝国主义运动能统一。广东人民既已握得政权，以铲除广东省内的反革命势力，应与全国民众联合，一致以打倒段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并建立一保障人民自由、与帝国主义奋斗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态度之议决案

际此统治军阀失势，人民正在努力争夺政权时，国民军态度有举足轻重之势，是以本大会议决通电冯玉祥，与国民军，请其表明态度。决定为人民之武力，以援助人民夺得政权；抑决定再蹈奉张之覆辙，仍扶持段政府而使军阀势力重新凝固。

（三）对郭松龄之议决案

郭松龄既因人民势力之压迫而对张倒戈，使民众势力之发展，得长足之进步，应更毅然决定自己愿为人民之自觉的工具，以促进人民要求之实现。否则如背弃民众而愿代张以领导奉系势力，则自己之覆灭，将较张作霖为尤速也。

（四）拥护罢工工人与香港交涉之议决案

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此次为中国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忍饥耐冻，坚持至六个月之久，为中国革命史上所未闻见之牺牲与毅力。此次罢工非特对香港帝国主义给以绝大打击，而争回中国八十五年前的尊荣，并已帮助革命政府，完成其扫灭反革命势力，与巩固广东革命基础之功业。现在香港方面与罢工工人解决罢工，是以我全省人民应一致拥护工人之要求，务求达到胜利为止。不可让我为革命为民族辛苦奋斗牺牲之二十万同胞，单独受损吃亏也。

（五）对林森、邹鲁之议决案

林森、邹鲁等前此上担任外交团领导之责，负广东人民之付托，北上与帝国主义奋斗及监督卖国政府段氏之卖国勾当。林森、邹鲁非特背弃广东人民之托付，自北上对帝国主义未加一次之攻击，对段政府之卖国勾当，不加以监督，并与国民党叛党分子结合，企为破坏的国民党作反对广东人民所拥护广东政府之宣传。近日更与段政府勾结谋破坏北京民众推倒段政府之运动。本大会议决

通电，申讨其卖国卖省卖党之蠹贼。议决案通过后，高呼口号，整队巡行，均手挥小旗，浩浩荡荡，由东较场出惠爱东路，过西□□，经太平南路，到西□□散队。沿途散发传单，共计四五十种，数十万份。

关于宣传决议案*

(1926年1月16日)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贯彻本党唤醒民众的政策，并于最短期问实现先总理的遗志起见，视宣传工作为现在最切要的企图。今特将宣传计划列下：

(一) 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的宣传工作。

(二) 欲实现宣传的统一，中央及各省的宣传部，须致力于目前政策的解释。本党所颁行的一切论文、杂志、日报、传单、布告、指导群众集合的训令和为示威运动所拟定的口号，都应集中于此目前的政策。

(三) 本党目前急待实现的政策，先总理的遗嘱中，已有明确规定。第一次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实现此政策的方法，已有详细决议。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应使总理的遗嘱深入农工商学各群众，使他们明了遗嘱意义，和遗嘱实现后全国各族民众怎样能得到莫大的利益。中央和各省宣传部，应当根据“总理遗嘱的实现，就是中国解放的成功”的口号，进行宣传的工作。

(四) 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虽说有时党所宣传的减租、免除苛税、扑灭军阀、增加

工资、确立教育基金、改良商业、发展实业等政策，不能即刻全部实现。总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

(五) 如果将党对民众所应做的工作，继续列出作中国民族的解放途径，定为民众所认识。于是真正引导民众完成国民革命的群众的党，才能实现。

(六) 因此中央和各省委员会的宣传工作，必定根据群众的实际利益去执行。无论对学校或乡村的群众，或对工厂的城市的商店的群众，应为这样做去。所以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口号是：“依据民众的需要，实现先总理所指示给我们的国民革命。”欲解放中国，除此之外，再无捷径。

(七) 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现，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宣传部对于此点，应明白指出。国民党虽主张增加工资，但同时并不妨害本国产业的增进。不但不妨害本国产业的增进，反力促进其发展。这也正和十九世纪欧美的工人罢工运动，不但没妨害产业的发展，反而促起产业的进步，同一理由。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现在剥削农民的，一部分是封建式的地主，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革命派，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如此，宣传部方能使负担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建立稳固的基础，并于最短期间，完成总理的遗志。

(八) 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党的重心，就

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关于这一点，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九) 本党的宣传，应注意普遍于全国各处。举凡乡村、省县、商埠重镇的大小事件，均不应脱离本党的视线。本党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就是本党处决该事件的设计者。所以宣传部遇有事件发生，应首先贡献本党和全国民众以精确的报告，并且解释该事件的原委及其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并且指出怎样利用这种事件，以实现本党的政策。

(十) 军队的组织，有军需部供给全军的服装和军械。宣传部之在本党，正和军队里的军需部相类。宣传部供给党员及民众以政治学识，行动的方策，使能于国民革命的困苦过程中，努力奋斗，在各种互相衝突的意见和情绪中，坚持本党的主张。宣传部应指示各党员如何战胜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的恶势力。更应变换冲动的怨观的缺乏自信心的党员，使成为健全的革命势力。

(十一) 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跃最敏捷的机关，故凡本党能纂述书籍小册子编辑论说拟就宣言和口号的党员，都应参与宣传部的工作。凡不能亲身参加宣传部工作的著作家，或新闻记者，应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做宣传工作。所以宣传部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十二) 宣传部和党员及民众的联络，极关重要，设使宣传部所发出的文告训令，不能为党员所应用，或纵能应用而不能适合民众的需要，宣传的目的便完全失去，宣传部完全无用。欲迅速地供给宣传材料，必须交通敏捷，宣传部的组织健全，才能办到。中央宣传部应和各省宣传部本党各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依规定的时间，藉书信电报专差，保持密切的联络。

(十三) 凡在本党统治区域以内的宣传部，致力于普通宣传工作，应唤起民众拥护本党政府的同情。

关于党报决议案

(1926年1月16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视为最重要之点，就是宣传本党的革命原理——整个的三民主义——以期三民主义随国民革命的成功，完全实现。三民主义之中，只实现其二一而不能全部实现时，国民革命依然不能谓之成功。不过本大会深知民权和民生两主义必待民族主义确实完成并且稳固地建立起来，才能实现。这是我总理的遗念，本大会所矢志接受的。

第二次大会闭幕以后，第三次大会开会以前的时期，本党应当鼓动并且集合所有的革命力量，在最短期间，促成民族主义的实现。这是本党最切要的工作，民党党报所应首先致力的。

民族主义的意义，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是在使中国脱离次殖民地的境域，进而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同立于平等的地位。总理谓次殖民地就是受多数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所以次殖民地的情况，较统治于一个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更为厉害。总理又说民族主义，是在使中国统一并且受统治于五权宪法的中央政府。

第二次代大会，要求本党党报时时指示民众民族主义之中有两种要点：第一，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第二，是依据五权宪法实现国内统一的政府，想实现国内统一的政府，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

本党机关报，应指出在中国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境域以前，想着依据本党的五权宪法或其他法律实现统一，都是带有危险性的梦想。过去本党之失败，都可引为鉴证。

本党党报，更应指出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欲求经济的进步以迎合中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全国商港经济的发展，愈见显著，外国资本家统治全国财政的势力，也愈见坚固；结果中国内地愈趋于穷困，本国的产业及银行事业逐渐变为外国经济的附庸，这是本党党报时时要注意指示的。本党党员之服务于各级学校，从事于社会经济的调查，并且对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完全同意的；应当参加党报的编辑工作，竭尽他们的知识和发表能力，去证明本党对产业发展的主张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的。

党报更应依系统的计划，指示给学生、工人、农人、商人，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他们怎样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农民群众得到福利后，本国货物的销场定要扩大；本国货物销场的扩大，引起劳力需要的增加，结果工资增加，生活状况改善；农工阶级的经济的改善，知识阶级（教师、工程师、经理）的服役范围也因之扩大。在这时期，商业自然有长足的进步。本党党报应指出种种的改善和进步，必须要不平等的条约废除、海关管理权收回、中国统一后，才能得到。所以全国的学生、工人、农人、商人，一定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救亡的方案，充满了中国。然而在这些方案里边，凡未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海关管理权的，本党党报应当指明这是危险的宣传，中国统一和解放上的障碍物。关于这一点，是党员特别要坚持的态度。党报的评论必须是建设的，不应一味是破坏的；容易为群众所了解的，而非专为少数人所阅览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更训令党报宣传以下的口号及政策：

(一) 广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二) 广东因在忠于总理遗训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的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在行政上、军事上、财政经济上，都得到了莫大的进步。广东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及行为渐有深刻的信仰。

(三) 凡反对国民政府或设法倾覆国民政府的政权，破坏国民政府的名誉或另外结合小组织谋不利于国民政府的，通是反革命者，或有意无意的帮助反革命者。

(四) 国民党在广东，正从事于统一全国政治的任务。国民党在广东的成功，将促成国民革命的实现。所有足以妨害广东的成功障碍，一定要不顾情面，不怕危险地去扫除他。

(五) 必须个个党员视国民革命的利益，不但重于自身的利益，党员的家族亲属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和国民革命的利益相比拟。

(六) 国民党不是一个互助的团体，乃是为中国的自由统一而奋斗的革命党。凡不能从事国民革命的工作，或忘记了这个伟大的责任，就是违反了总理和国民的希望。在国民党中，决不容这种事实存在的。

(七) 本党的纪律，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一中国的武器。凡违反本党纪律的就如同临阵脱逃的兵卒一样。

(八) 口头革命，不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或既受命令而不能执行的，都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其发表革命的言论，多做些革命的工作，方能促成国民革命。

(九) 本党党员因牺牲自身，惠爱同族，对少数分子施以严厉的手段，也是不能免的。四万万同胞，不能依和平的手段来统一，暴

力也是需要的。暴力的意义，就是组织和纪律。党员个人是本党所统制的分子，党员个人的利益是包括在党的利益中间的。所以党员的利益，应当为本党的利益而牺牲。

(十) 唯有组织良好纪律森严的国民党，才能于扑灭国内外敌人后，建立国民政府。先总理为中国奋斗，为革命牺牲，四十年间如一日，我辈死后者应当引为榜样。

(十一) 本党只要问党员：能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否？能努力作打倒军阀否？能努力建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否？如能，他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本党党报，对于国内事件多未披露解释，确是一个大错。党员的训练和党中领袖的养成，不能从抽象的原理中得来。必须利用现存的事实，向党员讲明，并分析其政治的意义，才能使党员增加革命的经验，鼓励革命的勇气。本党以时事为研究的对象，不断地为全国民众奋斗。本党党报就是全体党员的导师。党报解释时事，应当指出起因，和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例如苦力为帝国主义者所殴辱一事，意义非常伟大，本党党报应即在党报重要栏内将它发表，并且就此阐明国民革命的必要。工厂矿穴里工人的苦况，应当予以详细的描写，工人的生活困苦，原因是在中国产业的落后，产业的所以落后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军阀常假借为国为民而战的口号，耸动群众的视听，本党党报应当指出事实攻击他们言行的矛盾。中国报纸书籍中遇有传播帝国主义的文明，宣扬他们对中国的口头亲善时，本党党报都得加以抨击，不可轻易放过机会。本党党报，不只要指出帝国主义者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更应指出文化的侵略，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思想，分裂知识分子的队伍，麻醉一般革命民众的心理。本党党报，应特别防止这种危险，关于此点党报

应当宣传以下的口号：

(一) 中国的自由统一，要靠中国环境内所产生的思想，尤其是群众在要求生存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知识，才能实现。帝国主义的学术是不能救中国的。

(二) 学术思想、学术研究，若不是为民众要求社会经济的解放及为民众要求生存，都是毫无价值的糟粕。

(三) 知识分子的口号，应当是：“到群众里去。”中国的解放，唯独在群众中才能找到。

(四) 凡是脱离群众的分子，在社会上就失掉了根据。他的一切活动统无效力。

(五) 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元来克服我们的思想，我们应当很奋勇地战胜他们的诡计。

(六) 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来传播耶稣教，这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以上各点，本党党报应特别宣传并指示知识分子应努力介绍民族主义于全国民众。勿甘作传播帝国主义文明的工具。

第二次代表大会，十分重视党报的工作，故训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执行委员会在日报上、周刊上，坚持本党的宣传政策，不容犹疑。日报和周刊的编辑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会任命，并且监督他们的言论。中央和各省委员会对于党的政策既负全责，故得斟酌情形撤换编辑员或取消该宣传机关。

中央党部设立调查员，供给报告及论说材料于本党各党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应依本党对于某项时事问题的决议，按期通告于本党各机关报。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6年1月18日、19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二日第二十三号

日期：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十八日

时间：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三十分

出席人数：一百八十人

主席：汪精卫

秘书长：吴玉章

记录：速记科

(中略)

主席：现在把总章所应加修改者，每条来讨论。

主席：第十五条，有没有异议？（无异议通过）

主席：第二十四条有异议没有？

毛泽东同志动议：在“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下面加上但书，“如有特别情形时得由该省党部许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

三二号于树德同志：一星期开纪念周一次，如果事实上有多少

困难，应该给他自由变更，加上但书是对的。

一四〇号刘诵芬同志：加上但书，是比较好一点。

一三九号方维夏同志：本席也以为加上但书是好的。

主席：各位对于加上但书，有异议没有？（通过）

（中略）

主席：第七十三条，有没有异议？

一四六号杨暗公同志：在第二个“其他”下面，应加一个省字。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此次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人数很多，本席以为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可以兼其他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事实上也是可以兼而且应该兼的。

.....（以下略）

第十二日第二十四号

日期：元月十八日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时三十分

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

主席：汪精卫

秘书长：吴玉章

纪录：速记科

.....（中略）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决议案

..... (中略)

四、主席：现在商民运动决议案已分派各位，请各位讨论。

九十八号侯绍裘同志：二章第六条本席以为不应该将党与商人组织混而为一。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以为商民协会章程不必列入决议案内，可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

甘乃光同志：章程在这里讨论确是很难的。最好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酌定。大会现在只把八条决议案讨论即可。

五十八号陈公博同志：大会只应决议原则，章程总不要说到，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好了。

(附议者十人以上)

主席：以赞成商民运动决议案的八个原则，但商民协会章程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者举手付表决。(大多数通过)

五、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

..... (中略)

主席：请党务报告决议案审查委员报告审查经过。

二〇一号詹大悲同志报告。(草案文另附)

主席：对于决议案有无异议，请众讨论。

四十六号黄国伟同志：对于案内第（二）条（丙）项：“增高各省党部及海外总支部之地位，及扩大各省党部及海外总支部之职权”，各特别市党部，应请一律增高及扩大，并明白规定。

主席：有无附议，附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立。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六）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

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

三十七号周守愚同志：党部之上应加“最高”二字。

十号范鸿劼同志：主张改为凡有发表政治主张的言论。

于树德同志：如此改法，未觉完满，因为党员发表政治的言论，实在天天都有，如果每件都要得党部许可，将不胜其烦，事实上实不可能。应于“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之下增加“不得与本党的政策及决议有所抵触”句。

五十九号高语罕同志：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之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故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五十九号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辞，字数虽小，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

..... (中略)

主席：现在有三个修正案，先将于树德同志修正“凡有发表政治的及党务的言论，不得与本党之政策及决议有所抵触，凡有创立研究的会社，先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修正文付表决，赞成者举手。（大多数举手通过）

主席：各位对于本决议案，尚有无讨论？

..... (中略)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第二条（己）项“各重要区域”应改作“应于适当地点”。（附议者十人以上）

主席：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

一六三号张文卿同志：（八）款“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应改为“遵守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之主张”。

六十三号张廷灏同志：应改为“先总理有见及此，因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如有党员不明白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之遗旨，在党部内仍发生纠纷，应以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

八十一号许卓然同志：此等修正文字，似有偏重一方面语气，认为不甚适合，仍请大家讨论。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

五十五号袁同畴同志：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决议案持此等态度，恐愈增误会和纠纷。此次西山会议，彼以反共产为号召，其实我们认他只是反革命，绝不是共与反共问题，这是绝无疑义的，但我们黄埔军官学校同学，亦有此种争执，他们也自己承认，讲堂上可以吵嘴，对帝国主义却共同攻打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本决议案八项条文规定，如有争执，可在党部指导之下公开讨论，亦不过治标方法。如望解决此等纠纷，其治本方法，不可不讲。就本席近年来办理黄埔军校经验所得，深知党内此种纠纷，实非主义之争，因为三民主义即包括共产主义，两方之目的实相一致，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有误会的。他们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所以本席以为欲从根本解决最是重要的，就是给两方互相认识。就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

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更有声明的本人固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也并没有加入其他反共产的任何团体。对于两方，绝无畸轻畸重之意，且对于共产党的同志，也绝对尊重。现在愿以至诚的态度，提出大会，请大家解决。因为这个问题，若无根本解决，使以后再生纠纷，便不是好现象。（附议者十人以上）

张国焘同志：袁同畴同志提出的三点，都是非常之好，但是实际恐不能这样。先说第一点，因为如果全国都系广东一样便没有困难的，因除广东以外，就实在办不到。如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给国民党最高党部知道，是不成问题的。但党部非常之多，区分部也是党部，国民党员中也有许多不明这种意义的，若要下级党部也知道，恐马上发生危险，或者在广东没有危险，难保不在别处有危险。次说第二点，原本政党有公开的自由，但在现在中国军阀压迫之下，共产党除却秘密进行，却无办法。如果活动公开，则警察侦探，马上就把你拘捕，共产党同志在北方被害者已有数人，可为先例。所以活动公开是不可能的。所以总理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只问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守不守本党的纪律，而不问其他，就是如此。如果规定条文要共产党员活动公开，便含有不相信的意思，有监察的意思，也不是总理的本意。（主席宣告现已时届，应延会至这个问题解决才散会，众赞成）至于第三点，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这也很正当的。但大家要知道世界政党的历史，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共产党员也有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同志没有觉得不高兴的。至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百分之三，也是很少很少的。我们现在只问他是革命不革命，不要问他共产不共产。除是共

产党员脱党以后，走入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就自然反对他。如果好的共产党，变了好的国民党，同样是好的革命党，和我们在革命战线上合作，那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并不反对他的。在政党原则上应该如此。但同时有人在共产党又在国民党，我们更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记得前几年曾和贺惠寒同志谈话，他说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定也是好的国民革命者。好的国民革命者，也一定不反对农工的利益。这句话确实很对。今天袁同志提出这个意见，本席也觉得高兴，故此也提出这种至诚的讨论。

毛泽东同志：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 (以下略)

第十三日第二十五号

日期：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时间：上午十时三十分至下午一时十分

出席代表：一百八十八人

主席：谭平山

秘书长：吴玉章

纪录：速记科

..... (中略)

一、汪主席精卫报告主席团提出闭会后本党对于北方目下时局之宣传大纲

..... (中略)

二、财政决议案

..... (中略)

三、纪律提案

路友于同志报告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另附）

三十二号于树德同志：本席对于此案，大体上很赞成，但文字上或许要注意，因为恐怕有的已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而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报纸很多，我虽不能拿出反证来，但不能不考虑到。

五十九号高语罕同志：本席以为凡是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的，一方面登报声明，一方面还须向中央党部报告。

二〇一号詹大悲同志：本席认此案应着力于党的观念上，不要于政治立点上看，才可得正确的解。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亦很赞成此案不牵涉到西山会议的问题，而只于西山会议以后的党务范围内的问题上取。

二十一号董用威同志：本席以为对于像居正一般人的处分，大家试设想各地党务之前途，有否困难，即可得相当的意见，所以本席主张居正石青阳应永远开除党籍，至于戴季陶则仍不必再加处分。

主席：现在可以改定讨论方式，将本问题分为几次讨论，先将

居正案解决。

二一五号朱剑凡同志：本席以为无讨论之必要，可直付表决，因在座中决无赞成这种勾结军阀破坏党务之反动分子也。

主席：赞成居正永远开除党籍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主席：关于第二项，石青阳陷害同志虽经四川代表吴玉章申明尚无事实，而勾结军阀，则有许多同志作证，应否开除请大众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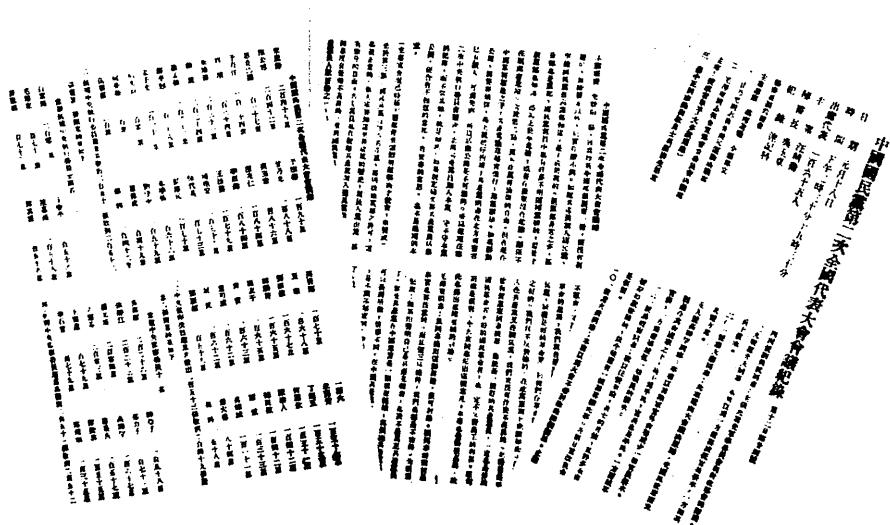
二一五号朱剑凡同志请以原案付表决可矣。

主席：赞成石青阳开除党籍者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席：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一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即除名。大家以为如何？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附议者十人以上）

（以下略）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了宣传报告，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图为会议记录记载毛泽东发言的部分和大会的选举结果。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6年1月19日)

一、中国现在尚未脱农业经济农民生产，农民既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为要实行总理之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农民。吾国人口既然农民实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审是则吾国四万万之人口，农民实占三万万有奇，所以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基于以上之论点，则中国国民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农民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而为吾党三民主义实现之根据。

二、吾党在广东自有农民运动以来，为期不过七月，已有农民协会者三十有七县，会员增至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吾党前次讨伐杨刘，此次统一广东，农民皆有实力之参加，此皆可证明吾党对于农民之进步，农民为谋本身解放之急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之努力，现在广东以外，在珠江流域虽有广西，在长江流域虽有湖南、湖北、安徽，在黄河流域虽有山东、河南、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均有农民运动之兴起。惟组织尚少，效力不著，吾党为使全国农民参加于政治争斗，以后非极力注重于中国中北两部，断不能于最短期间，促成全国农民之组织，以

致力于国民革命，所以吾党尤须确定对于全国农民运动之统一计划，并确定经费，使此种计划得以完成。

基于上述之理由，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三种决议：

(一) 政治的：

1. 指导农民使为有组织之民众以参加国民革命。
2. 排除妨碍农民利益之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等。
3. 解散压迫农民之武装团体。
4. 明定农民自筹自卫之原则。
5. 无论何时本党政府应站于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
6. 制定农民保护法。
7. 实行公用度量衡。

(二) 经济的：

1. 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
2. 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
3. 减少雇农做工时间，增加雇农工资。
4. 取消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制止预征钱粮及取消无地钱粮。
5. 禁止包农制。
6. 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
7. 速行耕地整理并整顿水利改良农业。
8. 调查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
9. 取缔奸商垄断物价。
10. 改良青年雇农及女雇农待遇。

(三) 教育的：

1. 厉行农村之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

2. 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补习学校。

3. 尽力宣传使农民自动地筹办各种学校。

本党为求解决农民痛苦，而使其变为有组织之民众，以促革命之成功，故对于内部之组织，尤须有严紧慎密之筹划，大会对于年来农民运动之经过，认为有相当之进步，此后更当继续努力，并为内部工作之筹划，兹特规定如下：

(一) 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之关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

(二) 于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在本国中北两部，选择相当地点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扩大中国之农民运动。

(三) 确定并扩大农民运动经费。

(四) 各省区市党部宣传部与各该省市之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尤须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使此种运动，成为本党之整个的统一的运动。

宣传报告决议案^{*}

(1926年1月)

(一) 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之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之观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本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之利益而奋斗。因此，民众一变从前怀疑本党之态度而为拥护本党之态度。在党内将全党党员范围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统一其趋向而整齐其工作。其怀挟个人之目标及方法者，以与此共同之目标及方法不相容之故，乃逐渐归于淘汰，具有一种极大的教育作用。惟在宣传方面，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在教育方面，更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体党员革命化，是其缺点。大会以为今后本党的宣传工作，亟应改正此缺点。

(二) 两年以来在全国各种重大事变中，本党之宣传，确能采取一种攻势，将各种事变的意义，解释给一般民众。如收回粤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总理追悼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廖案、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及最近之反奉战争，均能不失机会，发起广大的宣传，暴露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之罪恶，而指示民众以出路。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教育，及战时军民联合之宣

传，尤有重大之成绩。大会以为本党在今后继续发生的全国各种事变之中，应尽量利用时机，一面揭破一切反动势力之阴谋及罪恶，一面揭示本党之主义及政策，使全国被压迫民众日趋于革命化。盖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至于军队中之政治宣传，极为紧要，以后更应尽量扩大。

(三) 两年来由帝国主义发出“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之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各种无聊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努力作其破坏诬蔑之宣传。其目的为欲拆散本党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藉此等反革命的宣传，向民众揭破其诬蔑及错误，同时指示民众，使知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

(四) 至于宣传工作指挥系统之缺乏，党报之不健全，检察之旷废，宣传品分配之偏枯，农村宣传之不力，党内教育之无计划，均为两年来之缺失，以后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改正之。

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致中央秘书处电^[1]

(1926年2月14日)

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2]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毛泽东
二月十四号

[1] 这封信的信封上署有“中央秘书处林伯渠先生报告中央”字样。毛泽东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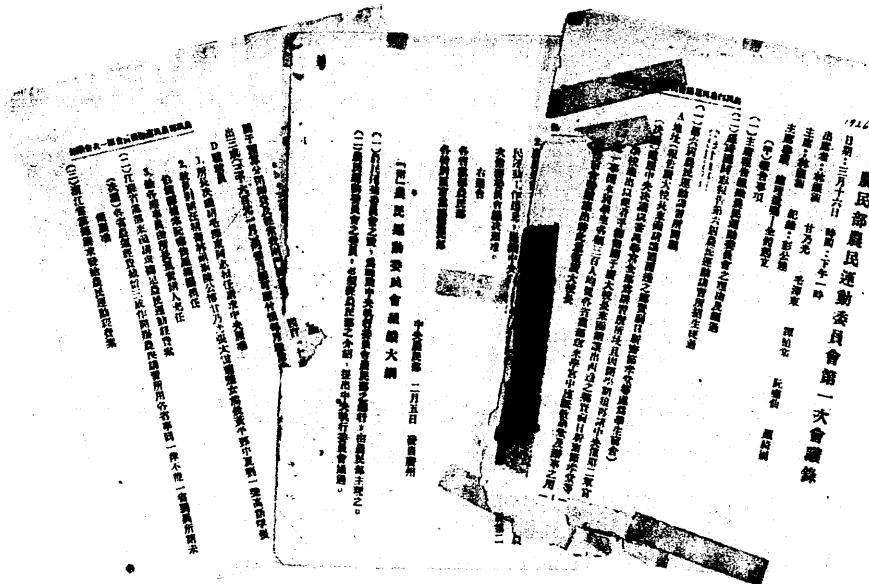
[2] 沈雁冰，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当时请假是为了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 开学典礼上的演说^[1]

(1926年2月28日)

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做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

[1]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为培训政治工作人员而举办的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演说的主要内容。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为谭延闿（主席）、程潜、林伯渠、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担任本班教授的有汪精卫、萧楚女、沈雁冰、朱剑凡、邓中夏、陈公博、高语罕、熊君锐、毛泽东。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



1926年3月，毛泽东受聘担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中国革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图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讨论续办第六届农讲所，并请毛泽东任所长的会议记录。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

(1926年3月18日)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2]一书内，也有简单的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2] 《新社会观》，郭范仑科著，王伊维译，瞿秋白校，平民书社1925年6月出版。

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

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1]国民政府打倒杨、刘^[2]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

[1] 指民国14年，即公元1925年。

[2]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国民运动丛书》书目

(1926年5月19日)

第一辑

- (1) 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 汪精卫著 (已有)
- (2) 中国近百年史略 (待编) 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
- (3) 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 (待编)
- (4) 产业革命 (待编)
- (5) 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
此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一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
- (6) 妇女解放运动小史 (待编)
以德国 Bebel (培培尔) 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为蓝本
- (7)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待编)
- (8) 革命 (待编) 此为美国文学家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 所著之短篇小说极为有名
- (9) 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 (待编)
- (10) 德国大革命之意义 (待编)

(11) 世界之农民运动（一）（待译） 此种总名一个其中实为国别

(12) 二七运动始末记（待编）

第二辑

(1) 中国国民党之使命（待编）

(2) 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待编）

(3) 社会主义与宗教及艺术（译）

(4) 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待编）

(5) 从中古自由市民至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待编）

(6) 土耳其国民革命（待编）

(7) 苏维埃制度（译）

(8) 苏俄之外交（译） 俄外交总长契杰林原著

(9) 世界之农民运动（二）（待编）

(10) 鲁示尔占领与道威斯计划（待编）

(11) 黑种人之革命运动（待编）

(12) 五卅惨案之前后（待编）

第三辑

(1) 孙文主义

(2)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

(3) 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

(4) 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待编）

- (5) 革命的文学 (待编)
- (6) 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 (待编)
- (7) 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之消灭 (译)
- (8) 世界之农民运动 (三)
- (9) 苏俄的教育 (待编)
- (10) 红军 (待编)
- (11) 犹太民族解放运动 (待编)
- (12) 摩洛哥战争 (待编)

第四辑

- (1)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待编)
- (2) 洛迦诺会议 (待编)
- (3) 巴黎公社 (待编)
- (4) 五一劳动节 (待编)
- (5) 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 (译) 比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
- (6) 苏俄的艺术 (待编)
- (7) 世界农民运动 (四) (待编)
- (8) 埃及民族解放运动 (待编)
- (9) 叙利亚战争 (待编)
- (10) 将来之国际大战 (待编)

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伏尤芝之论文

- (11) 一九一七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 (待编)
- (12) 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待编)

第五辑

- (1) 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待编)
- (2) 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 (待编)
- (3) 三八国际妇女日 (待编)
- (4) 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 (待编)
- (5) 法西斯蒂 (待编)
- (6) 墨西哥革命 (待编)
- (7) 波斯问题 (待编)
- (8) 莫索尔油矿 (待编)
- (9) 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 (待编)
- (10) 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 (待编)
- (11) 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 (待编)
- (12) 裁减军备会议 (待编)

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辭^[1]

(1926年8月14日)

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不要忘记八十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者很多，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的梗阻——其实还是受先忘了自己没有去领导农民的梗阻——到今仍没有多好效果！

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问题得有完满的解决！

[1] 这是毛泽东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的身份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辭。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1926年8月)

依五个月以来之经验，发现本省各地农民运动，多不免左稚之病。其所提口号，如打倒地主，以及关于干涉政治等，在目前都失之过高。本省农民运动，除尽力组织穷苦农民群众，并拥护其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之改善外，还应引导中小地主，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大地主，除开最小部分之难同情革命者外，也要设法使之在革命运动中能守中立。我们正在开始这种工作的时期，如果我们的口号过高，行动太左，将使农村中一切地主、绅士、团防，都与我们的运动发生冲突。结果不仅阻碍工作的发展，亦且影响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

我们同志应引出许多事实向农村中宣传下述的意义，中国各阶级的人民，无不饱受了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祸害，尤其是乡村的民众受害最烈且最普遍（都市的买办阶级与官僚，是与帝国主义暨军阀勾结分肥的）。虽然在表面上，乡村人民的经济地位贫富不等，然因洋货侵略的结果，农村经济完全破坏，失业者日渐增多，更遭军阀之蹂躏，贫者固已逃生无路，死不得所，即富有者亦何尝不受物价高涨之影响，经济地位日渐动摇。且战祸延绵，政治黑暗，使人救死不赡；故大富者日即衰落，中产更难维系，其仅小有者，固早陷于冻馁矣。故挽此共同之危局，惟有合力消灭此互结为

恶之两重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

本党之从事农民运动，乃深知帝国主义与军阀危害中国的根基完全建筑在剥削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利益上面，若此根基不予以铲除，国民革命久不能实现，故欲唤醒农村各阶级的人民，认识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罪恶，一致团结，努力国民革命，以求解除自身的痛苦。

若非甘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爪牙，如贪官污吏及恃富为恶的土豪，应该皆可接受本党的宣传。本党在农民运动中，对于各阶级的政策，应当以雇农佃农自耕农为主体，而与中小地主及士绅商人等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贪官污吏（军阀的爪牙）及土豪劣绅（土豪的爪牙）。我们固不可认贼作子，尤不可误反为敌，坐使敌人的联合战线扩大，而自己却退在孤立的地位，这是要深切注意的。

兹根据本省数月来工作之经验，规定对乡村各方面之态度与政策，各同志，尤其是专力于农运之同志，务须遵照各项之规定，从事宣传与组织，以期于最短期间扩大本省农民运动，成立县乡各地农民协会，建立坚固不拔的革命基础。切不可有渝斯旨，错误宣传，致发生破坏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联合战线的危险。

对各方面的策略

一、对湖南现政府所取的态度

只要现政府能确定与国民政府合作，及反对吴佩孚的政策，并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以及工农团体的发展，我们当竭诚与之合作。我们的活动须尽量纳入合法的形式，如农民协会，统向官厅立案，及有事依合法手续，向官厅起

诉，请求豫决等。总之，遇事要避免暴动和不必要的冲突。

二、对农村中各方面所取的态度

从前我们对于本问题所定的策略，因为没有实际的经验，有一些不能适用。而同志们在执行的时候，又超过原定策略的限度，发现许多左稚的地方。结果是我们还不曾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而一些可以与我们合作的（如开明的地主及正绅等），已因误会不予以我们同情了，甚至他们也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现在规定我们的态度如下：

- (一) 团结雇农、佃农、自耕农；
- (二) 与中小地主取联合战线（收租谷百石至五百石者为小地主，收租谷五百石至一千石者为中地主，千石以上者为大地主）；
- (三) 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
- (四) 联络正绅，反对劣绅；
- (五) 我们要打倒贪官污吏；
- (六) 我们要打倒土豪（土豪地主阶级中积极作恶，甚至利用团防局残杀平民的分子）。

三、民食问题

湖南近年连遭水旱及军阀之刮削，谷价高涨，荒民遍于各县；此问题，在此时的我们，实无单独负责解决之可能。从前之办人民救灾会，实为借此以揭破赵恒惕以赈灾名义，刮款捐款借款之黑幕，此时局势已与此前不同，故我们的策略亦当稍有变动。现在重新规定关于民食问题的策略如下：

- (一) 对救灾会采放弃消极态度；
- (二) 鼓动正绅从事赈灾发种，及向政府请求赈济等事项，我们努力参加赞助；

(三) 关于查仓、阻禁、平价、派余……事项，我们须与正绅合作办理；我们即有所主张，亦应以适当形式出之，不应离开正绅单独地行动（如强定谷价买卖等）。

四、农民运动与地方自治

农民对于地方自治，从前十分不负责任，实为错误。以后我们应指导农民合法地参与选举地方公职人员，或被选为地方公职人员等事，农民协会对于地方公益等事（如修路、筑堤、水利、森林、合作社等），应注意参加，但对于地方行政（如债权债务之争执、缉盗清匪等），不应积极地干与。

五、农民协会与旧农会

在现在的政治之下，旧农会还是所谓合法的团体，农民协会，还是新奇的组织。在这个过渡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农民运动中，在农民协会与旧农会的关系上，应依照下列的规定去工作：

(一) 以在本省县乡一律公开地组织农民协会为原则，但遇特殊情形不能公开时，仍应保存其秘密组织；

(二) 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的机关压迫农民；

(三) 在农民中宣传旧农会的组织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

(四) 在旧农会内对贫苦农民暗示，使之同时加入农民协会；

(五) 农民协会会员在旧农会内一切言动，均须站在农民协会的政策上；

(六) 平静时，农民协会与旧农会取合作态度，地主与贫民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六、农民运动与农村小学校小学教师及塾师

小学教师、塾师及农民三者之经济地位，大概相同，塾师与小

学教师比较，仅只是思想上落伍。农村小学教师实际是天然地站在输送新思想于农村的地位，现在有许多小学教师，已经尽了这种职务，许多小学校也已经变成了各地方农民运动的机关。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小学校小学教师、塾师，应照下列的规定，去进行我们的工作：

- (一) 对小学教师输送革命思想，并努力吸收小学教师加入本党；
- (二) 设法督促每个小学教师，均在省城农村补习教育社统一指导下，办理成人补习教育；
- (三) 尽量利用小学校或其他学务机关，做农民运动的机关；
- (四) 农民协会努力援助小学教师，完成各种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如加薪等）；
- (五) 对私塾不加反对，并向塾师宣传，使同情于农民运动；
- (六) 对小学教师与塾师的冲突（如塾师及小学校学生、小学教师倡议取缔私塾等），不卷入旋涡，更不左右袒，于可能时为之疏解。

七、对团防局所取的态度

团防局固然是土豪用以压榨平民拥护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我们不是绝对不能使之为被压迫民众而尽力，因为团丁多半就是农民，其办事人乃至局长多是地方的正绅、小学教师，或其他明白事理之知识分子。

故我们目前对团防局之工作，应（一）从其上层以至下层，努力向之宣传，介绍团员入党；（二）扶助小地主、正绅、小学教师，及其他不压迫农民的分子，取得团防局之职务。使团防局从少数专横的土豪手里，移到他们的手里。

八、对慈善团体及慈善堂同善社等所取的态度

我们对慈善事业团体（如慈善堂积善小补堂等），应取相当的联络；我们对于专门宣传迷信的团体（如同善社等），暂不加反对。

九、对教会所取的态度

我们对于教会，在口头宣传上，应该极力说明教会为帝国主义的先锋。我们要说明他是一方面替帝国主义做侦探，侦察中国内地情形——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究竟是个怎么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反用着“和平”“博爱”等说着好听的名词，甚至用一些金钱出来收买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着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藉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如果遇着教会，他们明显地实际为恶（如霸占田庄、压买民房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

十、对土匪所取的态度

多数的土匪是由农民失业而产生的，换一句说话，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榨而后有土匪。他们用抢劫做方法，去反抗现社会，我们自然不赞同。但他们因生活困苦，要求生计问题的解决，我们当然是与之同情。所以我们现在不提出整个的打倒土匪的口号，而只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口号，这就是我们要除去所有土匪的原因。但是如果遇到有某一部分或某一个土匪，为压迫阶级所利用，来压迫农民，我们便须分别地反对。

十一、对于与军事政治有关系的农民运动

本省农民运动，应特别注意与军事政治有关系的地方，如湘南

注重湘粤、湘桂交通要道，湘东、湘西注重铁路贯通、水运便利、省会邻近以及全省汽车道路、产业机关，并须注意凡有工运的地方，农运须与之密切联络。

十二、工农联合

本省的产业工人（如水口山、锡矿山、第一纱厂安源、“此处运动由中央划为省部管”及株萍粤汉两铁路等处的），我们的农民运动，应与之密切地联络，结成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一切农民群众中，尤应宣传工农必能切实联合，革命的力量乃大。

十三、农民运动与本党组织之发展

本党为指导农民运动之中心，在农民运动中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发展本党的组织，其结果一方面因为缺乏本党多数同志的领导，必将使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强健，农民运动的发展不迅速，甚至将要招致一些可以避免或是不应有的压迫。一方面因为农民协会以外缺乏本党的党员做应援的工作，必将使农民协会于行动时陷于孤立。所以我们于农民运动中，应照下述的规定去工作：

（一）努力在农村中发展本党的组织，及党员之数量。我们要在每一个最低级的农民协会的所在地，至少成立一个区分部。

（二）我们对于雇农、佃农、自耕农、小学教师及其他比较明白的知识分子，如手工业者、商人、团防局职员、团丁、正派的团绅、同情于国民革命之地主，均应使之加入本党。

十四、假借农民协会名义破坏农运问题

我们已发现有人假借农民协会的名义，作欺骗农民、破坏农民协会的勾当。他们有的利用失业游民作恶，破坏农民协会的名誉，有的利用家族观念，集合其一姓子弟，假名农民协会，饵以一时小利，破坏整一的革命的农民运动。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照下列的

规定去工作：

(一) 切实宣传我们的农民运动的意义，使一般被压迫的乡村民众，都能了解革命的需要，不受他们的愚弄，只要宣传得好（农民利害应该一致，对乡村各阶级的口号莫失之过高），组织严密（我们的力量日日强大），反对的人必然有所顾忌（小资产阶级的人，安土重迁，身家性命，极其要紧），而不敢轻于反对我们；

(二) 随时防止破坏的行动；

(三) 使家族的首领分裂，而取得底下群众。

十五、整顿下层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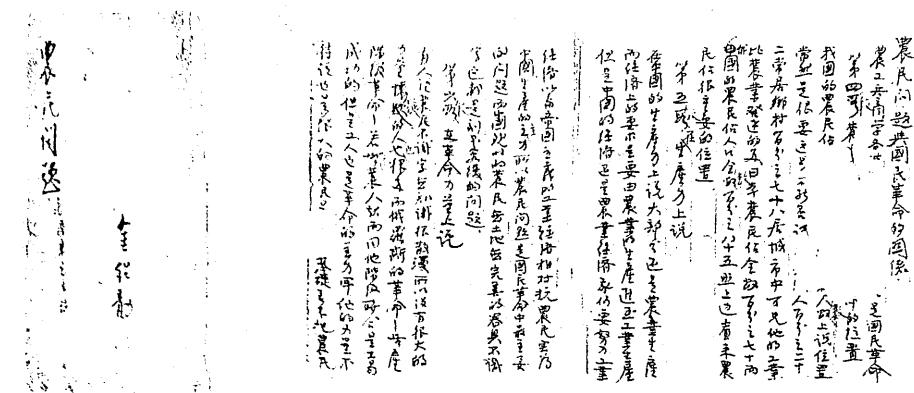
我们为应付环境起见，定了上述种种策略。但这些策略绝对不是右倾的，乃因时制宜之法。

我们相信经济地位低落的穷苦农民，其需要革命，较之乡村各阶级必能格外勇敢，格外忠实。我们应多吸这类觉悟的分子加入本党，加入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运动的核心，我们的农民运动才算有了基础。决不容稍事游移。疏懈下层组织，反而失去工作的重心。

上述种种策略，都是为欲巩固下层组织而定的，若工作失了中心的意义，即是丧失了这些策略的作用。



1926年5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毛泽东亲任所长。图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堂。



1926年，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图为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農村教育

農村教育是現社會很大的問題，所以作這種運動。但不幸的是，今迷於下：

(一)農村文化問題易迷：

古詩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兩言。高車皆下馬，惟有
讀書高。」這首詩影響很大，因為古人看待^{讀書人}那樣敬重，就是因為有了這位詩人點化了。劉夢云
「儒為國家寶，道為廟上珍。」這也是同上邊那首詩同的。
吾恩^{錢學森}：「上課的知識，要教給學生；工作的知
識，要教給學生；生活的知識，要教給學生；工作的方
式的農藝，終日沒有飯吃而沒有農業的機會，是不

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中國農民問題

第一編 中國農民問題与中国革命

第一章 無人注意農民問題

中國農民問題，目前是沒有人研究過，不過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又很重大的。農民問題就是革命問題。畢竟這個問題，中國共产党也很少做人注意。中國農民問題，還有多少不同之處，遠有不同。所以並非盡在之者皆可。不過，研究如何發展農業，使農村經濟得到改善，他具代表資產階級如何傳略。農村教育

是幫助「自食其力」農業者解決的一種教育問題。農業主觀之參事會主義，它智、富、勇、心，有社會和道德。至于耕作，那是代表農業的，對於農業的典誦甚篤。看見，那有都是不重要的。農業者本身是代表一切農業的，行有以耕。一百%那是代表農業的，是代表農業的。此多是不能成立的。中國的代表的一派，到初竟的說，有兩個，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基督教對農業問題，既無濟焉，而回教竟對此問題二年前才開始注意，至現在也還

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画）



《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油画）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版画)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1]序

(1926年9月1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

[1] 《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

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猖獗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

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第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

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毛澤東

動運民農

期八 第(2)

農民問題叢刊序
農民問題乃為農民本身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經營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迅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黨裏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自孫清落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於其他壓迫階級的對象主要是農民，所以實現其壓迫與掠取則全靠那封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摧殘，否則無法行其壓迫。所以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農村對封地主，及其國內統治階級即外帝國主義之惟一真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為為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中國的壓迫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地主，豈非不如輕重末末，明顯的偏袒在廣東：那一回土豪劣紳省得更比這次從遠的難得，必定是農民運動已經做起來有了大的農民羣衆加入了農民協會的縣份。換句話說即是那一回改換明勢力削減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一六七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一六八

縣份，必是農民起來的縣份。我們無庸諱言：一年以前是陳炯明有廣東，革命政府可以說並沒有廣東，一年以來到現在是革命政府與陳炯明平分廣東天下，雖然陳炯明自己不在廣東城內，在深得農民從廣東各縣逐漸的起來，才可以確實明陳炯明的勢力從廣東各縣逐漸的減削下去。陳炯明的故鄉歷來土豪劣紳官吏頭目的海豐縣，自從有了五萬斤二十五萬人之縣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還要清明——縣知事不敢為惡，征稅官吏不敢預外括錢，全縣沒有土匪，土豪劣紳爲內人民的事幾乎絕迹。因此，乃知中國革命的形勢只是這樣：不是帝國主義鞏固的基礎——土豪劣紳官吏統領着農民，便是革命動力的基礎——農民起來鎮壓住土豪劣紳官吏。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全國各地都必須做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勝利，不然任便怎麼樣都算不得。全中國各地必須都做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帝國主義鞏固的基礎確實起了動搖，不然，也算不得。因此，方免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因此，乃知凡屬不流離甚至厭惡農民運動之人，他實際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紳官吏者，實際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對帝國主義。

有人以為耕階級之退縮於都市，完全相合於地主階級之退縮於鄉村，二者應相提並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第八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

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

(1926年9月16日)

——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毛泽东

十六日

——

克文兄：

[1] 这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两封信。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当时的职务应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1927年7月，陈克文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1]。周颇好，陈亦比较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君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作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地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仄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生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2]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纂

[1] 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

[2] 甘先生，即甘乃光，当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参见《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52页。甘乃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
甘先生同此。

敬颂日安！

王君^[1]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

弟 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生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 又白

[1] 王君，指王懋庭。

附一：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1]

原名	符号
周霄	邹孝
陈能新	熊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端
李敬民	吕兴
罗彩	林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光

[1] 云南农运特派员八人中，周霄、邬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六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二人。但据这封信可以肯定，陈能新、朱毓光二人都是第六届毕业学员。

附二：

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简章

云南因省党部尚未正式成立，农民运动正在萌芽时期，中央农民部为发展云南农运起见，特派员前往组织。以后关于农民运动一切事项，完全受中央农民部之指挥，至省党部成立再行呈请中央农民部核办。其简章如下。

第一章 组 织

第一条 办事处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组织之。

第二条 办事处之名称及所在地：

一、名称——云南全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

二、所在地——暂设昆明，但可随工作需要移动。

第三条 全体会为办事处最高级机关，经干事会议决或全体三分之一以上特派员之请求，得随时召集，以审核干事会工作并解决一切重大事件。

第四条 办事处干事会由中央农民部指定书记一人、干事二人组织之。

第二章 职 权

第五条 办事处传达中央农民部命令于各特派员。

第六条 办事处转报所汇集之各特派员报告于中央农民部。

第七条 办事处秉承中央农民部之命令及全体会议决案，有指挥及监督各特派员之责。

第八条 办事处每月汇集各地工作活动经过详细情形，作有系统之报告，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九条 办事处如有特别事件发生，除一面切实调查设法应付外，并将应付方法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条 办事处组织各级农民协会须先经干事会议决并呈报中央农民部核准。

第十一条 办事处应将特派员工作区域及运动计划于一定期间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二条 办事处干事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

第十三条 办事处根据工作情形有请领及支配经费之责权。

第三章 纪 律

第十四条 特派员有怠工及违背决议时，由书记召集干事会或全体会议决处分，但处分后须呈报中央农民部，并在下次全体会议报告。

第十五条 干事会有旷职及违背决议时，经三分之一以上特派员之弹劾得召集全体会议决处，并呈请中央农民部改派。

第十六条 全体工作计划无论何人均须严守秘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办事处章程如有未尽妥善处，得在全体会议时修正之，但事后须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八条 本章程于办事处宣布成立之日发生效力。

附三：

云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开办费预算表

类 别	用 途	用 费	摘 要
住所	押佃金	二十五元	本省租屋须先交押金，即保证金之类
用器	桌二张	五元	
	椅八把	十五元	
	床板二付	五元	
文具	文房用具	五元	
	油印机	二十元	
杂费	一切零星	五元	
合计		八十元	
附记	一、以上各项费用均系从俭酌划，用于初成立时，至于办事期间一切开用，尚未列入预算。 二、以上预算数目均以小洋计算。 三、押佃金一项为租屋时必需之款，于退租时如租金不欠，则原数退还，仍可拨归他用。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1926年10月25日)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思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只算我们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料，然已足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崇明 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

成群地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佃业维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组织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江阴 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顾山镇。这顾山镇介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厉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锡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农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农民尚未完全联合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土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云片告到孙传芳，孙传芳哪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农户合作自救社解散，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成不好，农民又想起来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又江阴东乡有一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苛例为交上期租，江苏人所谓寅交卯种，是一件于农民经济上很痛苦的事。现在农民要求种田还租，正在那里奋斗。

丹阳 这里述丹阳县吕城镇的两件事（这吕城镇在丹阳县东

乡，靠近沪宁铁路）。一件是反抗当铺欺剥农民。事在今年夏间，吕城镇上有一家当铺，一天被马玉仁残部在县西茅山为匪者到境抢了一回，但所抢不多。当铺主人即鸣控报失，说典当的衣物都抢去了，同时密将衣物乘夜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户即近镇各村农民，闻讯，邀截于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藏之部未得。典物的农民乃起而组织“当户联合会”，向吕城镇当铺算账。结果，当铺赔偿损失一部，即每人赔偿等于当价之数目，共赔了九百块钱。此事证明农民有团结便可得到胜利，设这回没有团结，便让奸狡的当商欺剥了全部的当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绅富农强迫农民缴钱戽水。事在今年夏秋一直到现在尚未了结。江苏各县农村的河里，现在很普遍地采用一种机器戽水，叫做“戽水机器”，以代替旧法的手车脚车车水。吕城镇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感觉得要戽水改用机器。但这个地方的劣绅及富农便乘机图利，抢先先做，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公司”，集合资本一千四百元，买来一架机器，安置在河里，用公司名义出布告，要农民每年按亩出钱，若不出钱不准戽水。农民们一打算：所有这几村的田一年按亩缴纳的钱，即够买一架机器，集资自买一架，一次出钱，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机器，则年年要缴这样多钱，于是大多反对劣绅富农的公司。本地有几位小学教员颇帮农民的忙，帮他们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农民促进会”，在这个团体内，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合作社”，办法也是农民按亩出钱，自凑足一千四百元，买了一架戽水机器。于是河里有两个戽水机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公司的一架完全摆在那里没有人理会。劣绅气极了，用种种诬词告到孙传芳那里。结果派兵下乡，大索过激党，捕去四人，通缉三人，声言不用公司机器的人都要重办。当兵来时，村中壮年男女都躲在禾丛中，只留下老弱妇

女小孩见兵士的面。这些犯了重罪的农民，单是送兵太爷免捕礼就送了一千余元，其余被搜掠者不在内。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好在现在已是孙传芳不甚如意之时，吕城的劣绅们或者也稍稍感到难尽如意，亦未可知。

无锡 离无锡县城十五里之徐巷镇，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乱子。此地大商兼大地主的荣德生，他要在此地修一条马路经过农村，拆毁镇上房屋，廉价收买过路田亩，此事直接损害农民经济，故农民们组织农民俱乐部反抗荣德生。结果荣德生屈服，允许田二百元一亩，新植的桑苗一角钱一株，镇上房子不拆。

青浦 沪杭路侧之青浦县，上月内发生农民反对重价买荒之事。本县荒地，农民缴价买荒，历来定价每亩三元。此次劣绅串通县长林贞一，组织一公司，以每亩三元领得荒地，而以每亩十二元卖给农民。农民组织垦务联合会反抗，劣绅官厅则多方恐吓。现仍在争持中。

泰兴 东乡王家庄地方，今年因旱少收，农民要求减租，与地主起了激烈的斗争。地主不但不肯减租，反压迫农民，农民中之一人因恨极图杀一万恶之地主。地主报县，捕农民三十人入狱。

泰县 泰县森森庄地方之农民，今夏因旱请求减租，起了一个运动。地主压迫，捕去为首数人。

徐州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洼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

灾之处，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慈溪 慈溪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里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怨气。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

(1926年10月27日至28日)

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

二

昨据宋部长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关于“不得预征钱粮”，于1926年10月27日、28日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两次发言的一部分。本篇三是28日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的发言的一部分。

三

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1]今天丁同志^[2]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1] 谭延闿在开会词中说：因为北伐已得到相当的胜利，“我们应该有新的应付方法，所以由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讨论，以为应该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方针，但一时又不易召集，如果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人数又不很多，所以请各省派人加入，大家来开讨论一下”“这次开会凡到会的都有议决权”。

[2] 丁同志，即丁淮汾，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挽罗宗瀚^[1]烈士联^[2]

(1926年10月)

美哲嗣政教长才^[3]，竟成千古；
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1] 罗宗瀚（1896—1926），字耻迁，湖南安化县伏口镇（今属涟源市）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4年。1926年北伐军入湘，湖南省政府改组，他一度出任湖南省建设厅秘书。当时，他是国民党左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坚持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同年10月，因积劳成疾，入田秋明诊所治疗，被北洋军阀派人在药中暗下毒药，口鼻出血暴卒，年仅30岁。

[2] 这是毛泽东挽国民党左派、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和挚友罗宗瀚的对联。1926年10月，罗宗瀚被北洋军阀用毒药暗中毒死。同年冬，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大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800多人参加。各界人士赠送挽联500多副。毛泽东从广州将此联写给罗宗瀚之父。

[3] 哲，才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哲嗣，称别人之子的敬词，犹言令嗣。这里指罗宗瀚。长才，犹通才。《世说新语·赏誉》：“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谓刘舆、潘滔、裴邈三人。

目前农运计划^[1]

(1926年11月15日)

(一) 农运进行应以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

1. 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
2. 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
3. 沿铁路、沿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
4. 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

(二) 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三) 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

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

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

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

[1]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1925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七人合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川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拟出一目前农运计划。

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

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

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

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

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

浙江——注重宁波、绍兴二属。

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

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

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

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

(四) 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和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五) 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

(六) 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湖南的农民*

(1926年11月30日)

现时已有组织的农民

一、县农民协会的统计

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者：三十六县

已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者：一十八县

共计五十四县

二、人数的统计

(一) 自本月统计的，三十县，五十三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人

按上月统计算的，十一县，五万零五千人

无统计估算的，十三县，三万人

共计五十四县，计一百零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人

(二) 有十万人以上的——四县

有五万人以上的——六县

有一万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五千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一千人以上的——十八县

不满一千人的——二县

(三) 人数最多的县份有十四万人

人数最少的县份有二百七十四人

(四) 各县人数统计表

说明：A. 为本月有详细报告的；B. 按上月报告推算的；C. 无统计估算的；D. 县协筹备处。

南县	A	七千	茶陵	A	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六
衡阳	A	八万八千二百二十三	道县	A	一千四百三十五
资兴	A	五千	泸溪	C	五千
绥宁	A	一千一百	湘沣	B	十万
耒阳	A	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五	祁阳	B	五千
彬县	A	一万	湘乡	B	六万
浏阳	A	十三万九千一百九十	？	BC	一千
攸县	A	一万	长沙	A	七万一千四百五十
醴陵	A	五万	宝庆	A	三百七十七
华容	A	一万	临湘	OC	五千
汉寿	A	七千二百二十九	常宁	OC	五千
蓝山	A	三千五百五十	宁德	OC	一千
桂阳	A	六千二百四十三	安乡	OC	二千一百
新田	A	五千一百五十	新宁	C	一千
酃县	A	五千四百六十八	溆浦	C	一千

宜章	A	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三	宁乡	B	五万
湘阴	A	一万七千六百	新化	OA	六千三百七十七
益阳	A	一万五千六百八十	临沣	OA	一千一百六十六
安化	A	六万二千三百	永明	OA	二千一百八十一
陵零	A	七百	汝城	OA	八千八百六十五
岳阳	OA	二千零七十	常德	OA	九千五百四十五
武冈	OC	五千	芷江	OA	二百七十四
沅江	OC	一千	城步	OA	八百八十九
?	OC	一千	嘉禾	OC	一千
江平	B	十万	桃源	OC	一千
来阳	B	十万	?	OC	一千
永兴	B	一万	沣县	OD	二千五百四十九

北伐中之农民参战

一、供给：北伐军所经地方，农民即均能供给饮料，或少数之食粮，代为煮饭等事。

二、向导、侦探：此种工作，沿株萍路、浏阳、平江、长沙湘潭、宁乡、衡山、南县、华容等处均有。

三、运输：农民自动受军队雇请运输者之外，有组织地替军队运输之事亦有。

四、扰乱敌军后方：湘潭、平江、南县、浏阳、沿株萍一带等处皆有。

五、参加战斗：死伤人数及夺得枪支尚无精确统计，大略如下：

1. 株洲：唐军二次攻入长沙时，农民与叶门，缴枪百余，及机关枪大炮等。

2. 醴陵：北伐军入长沙时，农民夺枪二百余及机关大炮等，十一月赣方败兵入醴时，农民缴枪甚多。

3. 平江：七月北伐军入平，农民参战死二十五人，夺枪数百支及机关枪等。十一月二师兵变，农民围缴变兵枪二百五十支，现政府要收此枪，农民反对，正在相持中。

4. 浏阳：农民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击退敌溃兵，有死伤，并夺得枪支。

5. 华容：一次蔡鉴军入华容，农民与驻军共同击退，二次蔡鉴入华容，农民三千余人单独击退蔡军。

6. 沔江：华容第一次击蔡军时，沅江农民参加。

7. 湘潭：农民设疑兵，助北伐军过河，攻击溃兵等。

8. 宁乡：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攻击溃兵，夺得枪支。

9. 株萍沿路：与敌军冲突毁铁道。

10. 长沙：围攻溃退军官，助政府围缴溃兵变兵。

六、农民参战之原因：

1. 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

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

2. 对北兵叶军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
3. 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
4. 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支，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

七、农民参战之影响：

1. 农民政治观念之进步。
2. 农民自信力进步。
3. 使政府认识农民力量，影响政府左倾。

现在农民的倾向

一、农民已觉得他们参战有功，需要报酬了，就是没有参战的各县，也觉得党人的宣传应该兑现了。

二、经济的要求：这种要求已普遍有了农运的各县，下面的要求是最普遍：

- (一) 减租——还没有（耕地农有）不纳租的要求。
- (二) 减息——从八九分息减到四五分也就满足了。
- (三) 解决荒月食粮问题——形成了普遍的平粜阻禁运动。
- (四) 减捐税——少数地方有不纳捐税的要求。
- (五) 减押金，及不得无故退佃等——尚无明确的观念。

这些要求可说是很低，都是他们直接的，有些地方是各种要求都已起来，少数地方还只觉得一二种。在湖南近广东广西一带农民的要求，比湘中一带较高。

三、政治的要求：

- (一) 改造团防——他们对团防局人还非常注意。
- (二) 反抗都团——许多地方都团已经失了作用，毁打都团总的事甚多。
- (三) 希望一个好的政府。

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可说都还是非常幼稚。县长民选等口号农民固然没有感到，就是乡村的政治要求，也还只有消极的；至于反动派所造的“没收土地”“组织工农政府”这类谣言，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四、武装要求：农民武装要求，现在日见急迫了。他们都愿从溃兵变兵手中夺得枪支，如此次平江农民的留枪运动（见前参战情形）非常激烈。

农民已起来的斗争

一、减租运动：

(一) 衡阳的减租运动：衡阳的租额，表面是说东佃各半，实际上佃户得不到半数。自从民国五年因大水和增加教育经费的关系，全县渐次普遍增加了租，增加的数目虽然不是一律，却是没有不加的。这样一来，佃户所得，比从前原来不及五成的数目更少了。自唐离湖南以后，衡阳加入了农协的农民就有很迫切的减租要求。于是提出全县复租的口号，就是要恢复五年以前（民国五年以前）的租额。结果，全县都得恢复了民国五年以前的租额。农民在此运动中加入农协者，约七万人。同时反动分子也就在这次运动中团结起来了。这次运动可说是全县农民加入协会的和未加入协会的都参加了。

(二) 各地的减租情形：除衡阳外，各地只有零碎的减租运动，某一个佃农对某个田主减租。因为各地每当更换佃户或田地易主之时增加租额，有时加得太多的，佃户即请求减少。这种事实经农协替农民解决的甚多。这虽不是一个斗争，然农民因此对农协增加信仰。

(三) 减租运动，本为各地农民急迫的要求，但收租期间已过，故未发生斗争。一般农民的观念，都以为明年减租的问题为有一番大斗争。

二、减息运动：

(一) 安化已全县普遍减息成功，未发生特别反动。约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农民亦认为满足。

(二) 岳阳一部分农民的减息运动，尚未结果，大约可胜利。

(三) 湘阴牛洲农民要求免欠息失败。

(四) 各县都有减息运动皆无大冲突。

三、减押运动：

(一) 浏阳全县减押金为每租谷一石，押金二元，已成功。但此后是否将有冲突，尚难断定。

(二) 岳阳一部分湖田，地主拟租每石增加押金七元，农民已起而反抗，地主亦联络三县团对付，此事将有大冲突。

(三) 各县尚有小的减押运动。

四、减税运动：

(一) 敦县、醴陵、宜章，皆有减税运动。

(二) 安乡已将全县亩捐取消，但增加田赋附加。

(三) 岳阳一部分农运要求取消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果。

五、垦荒运动：

安化农民要求在冬月由农民自由种杂粮不纳租。一部分已成功，一部分尚在争持中。

六、平粜阻禁问题：

(一) 起因：连年湖南均有灾荒，每到荒月，乡村中均缺乏食粮或食粮暴涨，于是形成了一种农民平粜阻禁运动。

(二) 这个运动，可说是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有了，不过形式各有不同罢了。约有下列的各种形式：

1. 由农协或由乡民会议，议决谷价，不得高于此价卖谷。
2. 议定两种或三种谷价，并决定一种人吃某一种谷价。
3. 有限制地运谷米出境。
4. 谷米一概不准运出境。
5. 待荒月再议谷价，现时不议。
6. 只留租谷的几成。

(三) 这个斗争引起的冲突：

1. 闭粜：地主不粜谷，则强迫粜谷，甚至罚钱殴打。
2. 偷运：发觉偷运则将谷充公或罚钱。
3. 因议谷价而引起冲突。

(四) 影响：地主商人都产生了大的恶感，即大自耕农，佃农亦不愿此办法，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政府对此举亦甚不满意。

(五) 省农协的政策已决定只准留一部分租谷以备荒月之平粜，不准无限制地阻禁。但已成群众心理，一时甚难改变。

七、与团防的冲突：

(一) 宁乡团防局长（在乡分局）已皆由乡民会议选举，及有农协组织之处，农民均极注意人选。

(二) 岳阳

1. 团局禁止农民开会、冲突，农民请愿结果，团局解散。
2. 农民为抗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束。
3. 两团防冲突，击毙农民十余人。

(三) 嘉禾团防枪毙农民。

(四) 桂阳反动派勾结团防调兵入城解散农民协会。

(五) 资兴团防强迫改组农民协会。

(六) 湘潭农民反抗团防斗殴枪杀农民一人。

(七) 牛洲(岳阳)团防禁止农民组织协会。

(八) 各地均有农民与团防冲突之事，多为团防胜利。

八、与土豪劣绅的冲突：

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可以说是无时无地没有了。土豪劣绅对农民之进攻，也是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农民对他们殴打、控告、游乡、罚款、驱逐，无一不有。自然多数是由他们对农民进攻而引起民众的愤怒。

乡村政权情形

一、有些乡村已由农协取了政权。

二、乡民会议在许多县中都有了，可以为乡村最高立法组织。有少数县中的团防局长和乡董等，也可由乡民会议选举。

三、有少数地方有农协、教联、商协、工会等联合的组织取得了乡村政权。

四、有许多地方乡村政权已为国民党党部取得，同情或赞助农运。

五、多数地方仍由土豪劣绅把持以压迫农民。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则时时发生冲突。

农民自卫的组织

一、湘南各县因唐生智的提倡，都有挨户团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指挥机关虽然是在绅土地主们手中，却团员及下层指挥人都是农民。在有农民协会的地方，自然不费力地成了农民的组织。挨户团没有枪械，多有梭镖（一种尖刀接以长柄的武器）、鸟枪、马刀等。多数有定期的操演，且有操演费（每次每人约五百文）。湘中各县如平江、浏阳、长沙……一带也有此种组织，但不普遍，且无操演费。他们此次参战及防匪，都能愿出很大的作用，组织人数无统。

二、湖南的农民，除挨户团以外，没有别种自卫组织。虽然以前有农民自卫军、自卫团等名称，皆因经费无法解决而停止了。

三、平江、安化、醴陵、湘潭……等处，农民夺有少数枪支（平江有二百五十支，尚有问题未解决），这都可拿出来作农民自卫之用。

土豪劣绅之破坏农运

各地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渐渐团结起来了。他们对农民进攻约有下列各形式：

（一）秘密组织保富会、保产会、白化党三等，公开组织区董联合会、乡镇联合会。

（二）宣传农协是将要抽丁、抽人头税，吴佩孚来了是会杀头以

恐吓农民，使之不能加入农协。

- (三) 他们宣传农协共产，行什么三三三一制。
 - (四) 组织假农民协会，发表宣言主张什么三三三一制。
 - (五) 混入农协包办，包办不成则捣乱。
 - (六) 收买、煽动或提倡乡土观念、宗法思想、迷信，使农民起来反对农协。
 - (七) 混入国民党压迫农民，包办农协。
 - (八) 宣传北伐军失败。
 - (九) 与民右派、赵、孙勾结。
 - (十) 假装农民暴动捣乱毁税局，以便各方对农运失掉同情。
 - (十一) 利用团防等直接压迫农民，屠杀农民，解散农协。
- 他们这些破坏手段，各处都似有联络地进行。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1926年11月)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尾各省学生开始来粤，四月举行入学试验。确定所址于番禺学宫，依照预算从事开办。五月三日开学，收录学生三百余人，训练四个多月，业于九月十一日举行毕业试，截至十月五日止，除病生三人未出所外，所有学生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查本届农所，为国民党第一次大规模之农所，应全国农运之要求，集二十省区之学生于广州，而训练之，兹将经过情形分项述之于下：

一 学生人数及籍别

原定学生名额三百人，后以来学者多，加收十六人。六月间又增收加十一人，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七人。嗣以疾病或他故先后退学者九人。至毕业时共有学生三百一十八人，依省籍分别则如次：

直隶二十二人，山东二十三人，河南二十九人，热河四人，察哈尔五人，绥远八人，陕西十六人，四川二十五人，湖北二十七人，江西二十二人，湖南三十六人，安徽十五人，江苏十人，福建十六人，广东二人，广西四十人，云南十人，贵州一人，奉天二人。

二 授课情形

五月三日虽经开学，因课堂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用为会场，至五月十五日，才开始上课。中有两星期为赴海丰实习时间，理论之讲授，实际授课十三星期，共授二百五十二小时。计：三民主义，六小时；中国国民党史，六小时；中国农民问题，二十三小时；农村教育，九小时；帝国主义，十四小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五小时；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九小时；中国政治状况，十二小时；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四小时；经济学常识，十八小时；苏俄状况，十八小时；中国史概要，十六小时；地理，四小时；中国职工运动，十七小时；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十五小时；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六小时；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四小时；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六小时；法律常识，九小时；统计学，九小时；农业常识，十六小时；农村合作概论，十小时；各国革命史，九小时；革命画，十四小时；革命歌，四小时。

这些课程，于革命之理论及方法，尤以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大体已备。上列各课，多数均有讲义或参考材料发给学生。

三 军事训练

将学生分为二队，每队分为六区队，设总队长一人，区队长六人统率之。于五、六、七三个月内，实行正规之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俾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

四 实习

五十人赴韶州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五 授理论以外之理论研究

本届设专任教员一人，除讲堂授课外，指导学生为上堂以外之理论研究。专任教员为萧楚女，毛泽东亦参与之，发给下列各种书籍每学生一全份：

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帝国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社会进化简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国农民月刊，农民运动周刊，犁头周报，中国民族运动及其策略，孙文主义讨论集，孙中山先生对于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湖南农民运动目前之策略，农民合作概论，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步兵操典。

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緊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做答案，限期交

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

六 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

因学生来自各省，又即须回到各省从事工作，对于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亟须研究。乃组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研究由各该省学生组织之。推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开会每星期自一次至二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作出了下列各种全国的调查：

- (一) 租率
- (二) 主佃的关系
- (三) 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
- (四) 利率
- (五) 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
- (六) 田赋
- (七) 抗粮情形
- (八) 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
- (九)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
- (十) 地主的来源
- (十一) 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 (十二) 工价

- (十三) 失业情形
- (十四) 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
- (十五) 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
- (十六) 地方政治组织
- (十七) 地方政治情形
- (十八) 会党及土匪
- (十九) 团防情形
- (二十) 教育状况
- (二十一) 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
- (二十二) 兵祸及其影响
- (二十三) 天灾及其影响
- (二十四) 贪官污吏及其影响
- (二十五) 烟、赌、偷、抢各种情形
- (二十六) 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
- (二十七) 妇女的地位
- (二十八) 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 (二十九) 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
- (三十) 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 (三十一) 农村组织状况
- (三十二) 地质之肥饶
- (三十三) 宗教之信仰状况
- (三十四) 度量衡
- (三十五) 民歌
- (三十六) 成语

七 编印农民问题丛刊

为应全国农运同志研究上之要求起见，极力节省原预算内不必要之开支，省出一点钱来编印农民问题丛刊，计共五十二种，现在已出版者十七种：

- (一) 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
- (二) 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 (三)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 (四) 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 (五) 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 (六)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 (七) 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
- (八)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 (九) 农民合作概论
- (十) 列宁与农民
- (十一) 农民国际
- (十二) 俄国农民与革命
- (十三)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 (十四) 土地与农民
- (十五) 苏俄之农业政策
- (十六) 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 (十七) 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 以下尚在印刷或编辑中：
- (十八) 广东农民运动概述

- (十九)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 (二十) 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 (二十一)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 (二十二) 中国的重要农产物
- (二十三) 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
- (二十四) 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
- (二十五) 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
- (二十六) 中国农业生产问题
- (二十七) 全国农民运动概况
- (二十八) 中国地租问题
- (二十九) 各地主佃的关系
- (三十) 中国重利剥削问题
- (三十一) 中国田赋问题
- (三十二) 各省抗粮运动
- (三十三) 苛税问题
- (三十四) 各省农民之分析
- (三十五) 地主的来源
- (三十六) 祠堂
- (三十七) 地方公会
- (三十八) 各省地方政治组织
- (三十九) 中国地主阶级的武装问题
- (四十) 天灾问题
- (四十一) 兵祸问题
- (四十二) 贪官污吏问题
- (四十三) 土豪劣绅问题

- (四十四) 各地的工价
- (四十五) 各地的度量衡
- (四十六) 农村教育问题
- (四十七) 农村宗教问题
- (四十八) 中国农村中妇女的地位
- (四十九) 中国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 (五十) 农村文学
- (五十一) 农村成语
- (五十二) 中国农民问题概论

这部丛刊如能完全出版，在目前农民问题之迫切的研究、农民运动之急激的发展中，确实可尽相当的供给材料之责。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6年12月20日)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的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手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譬如一座三层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

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 第五期

會務消息

農民大會請毛澤東先生來湘電

湖南省農民協會轉，王潤之先生等：敝會已於東日開幕，現正討論各
案。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點一切，無什感觸！敬謹
啟！

湖南農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印江印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电邀毛泽东前往指导。
图为大会邀请毛泽东的电文。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1926年12月)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地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做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

用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像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来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

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地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洲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洲、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的勇敢肯牺牲呢！

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地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只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得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以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

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農工代表大會之歡迎會

前日（廿日）午後農工代表大會聯合在幻燈場開會歡迎毛澤芝先生及農民國際代表卜禮慈先生。到會者三百餘人，旁聽者尤多踴躍幻燈場上觀為之滿。一時許，鑼鈸開會，主席劉鑑發報告，謂今日下午數迎兩客人；第一個是毛潤芝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國革命上領袖，而對於農民運動尤為注意，此次係專為考察農運而回的。

我們在開幕的時候，即電請毛先生回湘，對於大會加以指導。現在毛先生已回，我們非常歡喜。第二位是農民國際的代表卜禮慈先生，卜禮慈先生是農民國際派來中國考察農運的代表。今天約定來此報告，其報告約分三段，第一段俄國農民的狀況；第二段蘇聯政府對於農民政策；第三段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的意見。現在毛先生已到，即請毛先生出席演講。（衆鼓掌）

毛先生演講甚是優美，茲撮其大要如下：

我去湘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會有這種大會的，在去年是軍閥迫害人民的政府，今年是較此更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農民運動僅具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三十萬有組織的農民了。這是各同志努力的結果。我今次的題目是工農商學聯合問題，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6年12月)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国民革命势力在湖南表面上虽已把军阀政治打倒了，然其社会基础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很多存在，不过因民众势力之兴起，这个基础业已开始动摇罢了。在此动摇期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要保持他们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更出死力互相勾结，用种种挑拨离间、倾陷压迫手段，甚至混入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图谋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军阀的统治，反动现象显而易见。故国民解放运动，与此种反动势力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必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根本铲除，然后国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算根本消灭。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凡属革命民众所应当深切注意的。

自农民运动发展，各县土豪劣绅即群起压迫破坏。最显著之事实：如赵恒惕、廖运元、李鸣九、赵桂生等之岳北屠杀，焚毁农屋二十余所，枪杀三人，拘囚数十，被逐被逼者不可计数。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蚀军饷、捐款以饱私囊。该县西二区团防局长成胥生，凭借赵逆势力，勾结驻防军

队，把持乡、村政权，残杀良民，破坏农协，诬陷协会会员，谋害农民领袖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更勾结西山会议派，谋反抗革命运动。该县株洲汪孝達、汪绳武等，利用团防，勾结叶逆军队，诬杀农民领袖汪先宗。宁乡陶滨川、廖季梅、刘佑卿等暗助叶逆军饷，蚕食公款、联合团防，响应赵、叶，破坏北伐；杨致泽、刘昭等利用团防，残杀良民至数百人，枪伤农民领袖梅治成。桂阳雷征、彭仁寿、李容巨、黎庚樑等统率团防，占据县城，解散党部，枪杀工人，图殴农民领袖何汉。耒阳伍易卿、李子如、刘友三、邓元勋等收买痞徒，假冒农协名义，焚烧政府机关，企图嫁祸；土豪邓演宾私印愿书，组织乡农民协会，以图破坏农运；北乡土豪李某，收买农贼，擅改乡农民协会为区农民协会，并擅刻钤记，更私发大批乡农民协会筹备员委任状。衡阳劣绅张杞生，勾结团防局长何镇楚，围捕农民及农民领袖；土豪杨竹轩，集合暴徒数百，捉去区执行委员，勾结驻防军捣毁各公法团；团防局长罗凤逸，恃强摧残农民，纠合打手，捆打农民领袖。华容傅道南、罗昌、张荫元、孙锐义、傅治煥等，勾通土匪，勒索人民，瓜分公款，八长联盟，把持县政，包揽词讼，诬害农民。湘阴之赵子成、赵荪堂、赵迪予、赵崇正等借赵逆势力把持团防，高租、高利，剥削农民，农民实已变为农奴；任炳奎，指使任觉桥，勾结痞徒，破坏农协，殴打特派员；劣绅酆孟秋，强迫解散农协，驱逐努力农运的人员。益阳黄剑农、龚海帆、龚金榜、刘中藩、陈毫卿，组织伪党部，指挥暗杀队，把持县政，破坏革命，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团防局长刘梦龙、曹应春，倚团防势力，擅杀乡民，操纵地方行政，盘踞旧农会房屋，捣毁农舍，压迫农民。郴县著名之土豪劣绅曹游龙等借党敛财，惨杀党员；李冰如捣乱农协，毁坏党部，买活反动，派杀区农协委员长

李固。湘乡程希洛、彭世箴、朱太初、贺石渠等，私通赵、叶，破坏革命，捣乱后方；组织三K党、保产党、城镇乡联合会、暗杀队；勾结团防局，捣毁永丰党部；焚烧农舍，破坏农民运动，谋害农民协会执委曾策；把持县政，侵吞公款，包揽词讼。下里团防局长萧介藩，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运，包庇土豪熊祥元，强运谷米，逮捕农协会员，私行拷打，滥用刑罚，残杀良民达百数十人；把持团防局，侵吞地方公款，操纵乡权，武断乡曲。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等，统率团兵，惨杀农民，包庇赌博。道县之杨锐等，扶植党羽，把持国民党县党部，暗杀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压迫农运。汉寿梅石、赵勋华等，欺压良懦。常宁土豪欧阳玉琪，高租、高利，大秤、小斗；劣绅李溪成、谭封桐，破坏农民协会组织。沅江袁熙甫、袁致祥等，宣传“三爱主义”，利用团防，贿买镖手，悬赏八百元，谋杀农运专员。平江县议员、长寿商会会长李灌畦，为长寿土豪劣绅领袖，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指挥流氓游街示威，高呼“打倒农、工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北伐军与敌军在平江开仗时，受敌方委任，组织递步哨队及保卫团，运动地方，希图破坏北伐，并组织暗杀党，图杀国民党员及农运领袖。该县汪信哉乃仙坛坛主，惯性压迫民众，把持具有财产及政治，并于去年正月，组织讨赤委员会，禁止加入国民党；沈寅卿、姚叙哉是真正地痞劣绅，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压迫民众，破坏农协。临武李镜先，利用团局，垄断乡政，毒殴杀农、工委委员宁教仁，迫散区党部，勾结募债专员刘艺侯，浮收舞弊，纵兵苛索。新宁陈升安，侵吞公款，摧残学务；雷腾蛟、华维翰，勾结县府，私用刑讯，指良为匪，勒罚巨款。安乡徐德保等勾结县长，倚仗团防势力，压迫农民，出团卖谷，每亩至四斗八升，敛谷八百余担，农民请求减轻，

不独不准，反惨杀农民许正卿等二十余人。浏阳邹逆尧仁之参谋长及筹饷委员王益生、鲁觉丞等盘踞县团防局，要挟官厅，把持县政，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团体，又为邹尧仁规划一切，提取军饷；劣绅黄昭著、黄达五，把持乡政，勾结地痞；刘任生，组织假农民协会，利用农民，破坏农协；刘生实，勾结谢文炳，敲诈商人，侵吞军饷捐款。辰西团防局长娄邵德，欺压民众，破坏农协，捕殴国民党员刘解人，当街痛笞三百，枪杀良民，拐逃团防枪支；土豪王远万，高利盘剥，压迫农民，逼死农妇。长沙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日专横乡曲，近因募集公债，从中舞弊，更侵吞水灾赈款，扣留地方学款，自命为土豪劣绅，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与彭逆祖植等串通一气，鱼肉贫民；郑澍人，勾结吴逆，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及黄克强先生；罗倚陶，侵占田地，骗取佃户批价，压迫佃农；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绰号丁四土匪，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敛款，迄今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捕良民，滥用刑法，诬农协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永明王鹏，现充团保，武断乡政，破坏农运，借团捐为名，任意苛索；王筠，现充团总，破坏农运，垄断一乡，包庇赌博，近更混入国民党，当选非法的县党部执行委员。衡山唐经畲，把持县政，垄断乡曲，侵蚀公款，鱼肉良民，反对民族革命运动，印刷书籍，谋破坏革命，现更勾结西山会议派，潜来省城图谋扰乱北伐后方；劣绅罗如琴，于北伐开始时蓄谋破坏，我军退守衡州之时，更诬告农民夏观桃、彭黄枚等，谓为匪徒，且谓农民协会为匪党。

以上所举各县土豪劣绅，特其尤者，至于细小，一概未录。必须全部铲除，方收肃清封建余孽之实。至于贪官污吏，调查未周，姓名从略。必须农民运动与市民运动联合，方能打倒贪官污吏，建

设廉洁政府。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一) 现在乡村自治区域，普通有三级。如长沙之都、团、牌甲；衡阳之都、区、甲；宝庆之区、保、庙；常德之镇、保、甲；慈利之都、团、甲；郴县之区、团、小团；湘潭之都、甲、团皆是。亦有分为二级或四级的，旧有各级自治机关之组织，原是一种封建性质的东西，近则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结托军阀、统治乡民之工具。现在省、县政治，虽有改变，而他们把持乡政，鱼肉乡民如故。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高级组织（即接近县之一级）为此辈把持垄断之中心，利用团防武装，拥护其压迫良懦、刑杀无辜、侵蚀公款、勒派税捐之种种特权。其下各级组织，亦多为若辈之爪牙，使境内乡民，尤其是农民，全部受其钳制。农民视此种机关，谓为“头张衙门”，或谓之为“铁门坎”，此种封建阶级之组织，实帝国主义、军阀之真实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必须将此种民主运动汇合起来，推翻城乡特殊阶级，然后中国之国民革命，才算有相当的成功。

(二) 现在乡村中农民的民主运动，已经普遍地起来，封建的特殊阶级基础，因此开始动摇；然这种特殊阶级，犹据其封建的阵线，作最后之挣扎。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争斗，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建设新的民主秩序之目的；同时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

(三) 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设民主的自治。此种民主自治，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许其参与，而实现此种民主自治的方式，首在举行乡民会议，建立完备的乡村自治机关。

(四) 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之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乡村经济。乡民会议之组织，在最低级自治区域，当为乡民全体大会，在高级自治区域，当由低级自治区域之乡民全体大会选举之代表组织之。

(五) 乡村自治机关，当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委员制。高级机关应举办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公断、调查等事业。以上各种事业，须按照地方情况，酌设专人主任。并在自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事业之委员会，以为讨论之机关。低级机关，则斟酌地方情形，制定其组织。

(六) 为实现新自治制，目前应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的民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

(七) 旧有之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在新自治制实行以前，应由乡民开会改选，不得仍由劣绅包办。

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

(一) 湖南各县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在事实上，多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武力。在军阀时代，则直接勾结军阀，妨碍革命进行；即在现时革命高潮中，仍敢多方抗拒革命势力，破坏农民运动。此种扰民耗财的反动武力，竟是一种乡村军阀，完全失去了卫乡防匪

的意义。假使不急行改造，则动摇革命基础，酿成农村纠纷，危险实大。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

(二) 乡挨户团受乡民自治委员会的指挥监督，执行保卫民主、地方秩序之职务。县城团防总局，改为挨户团总局，受县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 挨户团之团丁，每家或数家出一人，团丁总数视地方需要而定。

(四) 县挨户团总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乡挨户团，设主任一人，队长、班长若干人。县挨户团总局主任由县民会议推选，交县政府任命之，县民会议未召集以前，则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乡挨户团主任，由乡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队长、班长由主任提出，得乡民自治委员会同意委任之。

(五) 挨户团须定期操练，并施行政治训练。

(六) 挨户团依地方的需要得设常备团丁，但不得多设冗员、致靡费用。

(七) 挨户团的经费，如操练器械、常备办公等项，就原有团防经费撙节开支。如以前无团防局而现在必须设立挨户团的地方，其经费由乡民自治委员会得乡民会议的同意筹措之。

(八) 原有团防局或保卫团之枪支、服装及其他器物，应一律移交于挨户团。

(九) 在团防局或保卫团未改组为挨户团以前，应执行下列过渡办法：

1. 团防局长或保卫团长，由乡民会议改选；县团防局长或县保卫团长，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各种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由县长

加委。

2.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职员、团丁，均须施行政治训练。
3.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唯一职务，在于防御盗匪，除与盗匪临阵交战外，不得对任何人杀戮或拷打。
4. 团防局或保卫团不能受理民刑诉讼。
5.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经费，须有预算、决算并公开之。
6. 政府须解散并惩戒残农民的团防局或保卫团。

地租问题决议案

大会听到各地关于地租报告，列述于下：

长沙租额，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衡阳，每亩田可得谷三石五斗，纳租一石六斗至二石，每石租规银五元到七元。衡山，每亩可得谷一石五，纳租一石三斗零，每石租规银从三四元到八九元。岳阳，四六租，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每亩规银四元。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每亩押规银五两至八两。宁乡，每百担谷地位只能收干谷六十石至九十石，须纳租五十石至六十石，每百担谷地位至少要规银一百元至两百元。株萍路，每亩收谷三石多至四石，纳租一石八斗至二石二斗，现在每亩押规普通是五六元，一班田主见谷价日高，又变一办法，其佃规多少以每年该田所收谷价为准，如所收谷作抵一百元，则须佃规一百元。临湘，每石田分四亩，收得干谷十六七石，纳租十石至十一石（东六佃四），普通每石租押规五元至六元。邵阳，有一种铁租“请耕字”，里面载明“丰歉不得加减”（如“请耕字”载明是十石，秋收只有八石，佃户须赔租二石）。南县，每亩田押规少

则二三元，多则五六元，最多有达十元者。郴县，除缴押金外，还要批礼鸡、鸭肉，果饼等礼物。湘乡，荒年东七佃三，丰年东九佃一，每石租信银二元至三元、五元不等。此外还有如下规定：一、要和东主做义务工；二、每石租要送稻草一支；三、要送东主三节的礼物。对引进人也是一样，不然引进人就向田主声明不负责任，使之退佃。永明，每亩田收谷一石至二石不等，佃户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种豆的田，佃户所得更少；种姜的田，照十分之六缴租。溆浦，上、中两种田，均东六佃四，但遇天灾，田主占八九成，佃户只得一二成，所以有借谷还租的。宜章，未耕田以前，就要交钱或交银的。

从上面这些材料看来，农民一年到头的牛马生活所得，皆因重租、重押、陋规种种剥削，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必赖妻儿子女，不分晴雨昼夜，捡柴、拾粪，看牛、纺绩的辛苦，才能维持其受冻馁，仅免于死亡的艰难生活；因之农业生产不能进步，土地荒废一天天增多，农民一天天流于失业，他们的出路，只有当兵、当匪，因此更造成了军阀政治。同时因农村购买力之减少，又影响到国内工业难于发展。地主从剥削农民得来的大量地租，不用于农村生产事业，以致农村经济有逐渐衰落的趋势。

因上述情形，大会为救济农民的痛苦，增进农业的生产，增高农民的购买力，特拥护中国国民党减轻佃农地租的决议，并规定改善地租及东佃关系的详细办法如下：

(一) 东、佃契约，本应由双方协定。乃因农民久在地主积威之下，不得不承认地主一方面的条约。农协是代表农民的机关，所以东、佃契约，应由各县农协斟酌当地情形拟定；经省协之批准，请政府备案。东、佃双方，均须遵守，如需另增附项，须得当地农协

的许可。

(二) 租额应该减轻。减租的标准，应该根据田亩的性质、大小、肥瘠，副业的多寡，押金的轻重和佃金利息的有无、多少等情形，减少租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

(三) 农民多为当地土著，并无缴纳押金的必要，如桂阳、零陵、邵阳、溆浦、麻阳等县，都没有押金办法。而采押金办法的地方，贫农每因无押金，佃田不到，成为农村中无法救济的失业问题。故各地如非十分必要情形，自得废除押金制度。即在押金制未能废除以前，亦应一律按照当地利率计息，不得有无息押金。押金最高限制，可由各县协斟酌当地情形规定，经省协批准，请政府备案。

(四) 农民除佃约上规定应纳的正额地租外，无论何种陋规，一律免除。

(五) 地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退佃，尤不得因农民团体的行动，而对个人提出退佃。农民设因退佃而受损失，所受的损失应由地主赔偿。

取缔高利贷决议案

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借了人家的钱、米，当然应付一种利息；可是乡下的土豪劣绅、奸商、不法地主等惯于乘贫农需钱急迫的时候，实行高利盘剥。贫民因高利贷的逼迫，有至于卖妻鬻子，或自杀的；即幸而能够还债，不久的工夫，就要弄到赤贫的地位。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在革命政府之下，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

据各地代表报告：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七十五县普遍的现象，谓之“大加一”，又有借银九元，月息一元，名为“九去十归一”。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

明、城步等县，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耒阳有“九去十归外加三”之利息，即借本九元，一月后还十元三角。常德乡间通行的利息，为借洋七角，一月还洋一元。桃源有“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如借洋一元，过月还洋二元，过两月还四元，以此类推。慈利谷息，每串钱年息一斗。岳阳之“押干租”，借洋四元，年还息谷一石。益阳等县，有五月间借出谷一担，八月间收谷两担的。郴具有水谷，即每借洋一元，年还息谷三斗。新宁有借钱十千，年出息谷一石的。衡阳有标谷利，即于上年四五月间借出谷一石，以最高价算为现钱，下年七八月间，以最低价算谷收入，除谷价之两次剥削外，仍算月息百分之六七。此种利息，可说是在三个月之间，即可加三倍以上。临湘有每元每日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如此计算，借洋一元，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共八元。城步有“八斗九年三十石”的俗语，即借谷八斗，九年还谷三十石。

至于最低利息，在沅江、南县、常德、岳阳、芷江、慈利、安化等县，每月利息百分之五。华容、桃源等县，为月息百分之四。湘乡、道县、新宁、临湘等县为月息百分之三。这些都是借贷利息的起码数。在以上各县中，要借比此更低的利息是决借不到手的。

大会认此种高利盘剥，极为不当，各县协得依据各地情形，规定适当利率，经省协批准，政府备案，通令执行。最厉害的高利贷应请政府一律明令禁止，并于最短期间，实现国民党新政纲之规定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田赋问题决议案

(一) 田赋正供虽不很重，附加则重极了。据各地代表报告，茶

陵附加超过正供一倍以上。宁乡每两正供，附加学捐、团防、路股、农林保管共四元，又各都自治经费一元至二元不等。武冈附加超出正供二倍。湘阴每两正供仍一两连附加共完九元。新宁每两附加十二千余文。衡山附加虽由农协决议减轻，但每亩有二角八分七厘之多。长沙每两附加三元六角，常德每两附加四元八角。临湘每正额三元七角五分，附加团防、学捐、警捐等项共洋五元。零陵每粮一石，附加团防二元五角，永明每两附加六元余。新田每两附加八元。澧县每两附加六元至九元。衡阳每两附加十元内外。祁阳每两附加十八元。蓝山每两附加小洋二十六元。宁远每两附加一百余串。宜章每两附加：近城团十五六元，白沙团二十四元，黄沙团三十六元。

以上各县均属超过正供远甚，从超过正供一倍至每两三十六元，骇人听闻，至于此极。此外，新北每两附加团防费二元五角，桃源、永兴每两均附加二元四角。郴县每两附加二元。湘乡每两附加一元八角。郴县每两附加一元六角，犹为附加较轻的县份。补救之法，应由各县农民协会，邀同各县革命民众团体，清厘田赋附加数目及其用途，凡非地方公益正当开支，应一律免除，属于正当开支的也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至于以前附加甚轻，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必要时，必须经县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民众团体的认可始得增征。

（二）贫苦农民欠征田赋，各地都有，有倒在粮柜上的，有倒在地方团保手中的，有倒在家族族长手中的。此种粮柜、团保、族长等借欠完钱粮之名，以重利盘剥欠户，苛索不遂，往往继以差役威逼。欠户常因此受重大的损失与侮辱。本大会决定，在国民政府统治湖南前，贫民历年欠缴田赋，无论多少，应请政府一律豁免。

(三) 地亩经界不清，以致许多人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甚至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狡猾的得重利，驯良的被剥削。又有因田亩经界不确，于田地易主时，旧主随意将其田亩以少算多，无形中新主照亩计租，一转移间增加佃农几倍租额。亟应督促政府，清丈地亩，确定赋率，取消无地钱粮，禁止飞粮，为受害农民减轻痛苦。

(四) 关于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如钱水重利、抹尾数等，均属无理剥削，应该一律废止。

(五) 近年水旱天灾，极为重大，受灾区域，农民困苦非常，无力缴纳田赋。此等区域，应斟酌灾情轻重，免征或减征田赋。

(六) 用累进方法，征收田赋。

亩捐问题决议案

现在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之县政府、团防局或地方自治机关的抽收亩捐，都是一律按田亩计算。这种办法，使仅足自给的或尚不足自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极难担负，尤其是摊派到佃农身上，更属无理剥削。大会决定：

- (一) 非地方公益，经民众多数公认者，不得抽收亩捐。
- (二) 自耕农有田二十亩以上的，才纳亩捐；佃农不纳亩捐，但穷东富佃之重押轻租者，不在此限。
- (三) 亩捐征收，用累进税法。

厘金问题决议案

帝国主义强制中国成立关税协定，因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中国乃不能采取保护关税制，以图发展本国的产业。然有更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地位者，则为中国自创之厘金制度。洋货入口，值百抽五，并缴纳子口税百分之二，此外，不纳任何厘金，洋商贩运土货出口，亦适用此例；而中国自己所经营之货物，现技术上既远不如洋货；复受层层厘卡之剥削，乃只有缩减或停歇之一途。尤其是对于一般小商，为害更大。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太昂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综计厘金的影响，农民受害最大。因物价昂贵影响，购买力减低，商业因之衰弱。购买力低，商业衰弱，工业自无从发展。工业无发展之望，工人遂陷于困苦地位。而政府对农、工、商业之税收亦不得不因厘金这种恶税之征收而全般缩小，全国交困，便成了今日的现况。

目前湖南的军事时期已告结束，省政府虽一时不能毅然将此种等于对国家经济自杀的制度完全废除，亦应规定一种较轻的统一的厘金，代替多种繁重的厘金，使商民缴纳一次厘金之后，不再有第二次缴纳。肥料与荒月食粮，关系农业与民食至大，均应免厘。至于过去厘金的积弊，如扦子团之苛索及各项陋规之病民，其应彻底扫除更无疑义。

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决议案

牙商借缴牙帖费用，挟官厅威力，农民将其生产品如棉花、粮食、水果、桔饼、杂粮、猪只、牛皮、桐、茶油类，运往市场，不能向消费者直接发卖，必须交由牙商交易，牙商便居间操纵剥削，

实为自由贸易之障碍。政府应从速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克扣行用，废除农产品必须落行旧制，使农产品任农民在自由市场贩卖。

民食问题决议案

乡村中食粮的流通，及谷米的价格，向来是由地主、奸商、土豪劣绅所操纵。如囤谷居奇、故抑谷价，致使一般农民，在初收新谷时，不能不将收获廉价卖出；一至荒月，又不能不重价向那班囤谷居奇的人购买食谷。至于贫苦无收获，纯靠购买食谷的雇农、手工业者的生活，皆操之于地主、奸商、土豪劣绅之手。这样，农民除受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之外，更加上一层损失。尤其在最近，湖南连年荒歉，农民因这种操纵，所受痛苦更加厉害。以前政府与社会对此民食问题都不负责，故现在各地农民乃不得不以平价阻禁为消极的救济办法。这并不是农民的过错，完全是以前政府及社会不肯负责任酿成的结果。所以民食的调剂，成了目前重大问题。我们的决定是：

(一) 我们在一个范围内（如一个乡农民协会的范围，或一个区农民协会的范围），须先有一个大概的调查。当地欠食谷若干，即于当地各地主的租谷中分别存留多少，名曰存仓，以备平民购食之用，余谷一概任其流通，不限价格。

(二) 存留的谷，原为维持地方民食，须以平价给食谷欠缺的贫民，对于最贫苦的人民则更当减低价格。

(三) 严格限制奸商操纵。

(四) 煮酒熬糖，亦属社会需要，但是在非常时期及有特殊情形的可行禁止。

关于社仓积谷问题决议案

社仓积谷，为社会备荒的组织，这种组织历代相传，归地方公众管理，不受官厅干涉，因此受军阀政府的影响尚少；但在别一方面，则为土豪劣绅、地痞所把持，发生吞款肥私，对借贷之剥削敲诈，管理疏忽种种弊病，不仅平民得不到实惠，积谷数目也逐年减少。大之如省城的湘社、湘义、储备三仓，原有积谷三十余万石，近来因管理的不善，又被军阀提取，仅余四万余石，而省仓竟至颗粒不存。社会对于备荒既如此疏忽，自然一到青黄不接，发生饥荒的时候，无法救济。这事在现时经济制度之下，关系平民生死、社会安宁极为重大。大会因决定：

- (一) 农民协会应与地方民众团体及自治机关联合，清查原有的社仓积谷，若有经管人侵蚀，应勒令赔偿。
- (二) 农民协会应由新执行委员，约同各民众团体，并与政府协商议定，增加城、乡的社仓及仓谷。
- (三) 社仓谷息，不得超过借额十分之一，赤贫者应一律免息借给。
- (四) 此后，仓谷应由各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共同管理，每年于一定时期清算一次，数目公布。
- (五) 湘义、湘社、储备三仓，应设法灌足，省协会应邀同各民众团体切实清查，并组织委员会管理。
- (六) 各地社仓积谷，专为备荒而设，严禁提作别用。

金融问题决议案

中国币制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人民所受影响极为深广，本大会为救济这种不良现象起见，特决定如下：

- (一) 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
- (二) 中央银行、省银行及其他经政府准许的银行发行票币，都应该无限制地兑现。
- (三) 取消元丝银。
- (四) 铜元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得过多或过少。
- (五) 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
- (六) 钱水问题，解决办法分为三项：一、银两纹银以七钱二分算大洋一元，元丝银以一两算大洋一元三角；二、铜元制钱，按照当时市价计算大洋；三、票币按照政府颁布之钱水价格表计算大洋。

农民银行决议案

现在的农村经济枯竭到了极点，这个原因约有数项：

- (一) 因城市工、商业之发达，经营农业，不如经营工、商业之得利，不但城市资本不愿投入农村，即农村原有少数资本，也给城市吸收殆尽。
- (二) 农业品价格低廉，工业品价格高贵，二者交换，结果农村更大受城市的剥削。
- (三) 盗匪扰乱的结果，地主多由农村迁往城市，乡间金钱，随

着流入城市。

总上诸因，便造成农村金融枯竭的现象，在这种枯竭现象之下，高利借贷，便乘机榨取。在许多地方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缺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农民经济极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救济办法，只有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至于农民银行基金，则可依照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最近政纲中“以省公有之地，作为农民银行基金”的规定。查本省政府公地，如营产、官产、荒湖田等类，为数很多。除湖田中的一部分应用作疏河、浚湖费用外，其余部分都应该拨作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的款项。农民银行的管理及稽核，农民协会可以参加。

食盐问题决议案

准盐附加，每百斤征到五元七角，超过正税几及两倍。而垄断盐票的商票、租票、霸运的运商，以少数私人操纵全省民食，层层剥削，罪恶滔天。目前盐价每担涨到十三元以上，加害农民，最为普遍严重。亟应废止私人盐票，打破运商垄断，取消准盐引岸，使川、粤、芦、淮盐，自由流通。淮盐引岸既行取消，政府自可整顿盐税，应即减轻盐税附加，以免贫民长受淡食、贵食之害。又粤盐入口，应收统税，不应该设立分卡，为害农民、商人。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借贷的便利。为免除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卖出时受奸商压抑价格过低之弊起见，应组织“贩卖合作社”，使农产品能直接输往较远之市场，获得较好之价币。农民日常消耗品，如油、盐、布匹、杂货等类，历受商人居间剥削，常时出了高价买了劣货，急应组织“消费合作社”，公共集资从较大市场或物品产地运来廉价货品，供给农民需用。目前农民以抵制高利贷、免除农产品价格过低、免除日用货物价格过高，这三件事最为急务。因此上述三种合作社之组织，最为迫切。此三种合作社，在初经营时，亦可在一一个合作社中分为三部经营。此外，为谋农田水利之改进，农业生产力之增加，亦可组织“生产合作社”。为谋农具、种子、肥料之廉价并迅速购得，亦可组织“购买合作社”。为谋对农产品之加工（如将谷子加工做成米，将木头加工锯成木板），及其他使用之便利（如共同使用水车），亦可组织“利用合作社”。

各地农协，应注意宣传各种合作社之效用。各农协应注意合作社技术人才之养成，并编印关于如何经营合作社之小册子。在政府方面，应依据国民党新政纲“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之条文，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有力之援助，如补助信用合作社之资本，免除或减轻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运入日用品及农具、种子等税捐，以谋合作事业之发展。各地开办合作社时，

对于经济之管理，须取严密方法，防止流弊之发生，以免丧失信用，阻碍进行。

农业生产问题决议案

(一) 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经济，尚停止在封建宗法农业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阶级严重剥削的结果，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的境遇，农民痛苦达于极点；另一方面因科学还没有输入农村的缘故，农民所受自然的压迫，如水灾、旱灾、风灾、虫害、病害和生产工具的拙劣、农作的不进步等等，简直无法抵抗。

(二) 农民欲求种种压迫的解放，惟有用革命手段方能达到。就是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减轻特殊阶级重租、重利、重捐的剥削，以谋人为之压迫减轻；同时输入科学方法于农村之中，解决资本缺乏问题，以抵抗自然的压迫，而谋农业生产的进步。

(三) 目前天然灾害，最厉害的莫过于水、旱两灾。水、旱发生的原因，在于森林破坏，河道淤塞，堤垸不固，塘坝不修。因此农民应该努力去提高农业生产，以谋救济。但是大规模的建设，如疏河、浚湖、造广大的森林等，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堤垸、塘坝的修治，政府与地主应分别负责。

(四) 至于选择种子，制造肥料，改良农作方法以及修筑道路以利运输，防止病害，驱除虫害，都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及得到政府之政治的、经济的帮助，才能解决。因此政府应站在农民利益、国家经济方面，极力去提高农业生产。

农村雇工问题决议案

(一) 在现时的农村经济状况，虽不能规定雇农以一定的时间，但超过雇农能力的过分时间，因此害及雇农健康者，均须加以限制。

(二) 工资与工作及生活物价过于不相称的地方，须酌量情形，增加工资。

(三) 年终结账，改为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结账。

(四) 禁止强迫童工做超过其能力之工作。

司法问题决议案

现时法律偏于保护特权阶级。负债的乡村农民，尤其是佃农与贫农，因法律偏于保护债权及地权，所受痛苦最大，如“父债子还”“随意易佃”等类，农民在此种法律之下，简直没有话说。在习惯上农民简直不能与地主立于平等诉讼地位。即有诉讼，亦绝少胜诉之事。司法衙门黑暗已极，从来即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俗语。至于诉讼手续的繁杂、讼费的苛重、差役的勒索、讼棍的卡骗，使农民畏官过于虎狼，视地主讼棍如恶煞。宁肯受屈，不肯与讼。此种恶劣情形，急应改变，大会特决定关于司法问题之要项如下：

(一) 民、刑法律须全部改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

(二) 农民协会有代表会员诉讼之权利。

- (三) 严禁法官收受地主、债主的贿赂。
- (四) 严禁讼棍挑拨是非。
- (五) 禁止差役违法苛索。
- (六) 取消歇家，农民诉讼，由农民协会保证（以会员为限）。

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

中国农村妇女，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如不能参与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公共集会，即祠堂祭祀酒食，亦无资格参与享受。家政除少数特别外，亦多不能过问，但是她们的家庭劳动，是极繁重的：烧茶、煮饭、挑水、打柴、浆洗、补缀、扶养哺育，终日为了些繁琐家务，劳苦不息，都得不到一点代价。甚至她们必须的几个零用钱，都要从纺绩、打草鞋，或者喂鸡生蛋，才能取得。至于农村妇女的地位，真是恶劣到了万分，其他不自由、受压迫的地方，一时数说不尽。这些现象，都是旧式农业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农村妇女之完全解放，必在由旧式的农业经济，进到一个新式的农业经济以后。目前在可能范围之内，大会督促政府实行中央对于妇女的决议案外，宜用下列几种办法，以资救济：

- (一) 各级农民协会，设妇女部。
- (二) 反对恶姑残害媳妇，尤其是虐待童养媳，及严禁妇女包脚、穿耳。
- (三) 女工工作，与男工相等时，应得同样工资。
- (四) 须注意领导妇女，加入农民协会。
- (五) 须宣传妇女有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集会之必要，并注意领导她们参加。

(六)农协所办学校，须注意收纳女生。

(七)严禁虐待女孩及买卖婚姻。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农民是勇敢活泼而有进取心和反抗性的，他们除受到一般农民所受的痛苦以外，更因处于家长制度之下，由习俗之束制，感受待遇的不平等，且以农民受剥削过甚，青年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年来水、旱为灾，战祸频仍，其痛苦影响及于青年农民，至深且巨！因之其需要革命，最为迫切。广东各地的青年农民已表示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有很大的力量：如为农民本身利益的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等工作，他们无不很热烈地参加。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目前尚在萌芽，农民斗争亦在开始，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充分地表现出来，然而此次北伐，平江等地的农民参加战事而牺牲者，其中的青年农民不在少数。

青年农民包括青年雇农、牧童及农家子弟等，这些分子在农村中最多，而他们因为富于革命性，能促进整个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农民协会得他们的努力而日趋巩固。他们是农民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的先锋，这种革命的势力，应使其更加扩大而有力量，所以青年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青年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应如何地珍视，发展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湖南青年农民运动的工作，除领导并结合广大的青年农民群众参加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外，应特别注意文化的宣传，训练青年农民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虽与成年农民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然以提高青年农民之革命

意识计，须尽可能地予以改善。

因为青年农民的地位和生活与一般农民相异，所以他们除一般的要求外，有他们特殊的需要，在目前须达到下列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 应规定青年农民最低限度的工资，与成年农民做同样工作者，应得同等工资。

(二) 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其能力所能担负的，每月应有例假，在假期内（纪念节日停工在内）应照给工资。

(三) 青年农民不做危险及有害身体的工作，禁止雇主虐待打骂。

(四) 青年农民因工作伤亡者，东家应给予医药费或抚恤费。

(五) 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六) 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农村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七) 青年农民一致加入农民协会。

欲求实现此青年农民本身利益的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实负有领导的责任，青年农民工作是农民协会工作中之一部分，青年农民问题得着相当解决，即整个的农运获到助力不浅，所以农民协会应有办理青年农民工作的专人及组织。在省农民协会和各县农民协会须于执行委员之下设置青年部，区及乡农民协会得设青年委员一职，他的责任是计划并指导青年农民方面之一切工作。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须注意不妨害全般农民运动，尤应注意联合会战线策略之应用。

农村教育决议案

中国城、乡教育经费，直接间接，都是农民负担。拿湖南来说吧：省教育经费，最大部分出自盐税附加，这种税很显明地是农民负担的；县教育经费，出自田赋附加，这种田赋附加，一部分由自耕农、半自耕农直接负担，一部分名由地主缴纳，实则纯是佃农担负的；至于乡村教育经费，出自河捐（即谷米捐）、猪捐、牛捐、窑捐、屠捐、竹木捐、蛋捐、鱼捐、石灰捐、祠庙捐等等，无不是直接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

农民负担了一切的教育经费，而农民所受的教育怎么样呢？

专门学校、大学校，完全为城、乡的特殊阶级所专有的，当然找不出一个农民子弟的影子：中等学校至少要中、小地主的子弟才够得上有入学的资格；进得起高等小学的人，也多属于有余钱剩米的富农子弟；就是国民小学校的学生，也是少数比较有饭吃人家的子弟，多数贫苦农民是完全没有份的。总结一句：出教育经费的是贫苦的农民，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外的特殊阶级。据近来教育统计，全国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三，没有受教育的，竟至百分之九十七。这就是表明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贫苦人民，供给百分之三的特殊分子的教育经费。不但贫苦农民不能得到一点教育机会，反造成少数特殊阶级。这些特殊阶级，利用其优越的知识，来愚弄压迫贫苦人民，而且时常笑骂贫苦人民，指为“无知愚民”，这是何等不平等的事啊！

再看现在乡村教育的状况：私塾、学校同时存在。私塾是旧式农村经济的产物，到现在还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

想，这是极大的缺点，但私塾能投合农民的要求，课余教些杂字杂文，私塾教师亦能为农民书写应用文字，这些都合农村的需要，故现在的私塾，尚能得农民拥护。学校的好处，在于向封建思想完全笼罩的农村中间灌输进步思想。因此学校往往与地主阶级冲突，彼此争斗，至为激烈。旧学校教材的内容，半是说些城市中间的东西，太不合农村的需要；同时学校教师态度亦多与农民隔绝，所以农民对于学校，大多是怀疑的。以前乡村教育之又一缺点，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女人教育。其结果使目前实际生产社会中坚的大多数人物，陷于知识缺乏的状态，影响到革命之完成，国家之建设，实在大极了。

还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可不知道的，就是农民教育普及，全靠农民自己起来，有了自己的团结，从特殊阶级达到减租、减息及废除苛捐之目的，然后农民才能有余力自己举办教育。必须农民能够自己举办教育，然后农民才能开始接受文化；必须由农民自己举办教育，然后这种教育才是真正合于农民所需要的。否则如一般人天天所说普及教育，始终只是一句废话。而所谓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等等，实际都是些“打屁不挨腿”的东西。

大会根据上述理由，参照实际需要，特决定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之要项于次：

- (一) 下级农协应竭力注意开办农民学校，分为日班、夜班，日班教农民子弟，夜班教成年农民。
- (二) 农民学校的课程、编制及教材，省农民协会应从速组织农民教育委员会，编制应用。
- (三) 农民学校，应尽可能地设置妇女班。
- (四) 农民协会所办之农民学校，其经费之来源于下：甲、从佃

租中减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乙、提拔地方迷信公款；丙、省、县政府特别补助，在省、县预算中列为专项。

(五) 乡村原有之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其材料应力求适合农村需要，应由省农民协会教育委员会，邀同各界热心农村教育人员，组织湖南农村教育协会的大规模的农村教育运动，即由此会编制乡村小学教材。

(六) 为适合农村儿童就学的经济能力起见，国民学校应改四年制为三年制。

(七) 改良私塾，其方法注意向私塾教师灌输进步思想，并改良其教法。

(八) 为谋农民教育发展的农民协会应与小学校教师及私塾教师密切联络，并容许他们入农民协会。

(九) 省农民协会，应设法出版农村白话报、农村画报各一种。区、乡农协均应附设阅报处，并于乡村要道，张贴壁报。

(十) 国民学校，应津贴贫苦农民学生的中餐。

(十一) 县农民协会、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应创办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学校。

宣传工作决议案

(一) 农民协会是领导农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同时为农民本身利益而奋斗的机关，所以我们的宣传，要有一定的计划、统一的方法，才能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旗之下，实现我们的使命。湖南农民，在全省人口三千万的估计中，至少要占二千万的数量，一年来农民运动的成绩，虽已有一百二十万会员，但我们为革命前途着

想，仍旧是认为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宣传，取得全体农民群众的参加。

（二）根据上面的理由，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下面的几个原则：

1. 一切鼓动和宣传，须避免流于空泛及机械式的训话，而应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
2. 农村中的迷信、宗教、伦理及道德观念，都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只有渐次地设法提高农村文化程度去清除它，不必与它发生冲突。
3. 观察中国现在政治情形及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确定我们的总口号是全体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高租重利，实际参加地方自治，要求民选委员制的县政府。
4. 过去农民的错误，是过于依赖政治势力及迷信领袖，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从不断的斗争中，使农民认识自己团结的力量。

（三）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亟待进行，应采行下列几个具体办法：

1. 宣传机关问题

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应使省农民协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部，县、区农民协会亦应同样地设立县、区宣传部，严密地受省宣传部的指导和管理。

2. 省宣传部部务问题

（甲）设立农民通讯社。命令各级农民协会按时将重要农运消息向通讯社投稿，再由通讯社审查发表。各级农协会员不得自由报道农运上的通讯，致发生政策上的错误。

（乙）设立图书馆。尽量收买关于农民问题的书籍报纸，以作农

民运动的参考，到了稍有成绩的时候，将详细目录寄往各级农民协会，并制定借阅章程，以备各地借阅。

(丙) 日常部务：

- (1) 随时拟定各种纪念节日及政局的宣传大纲；
- (2) 时常向各地宣传部发部务通告；
- (3) 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
- (4) 接受并批评各地宣传报告；
- (5) 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问题，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
- (6) 搜集并调查各党派及社会各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言论及对省宣传部各种宣传的态度。

3. 出版物问题

(甲) 办一种专供农民阅读的周刊，目的在给各地农民以政治及革命理论的常识，指示农民铲除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

(乙) 供给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明了农民运动的刊物，注重农民问题理论的论述及农民运动临时问题之分析，可出半月刊一种。

(丙) 理论书籍的编辑。扩充农民运动丛书，以供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之研究。各地有价值之书籍也可斟酌翻印。

(丁) 农村补习教育的书籍：

- (1) 补习学校课本的编定；
- (2) 补习学校办学方法的编定；
- (3) 补习学校教育的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的编定。

(戊) 经常训练及鼓动的小册子、画报、标语：

(1) 文字的宣传品应极浅显而带趣味性，易为农民接受者。与其用论文，无宁用小说及有韵的歌谣或问答体的短文。

(2) 根据农民要求，选择简单有力而农民所能懂得的文字及意义，做成标语及画报。

(3) 各种宣传品有时可改变乡里传说及神话，而把革命的宣传附属上去。

(4) 农村中识字的占少数，所以我们还要注重口头的宣传。纪念节日及重要政治问题发生时，可印发谈话纲要，发交各级执行委员，以备与农民谈话。又可编制与农民有关系的戏剧，在各地排演。

(5) 农民小丛书，应照上面原则，扩张省宣传部经常的宣传品。

农民协会经费问题决议案

(一) 各级农民协会，因会务发展，工作增多，不能不确定相当数目的经常费用，如少数办事人生活费、办公费、宣传费、交通费等项皆是。但是，下级农协的经费数目，须根据各地工作情况及地域情形，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省协会之经费由省代表大会核定。

(二) 农协经费的收入，分为下列各项：

1. 会员入会费每人一百文，月费每月每人二十文，不得增加。非特别情形经高级协会批准者，亦不得减少或不缴纳。

2. 从公、私地主所收租额中，按照各地租率大小、租额多寡，减租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指定为农民教育经费。各地减租数量须

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

3. 酌提地方无益公款，但须经省农民协会的批准。
4. 县政府及党部的津贴。

(三) 各级农民协会经费收入支出，须造出预算、决算，向该级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公布之，县、区乡农协的预算、决算，均须经省农协批准，如省农协认为有情弊时，即令其停止支用。

对于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易礼容同志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决议如下：

(一) 湖南的农民组织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会员，在短时期中即有这种成绩，我们认为是满意的；但就全省局面来观察，为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这点数量还是太少。今后当更以十二分的努力，从事发展，以贯彻“全省被压迫农民在湖南省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口号。

(二) 在北伐军事行动中，浏阳、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处农民实行参战，因此使北伐军垂手而得武汉，湖南农民参战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同足证明“工、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的理论不为虚言。然此次参战农民牺牲很多，本大会敢代表全省农民深致敬意，并接受其革命精神。

(三) 一年来从湖南农民的斗争中知道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而其革命的最大对象则在打破封建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这种要求表现于反团防，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要求武装的行动中更加明显。今后的工作应领导农民，一方面继续作上面的争斗，以根本扫清封建余孽；一方

面更努力民主制度的建设，即实现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至于国民会议，而以多数贫苦农民为领导之乡民会议与乡村新自治制之建设为基础。

(四) 土豪劣绅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同时又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因农民的奋起，各地土豪劣绅为继续保障其剥削计，乃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于是农民乃不得不加以反攻，目前乡村中纠纷事实乃因此形成。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行动是很好的，今后更当加倍努力。

(五) 湖南农民运动中各地的工作同志，在微薄的薪资和过度的劳苦中，处处表现刻苦、努力、廉洁、一切为革命的美德，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但是有些同志行动不免流于幼稚及不注意外交的错误，这是应该努力改变的。

(六) 从全部工作的成绩看来，我们认为满意，然而今后值得我们努力改变的亦有下列几点：

1. 组织不严密，不开会缴费，不免有土豪劣绅混入；
2. 缺乏训练，因此农民能力不能增加，政治观念不能进步，或不信自己力量，或陷于骄傲；
3. 宣传不切实、不普遍；
4. 口号过高或过低；
5. 不能领导农民从斗争中得到训练；
6. 调查工作没有注意。

农民协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 各级农民协会，统一于省农民协会之下。

(二) 各级农民协会应向省农民协会立案，得其批准方为有效，但是区须由县转省，乡由区转县，再由县转省，县农民协会由省农民协会函请政府备案。

(三) 各级农民协会及执委，不接受上级命令，自由行动，违反农民利益，或与上级发生关系而不诚实（如报告不确实之类）者，个人则由上级警告或撤职，或开除之；全会则由上级警告或改组之。但区农民协会除警告外，不能执行此项职权，县农民协会执行此项职权须报告省农民协会。

(四) 县以下各级农民协会称呼不统一，有冠以地名叫作某区某乡的，有冠以级字叫作第几区第几乡的，为划一起见，应规定区、乡农民协会都用数目字区别。

(五) 解释章程及划定各级协会的权力，属于省农民协会。

(六) 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

(七) 为使会员与非会员不致混淆起见，由省农民协会特制农民协会会证颁发之。

(八) 县农民协会旗帜、印信，须由省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区农民协会旗帜、印信，由省农民协会颁发式样，由县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但县农民协会颁发后，须将式样呈省农民协会备案。

(九) 区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分设办事处。

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决议案

乡村公产如祠堂、庙产等项，应该要拿来做乡村公益事业，如创办农村教育，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等。近来各地土豪

劣绅，接受帝国主义所造的“赤化共产”的谣言，向农村中宣传农民协会是没收地方财产的机关，以恐吓一般乡民，将祠产、庙产到处瓜分，借图中饱，如湘潭、湘乡、浏阳、平江、常德……等县最近都有这种事实发生，若不设法制止，不独影响农村公益，且开土豪劣绅及其爪牙乘机渔利之门。

制止的方法，应请政府严令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及无益迷信款项，应由农民协会邀同地方革命民众团体公议保存及处置的方法，若有违反这项禁令，擅自瓜分公产，以图一己中饱，不顾乡村公益的，便是土豪劣绅，或属土豪劣绅的爪牙，得由地方自治机关公议处置，其情节重大者，应请政府按照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而惩办之。

禁烟问题决议案

鸦片流毒深入农村，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成为民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吸食鸦片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废时失业，有害健康，在社会上更发生了许多恶影响。湖南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赵、叶军阀勒种包销、饮鸩止渴的政策，应该根本铲除。尤以湘西各县受害最烈，政府应有彻底办法，以资救济。目前急务，应请省政府通令全省首先禁种禁吃，限期禁绝，再在全国规模之内，严禁邻省鸦片通过本省。

湘西问题决议案

湘西连年大旱，又加上几次的兵灾，人民不知死去多少，失业

的更是成群结队，更加土匪如毛，遍地抢劫。即使免于死亡失业，然而家居外出，假使不蒙土匪的庇护，也要遭不测之灾，吊羊勒赎，竟是寻常的事情。近更军队复杂，川军、黔军各达数万，此来彼去，勒索供给，动辄巨万，而且各自扩充势力，乱发委任，到处招安土匪。一到了冲突时，这里解散，那里聚集，这里剿灭，那里安抚。各据一方，放出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吏，任意添设税关捐募，勒种烟苗，苛派军差，极尽了压迫剥削的能事。湘西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黑暗政治之下，担负重大的税捐，受着兵匪的骚扰，简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机完全断绝。占全省三分之一的湘西，陷于这种紊乱状态，乃使整个的湖南政治经济，也不能统一。农民为解除自身痛苦，拥护湖南政治经济的巩固与统一起见，竭全力从事扩大革命民众的组织，增加民众自身力量，以反对军阀政治的工作。同时督促政府于最短时间，肃清不法军队，解决土匪问题，开辟交通，禁绝鸦片。

解放苗、瑶决议案

苗、瑶是一种古代民族，因汉族西来，避至湘、粤、川、滇、黔、桂深山间，人口有一天天减少的趋势，生活已到了极痛苦而绝无希望的地位。但是这些民族，可以说全体都是爱和平的农民，历朝外受汉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杀，内受土司、酋长的严重剥削，致使此等爱和平的农民，长处暗无天日的世界。而汉族人士习于传说，以为苗、瑶为极野蛮的民族，即灭亡亦不足惜。解放弱小民族为革命农民的志旨，农民协会尚有不问国别均得为会员的规定，我们对于同国异族的农民同胞，实有竭力提携的必要。湖南南部旧衡阳道

属土著多瑶民，西部旧辰源道属土著多苗民。本大会为解放苗、瑶起见，决议如下：

- (一) 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瑶农民协会。
- (二) 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
- (三) 开办苗、瑶简易学校。
- (四) 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
- (五) 请政府严厉剿灭苗、瑶土匪。
- (六) 请政府颁布解放苗、瑶的明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
- (七) 援助苗、瑶，解除土司、酋长的残酷压迫。

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

过去的湖南军阀及其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不剥削人民，侵蚀公款，以饱其私囊。现在革命势力虽已及于湖南，然而这些民贼，仍保存其由剥削侵蚀得来的丰富的财产，建筑雄厚的经济势力，以为他们图谋死灰复燃之基础。欲求反动势力之肃清，必首先没收其财产，毁坏其经济基础，使他们失其依附。他们的财产，既然是由剥削侵蚀而来，当然仍应还诸民众。所以我们对于没收逆产的主张是：

- (一) 督促清查逆产委员会，从速没收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
- (二) 各级农民协会负责调查当地逆产，报告清查逆产委员会。
- (三) 规定逆产为抚恤老、弱、残废、兵士及赈灾之用。

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

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这个意义，很可以就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明，尤其是经济问题，在各阶级连带关系中，更为重要。现在各阶级民众，在政治上共同的需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以求得真正的民权实现。在经济上是要发展生产，使原料丰富，出品增加，销场扩大。同时，知识分子，就能够拿着所学的进步的技术和知识，来应用于社会。

就湖南说，现在虽已归革命政府统治，然境内封建军阀余孽及一切反革命派还到处潜伏，阻挠革命工作，必得一律肃清。同时，对于建设方面，各阶级民众，应首先完成乡村自治，进而至于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国民会议，使时局发展，合于民众需要，而不至右倾。基于上项理论，及应付湖南政治环境，因此本大会提出工、农、商、学大联合口号，议定具体方案，促成湖南各阶级民众，一致团结，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期达到最后的成功。

拥护中国国民党新政纲决议案

在北伐军事势力进展九江、武汉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为应付新的政治局面起见，特召集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以决定今后方针，经审慎的讨论，产生了新的政纲。此新政纲，我们认为确实能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全国民众若能依照此新政纲继续奋斗，一定能使目前的革命早日完成。尤其是关于农民的政纲，尚能适合目

前农民群众的需要，使封建势力在乡村根本无存在之余地，因此本大会一致决议，愿率湖南全省农民群众，拥护此农民政纲。同时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最短期间，在行动上贯彻此革命之新政纲。

接受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对于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决议案

共产党为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一方面领导中国工、农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民众共同从事国民革命，反抗帝国主义，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一方面为实现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最近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对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的主张，本大会认为他们的主张确实是依照农民客观的环境及主观的要求决定的，因此本大会对共产党这种主张，完全接受，并训练各级农民协会，于最短期间，切实遵照执行。

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决议案

帝国主义八十年来宰制中国，因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军阀买办阶级的豢养，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其中，英帝国主义者以历史久远的资格更穷凶极恶，去年因民众势力的奋起，乃实行“五卅”大屠杀，结果，酿成“省港罢工”及全国排货运动，给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以绝大打击，然英帝国主义

宰制中国的野心，不因此而少懈。一年来，一方面实行勾结吴佩孚、孙传芳；一方面继续炮舰政策，如最近万县惨案，长江一带故意撞沉华船等事。本大会认为一切革命的民众，为求生存计，目前实有一致团结起来打倒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的必要。因此，特一致议决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并建议各县境内，各种民众共同组织反英行动委员会。

各级农民协会全体加入济难会决议案

中国济难会的宗旨，是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中之被难者，并发展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团结精神。自“五卅”以后开始成立，一年以来确实博得一般革命民众的同情。本大会除极端赞助外，并议决全省农民一律加入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各级农民协会设立济难分会，共图救济事业之发展，以期革命之早日完成。

拥护省民会议决议案

省民会议是保障革命民权，巩固北伐后方，肃清封建余孽，促成国民会议的出路。全省民众已组织了省民会议筹备处，限期举行，我工、农阶级实负着极大的宣传和推进的责任。湖南的农民们、工人们，从过去痛苦经验中，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当然要在省民会议中，得到一个具体的方案，一以促进国民会议之早日完成，一以实现农、工阶级之逐渐解放。对于漏网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或混入会议中来捣乱的，我们一定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去铲除他们。本大会特郑重决议：以全力拥护省

民会议！

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决议案

为集中革命势力起见，一九二三年，乃有赤色农民国际的组织。此世界农民协会，有完全的革命政纲，他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领导全世界农民为本身利益而奋斗。我们黄色人种的农民应赶快集中在他的旗帜之下，共同打倒我们的敌人。本大会议决湖南省农民协会单独加入农民国际，并应联络各省区已成立之省农民协会，一致加入农民国际。

抚恤北伐伤亡将士决议案

国民革命举行北伐以来，英帝国主义多年卵翼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全部消灭，今且进而号召第二次北伐与奉、鲁军阀实行肉搏。因此在国民政府领域之下，一切民众能取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绝对自由，而充分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民众本身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北伐将士的碧血换来的。北伐的将士为国民革命而喋血疆场，留下他的父、母、妻、子，在孤苦无告中过着日子。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兵士，因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破坏农村经济，不得已离土地而集中军营，其全家衣食，即赖血肉换来的军饷，今一旦失此衣食来源，全家悲痛之余，复有转成乞丐饿殍之患。

本大会一致决议，请政府据下列两个具体的方法以抚恤北伐伤

亡将士的家属：

- (一) 属于逆产的田地发给伤兵及阵亡将士的家属耕种。
- (二) 加征盐税三角作为抚恤费。

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决议案

我们的战线要是不集中的时候，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总是要被敌人陷在无援的地位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仅限于一个局部的地方的时候，因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常常是要走上错误的道路。据农民协会的章程，有三个正式省农民协会，即可成立全国农民协会。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在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组以来，确定援助工、农的政策，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最近中央联席会议，对于农民都能有很切实的政纲。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解决农民痛苦，归结要耕者有其田。”这确是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因为中国农民目前艰苦奋斗，努力向前的目标即在“耕地农有”。

中国国民党的最大使命，真如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所说：“当遵先总理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

谁能预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问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与否。

本大会敢代表湖南二千万农民誓以全力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同时并希望党与政府在最短期间，贯彻“耕地农有”的政纲。

1927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在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 大会上的讲话^[1]

(1927年1月4日)

—

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看到很多妇女参加第一区农协干部会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农民的革命精神讲话的一部分，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



湘潭县第一区农协会所在地银田寺白庙。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农协干部和群众大会，并作讲演。



毛鑒公祠。毛泽东曾在这里参加特别区第三、第四乡农协召开的大会。

和农协干部的谈话^[1]

(1927年1月)

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这是毛泽东和毛福轩、王淑兰等农协干部谈话的一部分。

在询问唐家圫农民运动情况后的谈话^[1]

(1927年1月)

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1] 1927年1月9日至14日，毛泽东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圫外祖父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20余人座谈。这是毛泽东在询问了唐家圫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谈话的一部分。

土地问题草案^[1]

(1927年)

本党总理在同盟会时代，即注意到非解决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革命不能彻底成功，当时所提出的口号为“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仅能限制大地主之垄断土地，仍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故后来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总理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及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话中，均极力发挥耕者有其田的重要。以为必定为要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痛苦，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痛苦，革命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才能使革命彻底成功。所以，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了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总理并不主张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毫无准备，即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在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重重压迫底下的农民，他们第一步所急于需要解决的还不是土地问题，而在推翻那些解决土地问题的障碍物。所以本党在总理指导下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政纲与土地有关的只有

[1] 本篇是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拟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草案。具体时间不详，但从文件的卷宗来看，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档案内，由此判断当在1927年1月至2月。

“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及“整理耕地”的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政纲关于土地问题之决议，亦只有“从速整理耕地”及“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的明文。去年联席会议决定之最近政纲，与土地问题有关者，为：（一）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二）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做基金；（三）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分配于贫苦农民；（四）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这些政纲都未能达到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现在客观事实的需要已经进了一步了。一年来农民解放运动，因农民自己的努力和本党的领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本党以前所定的农民政纲，虽然还是很普遍的为农民所要求实现而没有实现的，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农民，确有进一步的要求，本党以前所定的政纲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个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呢？便是“耕者有其田”。

我们试留心地看一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已经协助本党取得了一部分的政权，打倒了军阀和一部分土豪劣绅。但是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吗？痛苦还不是没有解除吗？农村中被驱逐于职业界外以致流为土匪、乞丐或卖身于国外资本家的无产者，不是一日一日地增〔加〕吗？半无产的部分即虽有若干土地或资本，但收入不够支出陷于负债地位的农民，这一部分半无产的农民比无产部分数目更多。这些全无土地资本之贫农，我们提出减租减息减税等口号，简直和他们不生关系，既半无产的贫农，这些口号所能给他们的利益亦属不多。这许多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后，他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样的贫苦农民，在农村中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占全农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将怎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要求土

地的时候了，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已经到了要行动的时候了。并且在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大刀会、连庄会和以前的白狼〈朗〉、老洋人等，更是很大的贫农群众，其形势之严重过于南方。我们的革命势力不久便要到北方各省，北方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会要立刻发生，所以本党目前对于土地问题，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因此，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下列各项的议决：

- (一) 组织土地问题委员会于最短期间内计划解决土地问题的解决。
- (二) 各省省政府须于短时间内将全省的土地情形调查完毕。
- (三) 省政府须从速设立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给农民。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927年2月12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所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创设，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备案，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考送，湘、赣各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者，外得斟酌农运发展需要添设他省学额若干名。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湘鄂赣三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并请中央党部津贴。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第二章 学制

第六条 学级编制暂分三班，遇必要时得再行分合。

第七条 学科规定于下，遇必要时得行增减。一、三民主义；二、国民党史；三、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四、帝国主义与中国；五、社会进化史；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七、各国革命史略；

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九、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经济学常识；十一、政治常识；十二、法律常识；十三、中国职工运动；十四、农民问题；十五、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十六、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七、各国农民运动状况；十八、乡村自治；十九、农村教育；二十、农村合作；二十一、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二、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三、农业常识；二十四、农民组织及宣传；二十五、农民自卫；二十六、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二十七、革命歌；二十八、革命画；二十九、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第八条 学习期间定为四月。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九条 本所设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委员会，管理全所事务。委员会由三省党部委员若干人，中央农委委员一人，并请中央党部加委组织之。委员会推定主任委员一人，办理本会日常事务，对外代表本所。

第十条 本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项。主任由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酌量情形聘用干事若干人。

第十一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项，其组织如下：

- 一、教务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及教员若干人组织之。
- 二、训练委员会，由训练处主任及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 三、事务委员会，由事务处主任及事务员若干人组织之。

第四章 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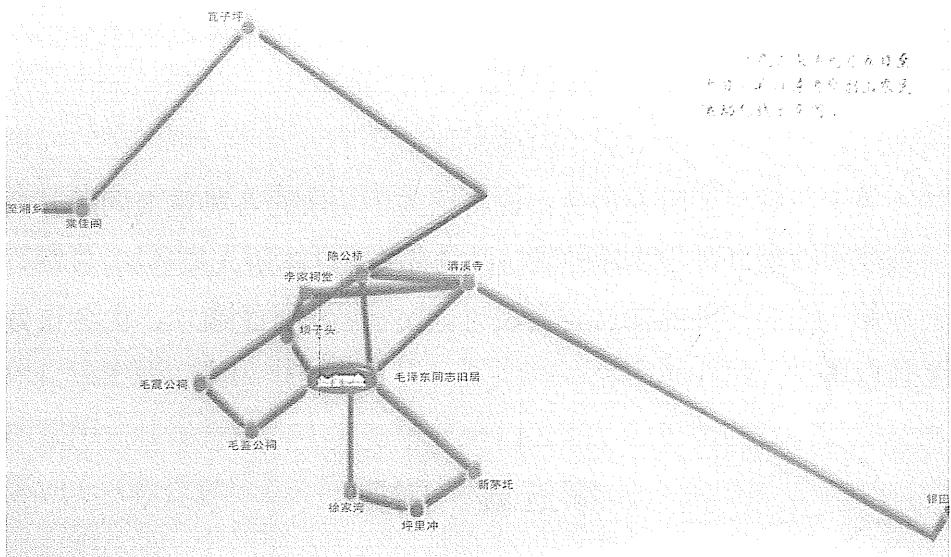
第十二条 全所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全所之各种重大问题，由主任委员召集，遇必要时得请与议案有关系之本所人员参加。

第十三条 各处委员会会议讨论属于各该处之事项，由各该处主任召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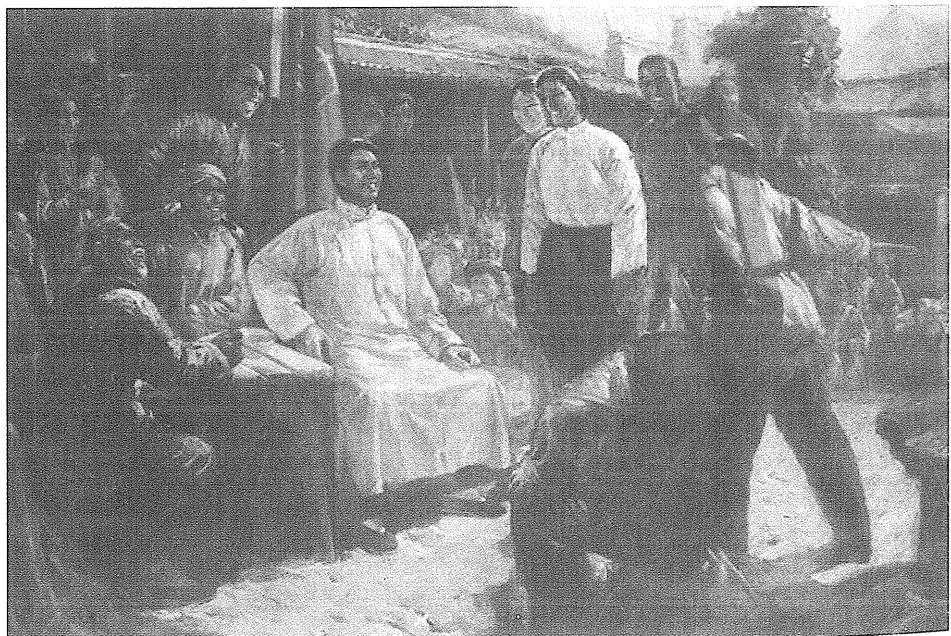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委员会提议修改之。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三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后施行之。



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路线示意图。



《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油画)

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

(1927年2月16日)

弟二月十一日由长沙到武昌，兹将各事报告于次。

一、弟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与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中商量各种决议案，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十二月三十日大会闭幕，与区委决定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训练班，弟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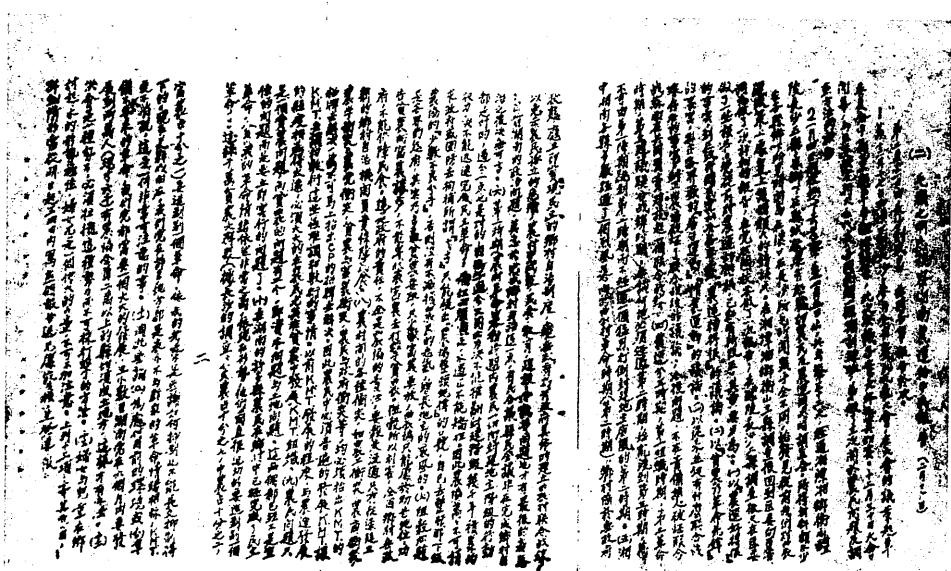
二、一月四日起往乡下去考察，至二月五日止，共考察三十二天，经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乡，在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表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作了一些报告。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改正，其重要点为：（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起一个联合战线。（四）农运分三时

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五) 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地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去农村孤立的危险；农村□武装、民食、教育、建设、□□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之后决无可言。(六)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七) 阻谷问题是各界的□□，其实乃多数贫农要阻，只少数富农要放，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贫农向富农让步，不能要代表富农去打击贫农，阻谷所以利害，全因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要谷米流通只有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负责保障民食。(八) 农村间的各种冲突，如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学冲突、农党冲突、贫农与富农冲突、农民与政府冲突等，均必须抬出K.M.T.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的招牌去解决。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地发展K.M.T.，让K.M.T.去调和敷衍这些极难调和敷衍的事情。以前K.M.T.发展的程度，与农运发展的程度相差得太远，必须大大地在农民尤其在贫农中发展K.M.T.

组织。（九）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十）在湖南的许多县农民在乡村中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地要进到另一个革命！这样千万贫农大群众（据长沙的调查：贫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要进到另一个革命，依我的考察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十一）因此要论（a）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b）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才六千）有农协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这样才有办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与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口察核，并登导报。



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完毕回到武昌，16日给中央写了报告。图为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

(1927年)

一 创办缘起

本所是由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而成的。要叙述本所成立之经过，当从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说起。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创设，是有下列的要求：湘、鄂、赣三省为本党新开辟之省份，三省的反动军阀，虽云打倒，但是军阀的基础尚未铲除，革命的基础，亟待培植。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在湘、鄂、赣三省要建设民主的政治，铲除封建势力，这种扩大民众的组织，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实为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工作了。为应付这种革命的需要，必须培养一批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以担负这个工作，这是创办农所第一个要求。其次大家都知道，农民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如果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民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的。因此农民问题，实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可是如何去搜集这些问题的材料，如何去分析研究，如何去求谋解决，在本党统治之下，如何去具体实施本党农工政策，在军阀宰割之下，如何去领导农民起来，向敌人进攻，这些问题，都逼迫着我们解决，而且非集合各方面的聪明才力，以对付这个问题不可。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遂

在这些迫切要求之下，产生出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系湘鄂赣农所扩大而成，则其所负使命，当更重大，可以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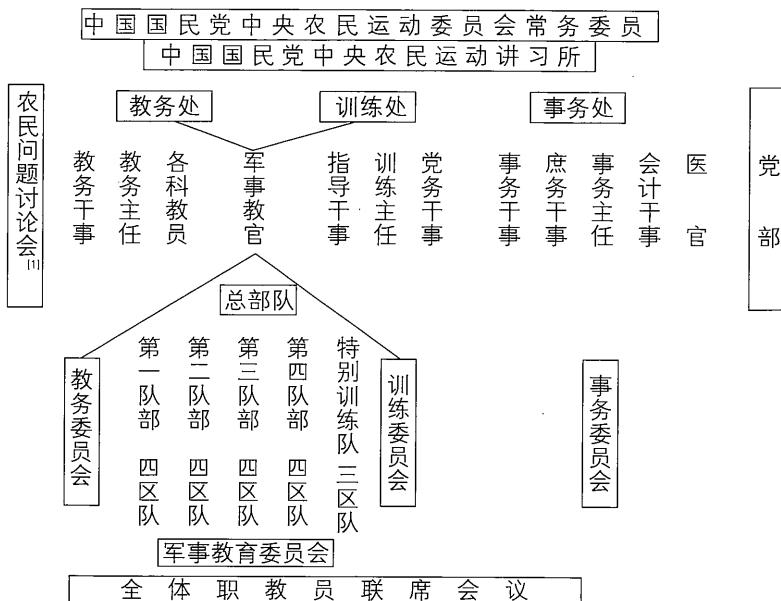
二 筹备经过

创办农所，各方已感需要。而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即决定学生选送数目，赣一百五十名，湘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及经费负担办法，每名费用八十元，湘赣各担负一万二千元，鄂一万六千元。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员共有八人，均由三省党部先后推出，湖南省党部所推出者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鄂省为张眉宣、陈荫林、李汉俊，赣省为龚式农、王礼锡。筹备处于一月十六日成立，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当时筹备处仅住一人办公，房屋校具，一切无着，经费仅湖南来了二千元，而距开学期又不过月余，筹备实感觉非常困难。共开了五次会议，所做的工作，第一，就是找定所址。武汉机关林立，学校多被占领，农所学生又多，几乎无法找得相当所址，经过若干转折，始找定现在房子，但是曾驻军队，毁坏不堪，许多的经过加工修造。第二，就是设备一切。讲桌床铺食桌以及其他一切用具均系从新设备。第三，就是招考学生，规定考试标准，湘、鄂、赣三省学生，完全由三省党部考送。此外为顾及全国农运之发展，添招皖、苏、川、豫、直、陕学生共一百名。亦由各该省党部选送。第四，就是拟定课程，聘定教员。附课程表于下：

科 目	时 间
三民主义	十六
国民党史	六
国民党宣言及议决案	八
帝国主义与中国	十八
社会进化史	十八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十二
各国革命史略	十
中国政治经济状况	十六
世界政治经济状况	十六
经济学常识	十六
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策及宣言	八
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策及宣言	八
农业常识	十六
农民组织及宣传	十六
农民自卫	四
政治常识	八
法律常识	十
中国职工运动	八
农民问题	二十五
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	十八
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	十二
各国农民运动状况	二十
乡村自治	二
农村教育	四
农村合作	十二
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	十六
革命歌	八
革命画	八
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操练每日二小时 教授共六小时

筹备将告完竣，忽闻南昌方面，取消农所，江西学生亦说不来。但是此间仍旧进行，不稍松懈。而中央党部此时已在武汉将开始办公。中央党部认举办农所为非常必要，遂于第七十六次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由此本党全国之农所，遂由湘鄂赣农所演变而成了，但是湘、鄂、赣三省选派之学生及负担之经费，均无变更，惟增加苏、皖、豫、鲁、直等省学额共三百余名，合计原定学额，共九百余名，经费预算，合计经常开办两种费用增至九万六千余元。

三 组织系统



[1] 农民问题讨论会是由教员与学生组成的，将农民问题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均分组讨论，求于政治经济各理论教授之外，对于这些实际问题的内容与解决的方法有充分之研究。

四 编制概况

现在学生共有七百五十一人（过半月后即将增至九百五十名）：

湘	一百五十一	鄂	二百零六	赣	一百四十九
豫	三十六	皖	二十四	苏	十三
川	二十五	贵	一	陕	四
晋	七	奉	五	直	十
闽	五	浙	五	鲁	三十

现分四班，每班为一队，三班设本所，均系四月毕业；一班设花园山，为特别训练班，学生多是豫鲁北方等省武装农民，毕业时间定为一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1927年)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进来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进来这里的目的一并不和他们进普通的中学大学一样，我们的责任自然也和他们不一致。因此我们进所之后一切的生活自然也和他们不能相同。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受殖民地的被压的三万二千万的贫苦农民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吗？我们现在惟一生路不是要唤起这广大的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起来反抗吗？我们除了革命，除了和我们的敌人拼命，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进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这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敌人的状况，他们几千年来占据了社会上优越的地位。这便是说，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他们的基础十分稳固，他们有他们的组织，他们有优裕的经济能力，有凶狠的武装（军士警察）、有拥护特殊阶级利益的法律习惯和一切封建制度，做他们的护符，所以他们是很不易的，这两年来，在广东、在湖南、在湖北、在北方各省，农村中都发生了

莫大的冲突、莫大的流血，结果我们农民群众，虽得到了许多进步，然而我们的牺牲，也真不小，这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强敌，是很不容易打倒的。

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战线上，同时出现了许多毛病，许多足以减剥我们斗争能力的毛病。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颇散漫的，几千年来老生活把他们弄成不问政治，只望真命天子出世救人的依赖思想，他们对于地方的观念、家族姓氏的观念很深，一切封建社会的坏毛病，都因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膨胀、发展使之笼罩在农民的身上，现在要农民起来，反抗他们根深蒂固的强敌，真是谈何容易？便是我们自己也何尝不是一个从封建社会里出来的人，也何曾能够免除了封建制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毒物是什么？我们不是过惯了个人主义的浪漫生活吗？我们不是不大喜欢受团体的干涉吗？我们不是不喜欢有秩序有规律的生活吗？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人不免时常假借自由平等的名词来掩盖他一切的罪过，这些人喜欢崇拜英雄主义，喜欢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人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批评，常常从他自己个人做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关系，随时在他的后头做他的指挥者；他的眼睛只看见了人和人的关系，看不见群众和客观的事实，这样的最容易变成一个唯心论者；口中常常发出许多良心论、道德论。

同志们！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级出来的，所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容易丛集在我们的身上。上述那些毛病，我们不是时常犯着吗？这些毛病，最能妨害我们的革命工作。我们虽然

是一个具有热烈革命性的青年，仍多少免不了这些毛病在身上作怪。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存在的原因。

同志们！我们的敌人这般地凶横顽固，我们的责任这般重大，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地扫除，我们更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同志们！我们跑来这里，从消极方面，要把我们这些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扫除；从积极方面，我们要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这样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责任。同志们！我们为着便利我们在所内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好的革命的工具，我们应依照下面规定的各条去努力，这些规定我们不要看作一种普通的学校规则，乃是使我们达到变成一个好的革命党员的一种必需的方法。这些条文我们大家都经过一番讨论发表过意见，都认为是我们必要的东西，并且经过最后的决定颁布，已经成为本所的纪律了，我们一定要一致服从，因为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即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这种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达到使我们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造成好的革命党员之唯一方法呵！

我们必须绝对服从的纪律：

（一）为了达到团体化、纪律化起见，除了服从党的纪律命令之外，要服从本所的规则和命令，除本规约规定者外一切临时发布之口头的文字的规则和命令，均应一律遵守。

（二）本所学生对于所内各事都可以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但为

着避免意气用事，与无谓的纠纷和冲突起见，不应随意施行攻击，随意向外发表不满意的言论或文字。我们应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全所的利益上，用书面或口头向负责人陈述意见，请求答复或办理。在没有答复之前所有一切处置和命令不得违反。

(三) 本所职员教员教官和学生应表示互相尊重的态度才可以得到有意义的训练。

(四) 无论对本党的同志或非同志，都应有一种很诚恳的态度禁止讥笑、谩骂、斗殴及匿名攻击。

(五) 为要改正散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六) 要养成团体的活动，便要牺牲个人的成见，服从团体的议决，除在未议决之前，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一经议决之后，便不能故意违反。

(七) 本所学生是预备到贫苦农民阶级去的，所以要有练习耐劳吃苦的生活。

(八) 所内生活应注意谨守规定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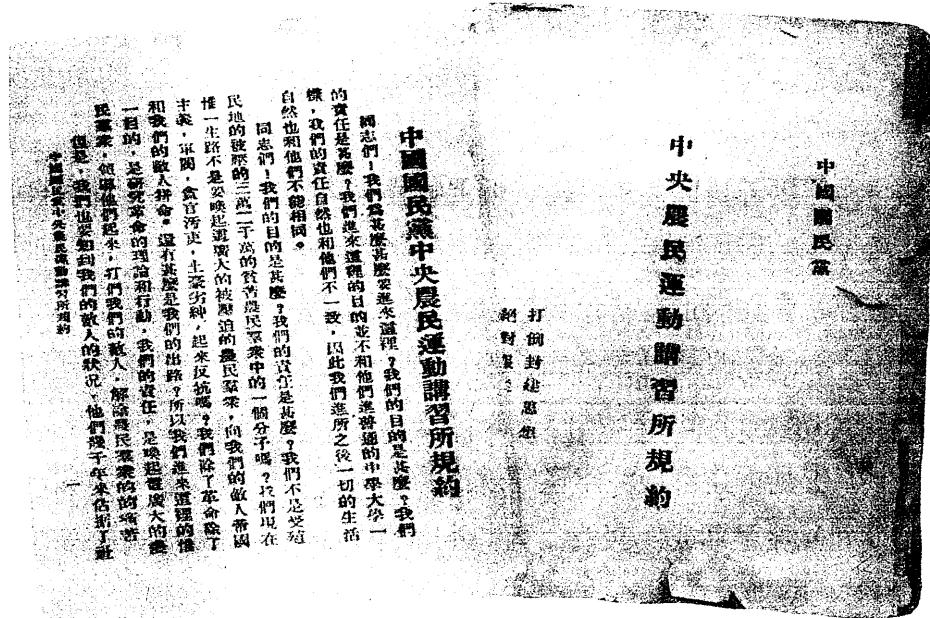
(九) 除星期或例假外，有事外出均应请假，请假处所普通者在总队部，特别者在教务处，得其许可方能外出。除特别情形外，准假与否，以是否妨碍功课之学习为标准。

(十) 教室、寝室、食堂、浴室各处均应保持清静及秩序。

(十一) 对于所内器物，应谨慎使用，不得任意破坏。

(十二) 违反本规约者依其情节的轻重分为下列七项处置：

- (1) 劝诫
 - (2) 警告
 - (3) 罚立正或举枪
 - (4) 禁止星期外出
 - (5) 令其服劳役
 - (6) 罚守卫
 - (7) 令其退学
 - (8) 呈请党部开除党籍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程》。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

(1927年)

同志们，同胞们：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義，其意義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铲除国内封建政治势力，所谓封建政治势力，即军阀及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我们晓得军阀及土豪劣绅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帝国主义有了这两只手，就可尽量地销售洋货，贱价收买原料，以剥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斗争力量，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不能铲除。所以，农民问题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革命問題。农民問題之重大，到现在是没有哪一个有勇气敢来否认。谁反对农

[1] 1926年秋，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急需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因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结束。学员派回原籍，领导农民运动，掀起了一个农村斗争新高潮。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革命中心已由广州移至武汉，这时毛泽东又到武汉筹办了这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培养革命干部。

民运动，谁就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了农民问题，要肃清党内与帝国主义军队妥协的破坏农工政策的右倾分子。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要继续二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可是这种重大的工作，这种重大的运动，一切革命民众都负责任，都与之有关系。我们在这奋斗的途中，谨盼望各界革命的民众，予以诚恳的指导。我们应该呼：

扩大农村革命！

铲除封建势力！

继续北伐工作！

消灭奉鲁军阀！

拥护总理农工政策！

反抗破坏农工运动的一切反革命派！

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筹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图为武昌抚院街农协遗址。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927年3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所由中央党部创设，定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依全国各省农运发展需要，招收学额，至各省每期学额，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选送学生之各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不足之数，由中央党部拨给。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第二章 学科

第六条 学科规定于下，遇必要时得酌量增减之。一、三民主义；二、国民党史；三、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四、帝国主义与中国；五、社会进化史；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七、各国革命史略；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九、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经济学常识；十一、政治常识；十二、法律常识；十三、中国职工运动；十四、农民问题；十五、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十六、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七、各国农民运动状况；十八、乡村自治；十九、农村

教育；二十、农村合作；二十一、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策及宣言；二十二、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策及宣言；二十三、农业常识；二十四、农民组织及宣传；二十五、农民自卫；二十六、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二十七、革命歌；二十八、革命画；二十九、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第七条 每届学习期间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八条 本所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并互推三人为常务委员。

第九条 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务，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视事务之繁简，聘用干事。关于党务事项，由训练处掌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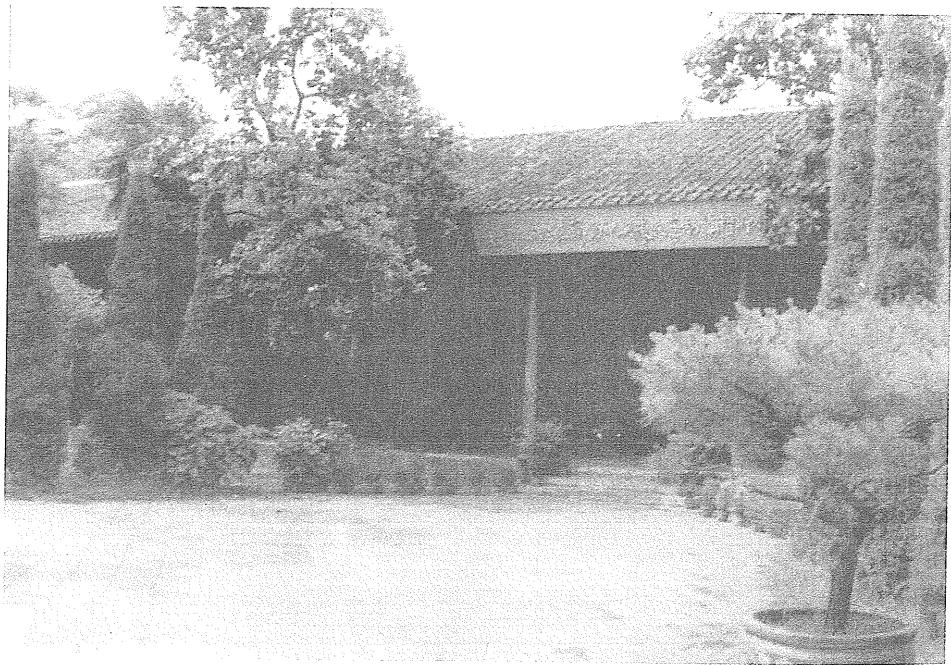
第十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务。其组织如下：

- 一、教务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 二、训练委员会，由训练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 三、事务委员会，由事务处主任及事务员若干人组织之。

第十一条 各处及各委员会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拟定呈请中央党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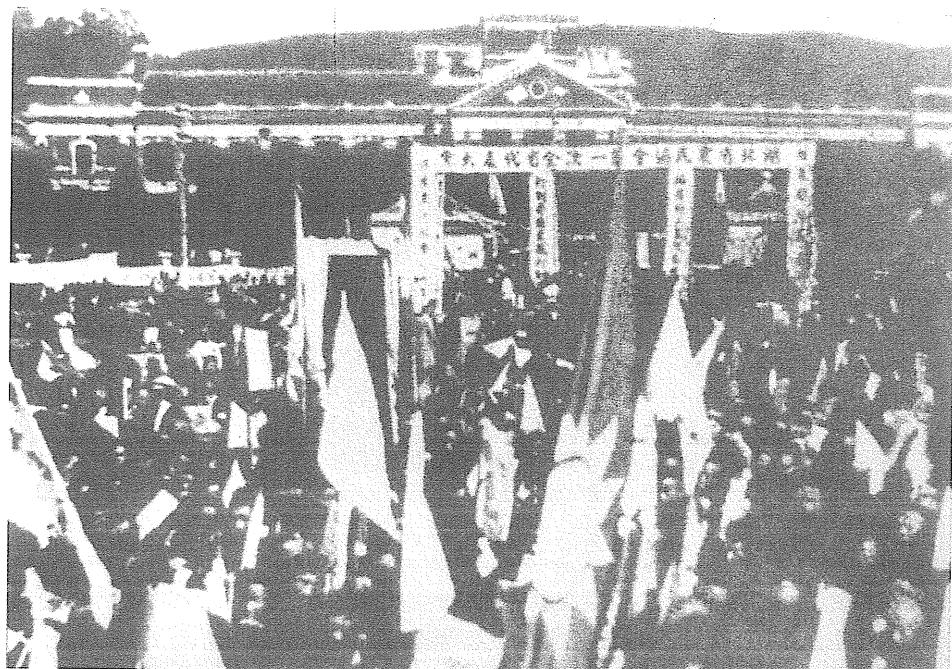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毛泽东等亲自授课。图为农讲所旧址——武昌红巷13号庭院。

给省农民协会的信^[1]

(1927年3月14日)

径启者顷阅长沙报载，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一书，此书原系供本所学生及各省农运特派员参考之用，并非卖品。如需翻印，惟必具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否则不准翻印。即祈贵会代为办理为荷。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一事给湖南农民协会的信。



1927年3月4日，湖南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毛泽东被聘为名誉主席。图为农代会会场。

农民问题案

(1927年3月16日)

民国十五年十月，本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曾通过多条关于改良农民现状的决议。自是以后在五个月中，乡村间被压迫的农民与压迫者（如地主、绅士土豪、污吏）间之斗争，更有广大之发展。但是联席会议议决在各地方多没有实现。农民协会，虽欲企图实现此等议决，而常遭乡村把持政权者之严厉拒绝，或打击。政府与党部方面，因忙于军事行动，对于农民不能保障其组织，更不能给与积极的援助，使建立农民自治的政府，使农民能以自治政府的权柄，战胜其敌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口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抑制农民运动之发展，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要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一定要铲除这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这些封建的残余势力，就是农民痛苦之所在，也就是军阀，及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生存之基础。所以本党与国民政府必须竭力保障其发展农民的组织，并竭力使联席会议议决实现。此议决实现本党谋中国农民解放之第一步。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并一定会失去农民的拥护，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拥护。本党不但为要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反军

阀反帝国主义之争斗起见，须努力求农民运动之发展。本党代表大多数农民之利益，亦当随时扩大农民运动，务求被压迫农民，能以其自己之组织与斗争的力量，达到其要求本身解放之目的。本党无要保障农民之能获得解放，必须发展农民之组织，使其能在任何政治条件之下，皆能以自己力量，与一切压迫彼等之势力斗争，方足以使国民革命之胜利成为农民的胜利。故□为要建立统一的民主政治起见，为要使三民主义确实开始实现及使农民明白本党为其好友与保障起见，本党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应有如下之决议：

立刻实现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所通过一切对农民问题之议决，在新从军阀铁蹄底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尤应根据考察农民的实际要求，妥定实现议决之方法。为达此目的起见，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国民政府主张设立农政部。其责任为实行土地改良及农民所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改造与建设。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议下列十项，政府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须立即：

一、政府应立即着手立区乡村自治机关，由乡村居民按照区乡自治法组织之，管理区乡间一切行政、经济、财政、文化等事宜。农民协会应在本党指导之下为组织与指导此自治机关的中心。区乡自治法另定之。

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必要时乡自治机关内亦可设立之），由农政主管机关派员及农民协会代表组织之，以筹备土地改良及实行政府所规定关于土地整理与土地使用之各种办法。

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自治机关，如有不服从者，即应依照处置反革命条例处办之。区乡自治机关，应有改组此等武装团体之权力，使此等武装团体确能保卫乡村人民，而为乡村人民之武力，保卫乡村人民所必需之武力。

如感觉枪支不足时，政府须设法补助之。

四、本党关于联席会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之议决，应于本年内完全实行。田租契约应向乡自治机关注册。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并监视不得超过决定当地最高租额。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应废除一切租约内或租约外之任何苛例，应由政府下令，准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非地主亲自收回耕种，不得其田另佃。如佃农自愿退田，或田主收回亲自耕种时对土地所增善者，应得相当报酬。

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各宗族公有之祠堂地产，须禁止族长或少数反动分子把持口违反宗族内贫困者之利益。

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此等土地财产之属于区乡者，应视为人民公有。

七、旧有田税法制实为不合理不公平之税则，急应改革，至于现在征收于农民之各种苛捐杂税，为害农民经济甚者，亦应逐次废除。政府应从速规定与当地需要相当的划一税率。其他对于土地及乡村生产品所征收之杂税，须一律废除。如此方可减轻农民负担，一切收税机关应移转于区乡自治机关及财政主管机关特派员之掌握。不准劣绅土豪盘踞，必须完全改组。

八、为减轻农民受高利债剥削起见，政府应颁布明令，禁高利剥削，规定利率，不得高过年利二分或月利二厘，并禁止利上加利对于农民旧有之债务。国民政府农政部应速决完办法，解除农民因债务之痛苦，并应设法立即组织农民银行，年利百分之五贷与农民。

九、为防止地主及奸商抬高粮食价格及救济天灾时之贫农起见，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请求农政主管机关给以管理粮食出口及

保存一部分粮食之特权。

十、国民政府应加紧筹备以下各问题预备提出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付租须经由乡村自治机关，如何政府可由租内扣除田税；（二）实现民主制度之县政府；（三）组织独立的民主的司法制度，以解决由土地而来的问题及他种问题；（四）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以上各项仅为中国农民解放斗争之第一步工作，自此等斗争扩大胜利则必须唤起农民自己起来活动，且获得政府全力之援助。

中央全体会议深信以上各项之实现，一定认为国民革命唯一巩固的基础，中国千百万农民将赞助本党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之共同奋斗，全体会议深信此种联合战线一定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消灭一切军阀及排除农业发展之障碍，并可解决社会上一切衰败的现象，如失业土匪等等。因为如果不能使三万万农民得到解放及提高生活，那么中国工商业必定不能振兴，而且将继续依赖帝国主义。以上各种改良计划，是建立新社会制度之唯一方法，中央全体会议对于一切阻碍或破坏此种联合战线或妨碍农民运动之发展，或阻碍国民政府解放农民及解放全中国之革命政策之实行者，必毅然决然与之奋斗。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应决定：（一）下次全体会议，政府应有对于以上各项实施成绩之报告；（二）号召本党全体党员一致起来，宣传此项议决，使中国农民全体了解，在各乡村各军队、各团体中或用印刷品或对不识字者用宣读方法，务使每一人都能了解此项的决议。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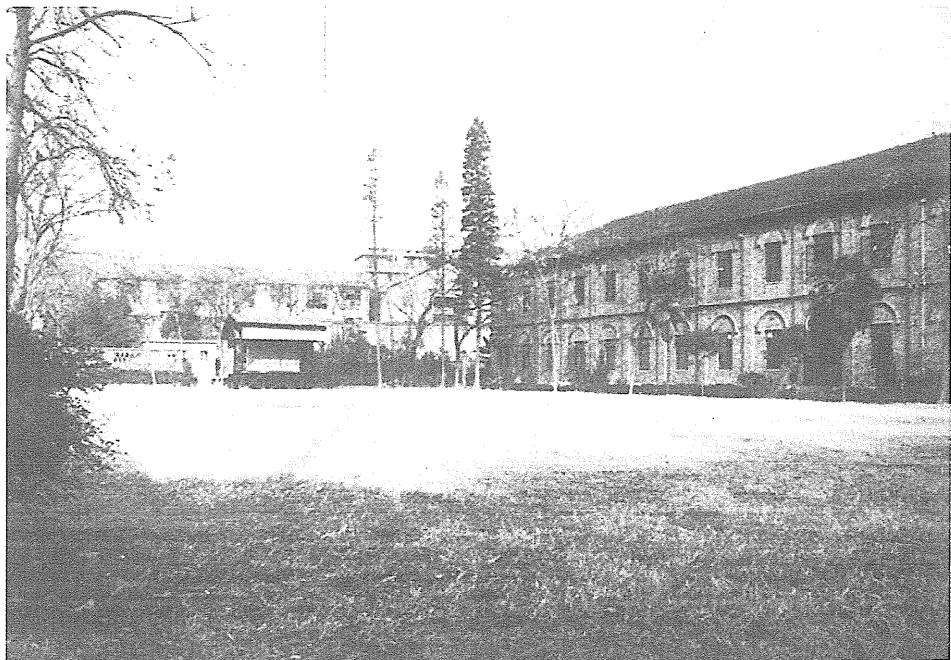
《调查归来》(中国画)

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致辭^[1]

(1927年3月18日)

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1] 1927年3月18日晚7时，中央农运委员会、中央农运讲习所联合开会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会场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会鄂豫二省农民代表、中央委员、中央农运讲习所全体及来宾1000余人。主席陈克文宣布开会，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读遗嘱毕，主席致开会词后，中央委员毛泽东致辞。这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致辞。



1927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作了湖南农运状况的报告。图为大会会场武昌农讲所大操场。



《发展农民运动》(油画)



《发展农民运动》(油画)



《农民运动万岁》(油画)

对农民宣言^[1]

(1927年3月19日)

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农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中国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之最大政党，负有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发布宣言，对于农民问题，特加注意。民国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议决对于农民运动的纲要。同年十月底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发布新政纲，关于拥护农民利益者二十二条。三年以来，本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拥护自身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组织之广，几遍全国，使革命风潮特别扩大，革命进行特别顺利。这都是因为农民受痛苦最深，求解放最切，而本党适能拥护其利益，扩大其组织，领导其行动，才有这样的结果。

最近各地农民起来的形势，至为迅猛。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短期间内，有极大的发展。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军的进展，

[1] 这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提出的对农民宣言。

农民必定迅速地起来，成为拥护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参入战争扶助革命军得到胜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这个封建地主阶级，乃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特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对于农民的剥削，都凭附这个特殊阶级才能达到目的。故封建地主阶级，乃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之真实的基础。不推翻这个特殊阶级的权力，则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虽有形式上之破败，其使之存在的实质并未消灭，时常有使革命改变性质的可能。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则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等等简直无从说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本党具有最大之决心，将领导此种争斗，使得到最后的胜利。

本党为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并使这个争斗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此外本党尚当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装。总之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

农民在政治争斗胜利之后，经济争斗便随着开始，农民经济奋斗意义，为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个剥削的

总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本党的任务，即在领导农民反抗这种剥削。本党联席会议议决政纲有如下数条：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禁止重利盘剥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三、禁止上期租；四、禁止预征钱粮；五、禁止包佃制。此次全体会议又决定佃农使用土地权，改良田税法则，并规定农民的自治机关，关于地方经济事务之各项主管权力，皆属农民初步的经济争斗之纲领，本党必须领导此争斗，使继政治争斗得到胜利，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当用政治的力量帮助农民达到目的。

不但如此，因为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地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原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的数目，到近年而愈扩大。完全无产的赤贫农民，与有产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贫农民，占全体农民中之大部分。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乃一切纷扰变乱的根源，同时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二十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到“农民之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总理并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皆深知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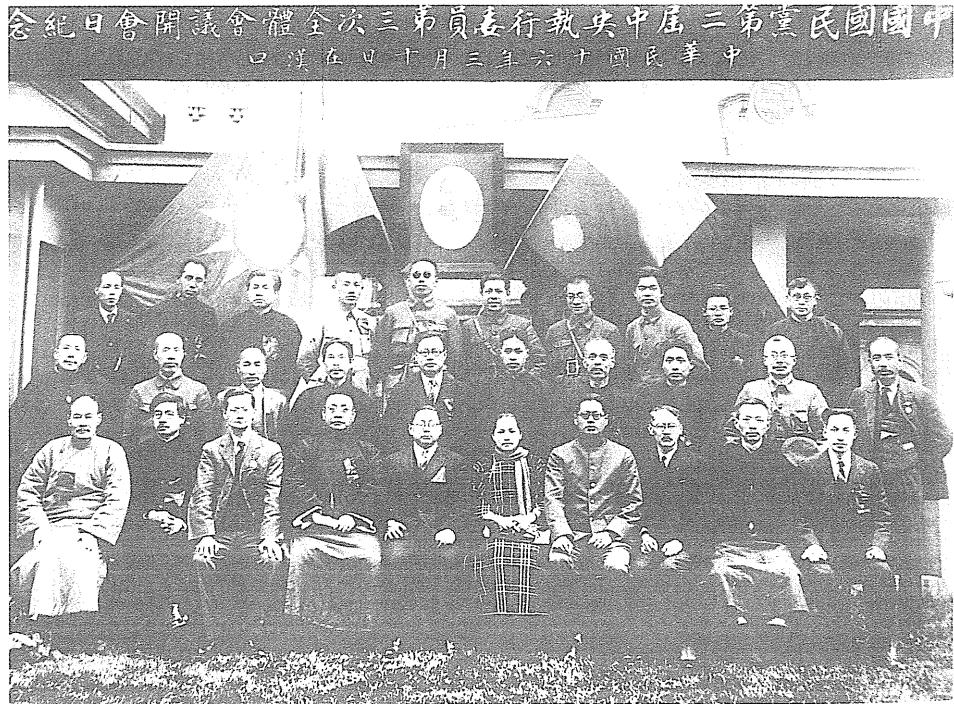
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

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至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云，“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济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政纲亦以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本党当于最短期内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使本党政府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之资本缺乏问题。

总之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减轻其剥削，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这是本党历史的使命，本党当毫不犹豫地执行之。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演达 陈克文 毛泽东



1927年3月10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委员合影。中排右三为毛泽东。

中央农运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 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27年3月26日）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承受的责任。

(一) 大冶水泥廠工會工人學校一所，該校成立子弟班三級，補習日後各等二級，人數頗為龐大，課程選用鋼工會委員會草稿辦理，男女學生共六人，青年自力社，組織在宣學生課外的活動，就該校原同學宋八仙師質於社會活動，均相當之賓至云。

(二) 富源烟礦工人學校因煙用鋼管，暫時只設一班，計子弟班四，補習班日後各二，不日即開學，受學生來報名者甚多，據同學的，至少有學生三百名左右云。
(三) 大冶鋼鐵廠工會工人學校，現已設立三所，學生除補習班正在報名外，子弟班已招足一百三十名，祇次數分子弟班二，補習班日後各一。婦女班一，預定於四月一日正式開學，各項書籍用品，已由總工會款項發代為辦妥矣。

10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追憶

卷之三

石鼓文

讀書處分石我兩態度

卷之三

故而深入所。民戶僅六萬，以

一并分派于諸郡縣，以期無

卷之三

七十一

卷之三

清開利公司

南史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英美烟公司謹

卷之三

工人學校電工復職

• 謂詞：各位同志，今天我們還有時間停死停活嗎？
• 故是更應該表明我們的責任，應該看自己死的開
• 漢的血路而那當時的財地勢力退後，並非是我們能幫
• 利。因是我們被逼迫的農工還未完全解放，故當此
• 努力奮鬥，（下場）次毛仔京演說，大意就在這革命的
• 的範圍內，並不斷的演出懷於農工的事實，由此可沒明示
• 此的殘餘勢力，正取在林鳳陽兵，向我們作最後的抵抗，
• 一莫今日起，我們要下一次心，向那股反動分子勢力退後
• • 露明達到真正目的，這是任今日這種大會中，我們應當
• 備受的責任，（下場）惟由其他來賓依次演說畢，當時人
• 個士豪劣紳，貪官污吏，和軍閥的口號一帶出其聲勢从不
• 分，七時許開始扮演杭州優樂，及穿賓助演各種歌舞，一
• 命的空氣，益發濃厚，晚十時散會。

1927年3月26日，毛泽东在农讲所召开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图为汉口《民国日报》报道。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

(1927年3月26日)

同志们！被压迫的民众们，自从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赐给我们的痛苦和摧残，尤其是——栉风沐雨——手胼足胝——食不得饱——衣不得暖的贫苦！农友——和——工友，简直是有如处在——深渊——火炕，生死那得自由啊。

咳！我们被压迫的农工民众们，难道我们生来就应该受特殊阶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资本家的摧残、剥削吗？难道我们是应该固定地做他们的奴隶、牛马吗？要杀我们就杀我们，要我们坐牢狱，我们就坐牢，我们若是稍有点反抗的表示，那就所谓“大逆不道”“废弃纲常”。咳！这真是人类的禽兽世界啊。

这种狠毒、残酷的压迫，使我们真是忍无可忍了，所以近来各地被压迫的农友——工友，皆奔腾呼号地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为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奋斗，毒忍的封建阶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为拥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榨取，就大起恐慌了。不是说我们“过火”“胡闹”，就是说我们“流氓”“地痞”“土匪”。这种挑拨的手段，想着使我们成为众人之敌，继续他们的最后挣扎，更进一步地向我们贫苦农工民众进攻。于是演出阳新、沔阳、天门、汉川，与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阳新、沔阳等地的

惨案，是乡村的反革命的封建势力——贪官恶吏、土豪劣绅、大地主向革命势力——农民协会进攻，甚至用洋油烧死农民领袖，共计在“六人”以上。这种惨不忍闻的消息，是何等的令人痛心呵。

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是假革命、反革命派，向革命势力工人的群众进攻，枪毙工人的领袖，最可怜的是枪毙工人的领袖的凶首是蒋介石部下暂编第一师党代表与蒋介石的卫兵。这种流血的惨剧，蒋介石是不能不负责的。贫苦而且最受侮辱、最受压迫的农工兄弟们，反革命势力已经是联合起来很凶恶地向我们进攻了，并且他们进攻的手段非常的毒辣，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若不拼命团结努力和他们奋斗，那么我们就没有活命的日子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的时期了。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屏障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途程的。

各界的革命民众们，我们为拥护总理的农工政策，就不得不实行援助最受压迫的最受痛苦的农人与工人，以期他们得着最后的解放，早促革命的成功。

我们追悼诸位烈士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是为农工利益而奋斗，竟至牺牲性命而死！并且我们要继续着他们的血迹争斗，领导着农工民众们向封建残余势力进攻。

我们痛苦我们“同病相怜”而牺牲的同志，我们是后死者，我们是向着民间去携手的候补者！“义难容辞”“责无旁贷”啊！

我们要高呼：

农友团结起家！工友团结起众！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保障农工利益！农工武装起来！拥护总理农工政策！不打倒土豪劣绅，革命不能成功！反对农

工运动即是反革命，实行农村大革命！阳新惨案是乡村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向革命的进攻！赣州的惨案是假革命、反革命向革命势力进攻——提高党的威权！铲除封建势力！反对军事独裁！农工解放万岁！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

(1927年3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2]，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

[1]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2]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1]，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

[1]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1920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1926年3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7月至9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为了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2月12日回到武昌。图为毛泽东写作报告的地方武昌都府堤41号。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

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办法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述，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

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1]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滚一

[1]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

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

[1]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1]，坐飞机回广东^[2]了。吴佩孚^[3]

[1]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2]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3] 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0年7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24年10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1]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

[1]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1]，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利？”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

[1] 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1927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1]，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3]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

[1] 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赤贫”，是包括雇农（乡村无产者）和乡村游民无产者而言的。

[2] 指乡村半无产阶级。

[3] 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做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1] 袁祖铭，贵州军阀，1926年6月至1927年1月曾经盘踞湘西一带。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代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到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

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打倒都团^[1]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2]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3]、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1] 湖南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旧式都团的乡政机关是地主统治农民的工具。都、团的负责人称“都总”“团总”。

[2] 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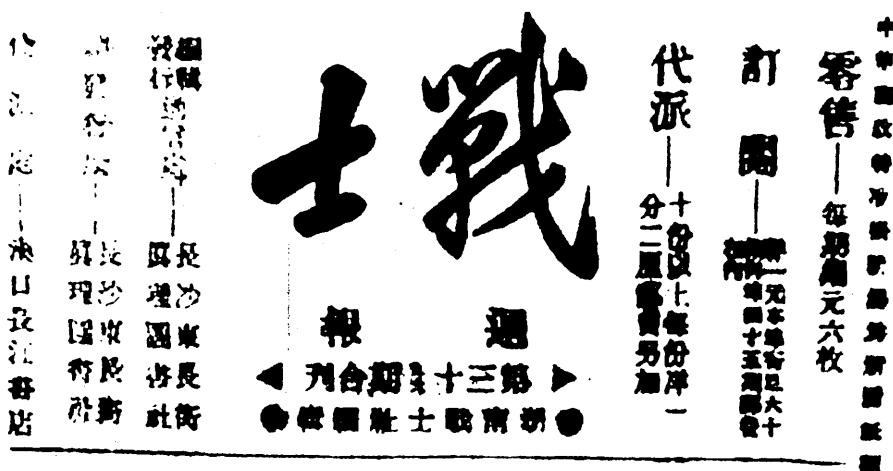
[3] 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

[1] “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三十期合刊

時事短評

上海大罷工



- 對於湖南省政府的希望 毛澤東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行 侯
『何物主財』 林 蘭
這是一種幻覺 金 軒

時事

總編室(總)——朱公(總)

- 一封未發的信——致劉梅齋先生(來稿) 金 軒
全省政黨員代表大會開會以後 金 軒
自流井女工運動的玉妥田源 金 軒
長沙農民運動 金 軒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1927年3月5日，湖南长沙的刊物《战士》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三、二月十六日，倪為代表兩湖督辦的政務委員會，召集各團體負責人，開會解決糾紛，並分配駐長沙地點，期前各處紛紛保羅代表，就於席間相押賴湘總工會委員長，將開會時，會場內果然布嚴密戒，各衙門散放步哨，如烽火敵，總工會委員長恐發生意外，不敢前往，派代表會時及與會，倪為代表於席間大發雷霆，極其怒罵，當即將其及拘押。

四、二月二十六日晚，倪為代表派駁船官兵二十餘人（我力帶者甚多）入靖州總工會搜查，捕去文續陳有善，收發和質文又工人二名，並放槍三響。

五、二月二十六日後，倪為代表派兵駐守各城門，通報靖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賀賢，封閉，鎖有千等，又派兵駐守郵局電局，阻絕靖州總工會之來往文電。

六、倪為代表召集商學各團體，組織人民救災委員會，欲扣陳賀賢等，人民救災委員會之組織，乃對待敵人之辦法，從未聞用以對待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二月十八日長沙通信）

毛澤東

（一）農村革命

一、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二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業同志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

許多農民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神十階梯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很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

贊賞不好，如你等能打倒陳賀賢，我當時常來指導你等。」工人不

服上話，又謂：「你們罵過，贊賞，便是反革命。」如陳賀賢不好，何以能訓練良好工人相繼良好工會？此不解者一；在不服倪為

代表之話以前，固是甚好之工人（早已開擴護陳賀賢人會）何以片刻之後，便變為反革命之工人？此不解者二。

靖州各工會工友為餘人，付託於代表等之職務，為要求下列條件：

（一）撤換倪為代表。（二）取消秘密通報靖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賀賢，賀詔，錢友干合。（三）釋放被捕之工會人員。（四）

撤退縣電局軍隊。（五）保證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工之

自由。（以上要求，萬惡始子尤前，使靖州工會得空因之保障，代表等代表靖州二萬工友，當效死以報。謹呈。

靖州各工會代表請願圖印
（二月十二日）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 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1]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

[1] 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 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稟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 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 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 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 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

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

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1] 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对着另一个小孩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

开鑫^[1]，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迫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1] 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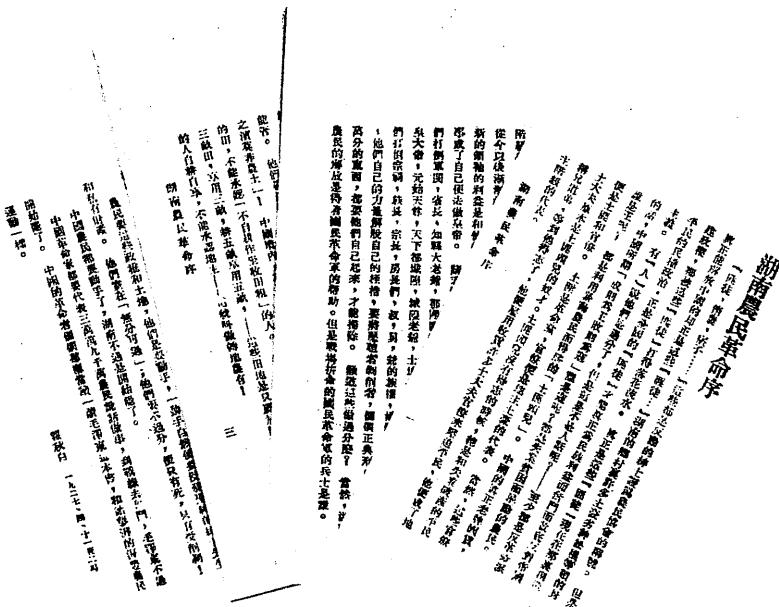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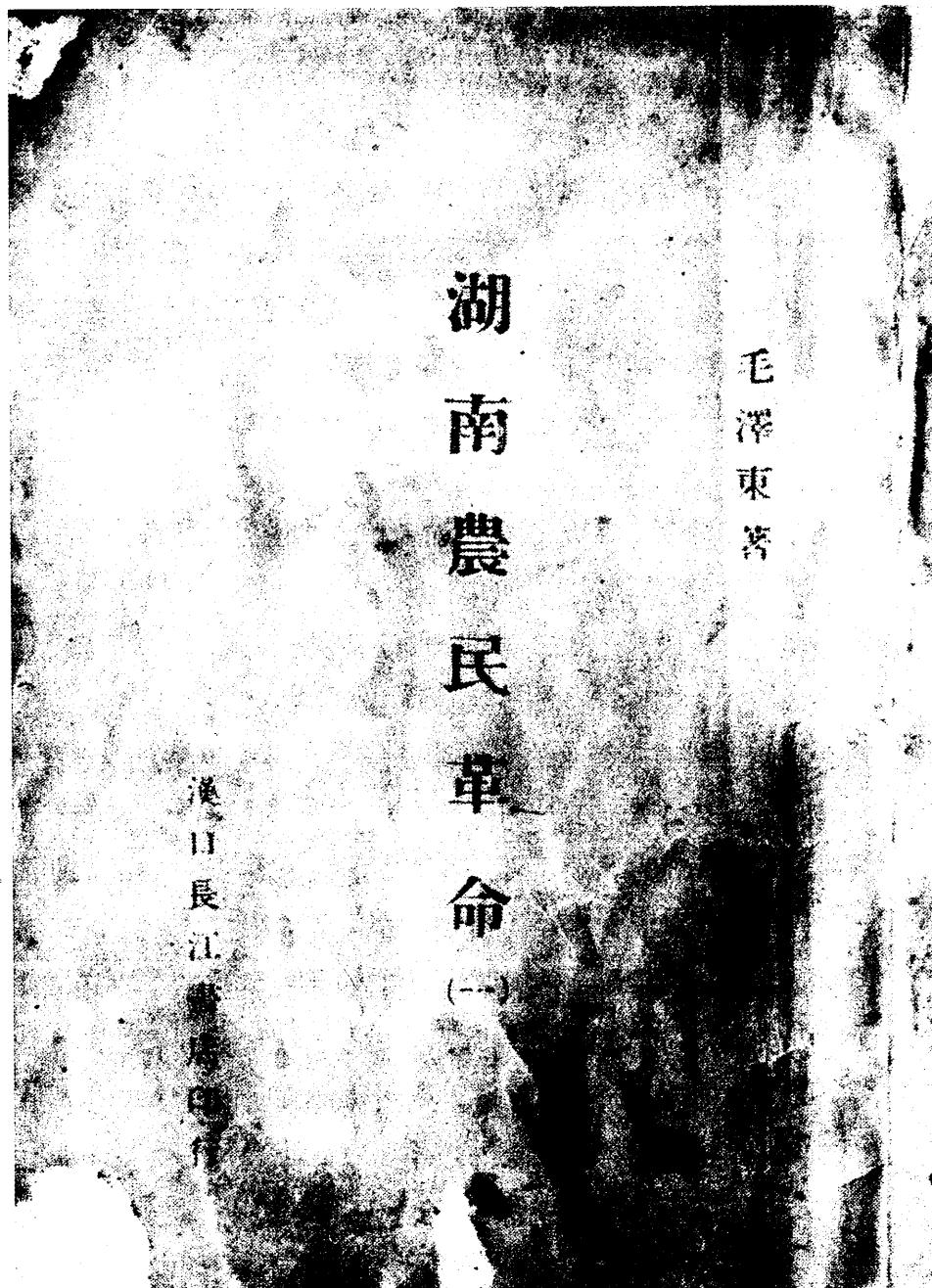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作序。



1927年，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这是毛泽东著作的最早单行本。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1]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1] 孙传芳（1885—1935），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11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1926年9月至11月，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筍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謨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镜，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

[1] 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1]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

[1] 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换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

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各种版本。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

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1]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3]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4]有什么两样！

[1] 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 张静江（1877—1950），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3] 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1927年2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4] 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春雷交响·1927——好得很》(油画)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1927年3月)

地点：湖南湘潭西乡。

时间：民国十五年。

假定事实：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十五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十五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

第一 支出之部

(一) 食粮。佃农和他的妇人每人每年吃谷七石^[1]二斗，小孩吃谷三石六斗，三人共吃谷十八石。每石时价四元，共七十二元（大洋^[2]，下同）。

[1] 本篇中的“石”和“担”，有的是容量单位，有的是重量单位，它们所表示的量各地不完全相同。均照原文排印。

[2] “大洋”（光洋、杂洋）、“小洋”（毫洋、毛洋）、“铜元”，这三种货币之间的比值，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

(二) 猪油。三人至少每月吃猪油一斤，一年十二斤，每斤二角五分，共三元。

(三) 盐。三人至少每月二斤，一年二十四斤，每斤一角三分(铜元四百三十文)，共三元一角二分。

(四) 灯油。每月煤油至少一斤，一年十二斤，每斤七分(二百三十文)，共八角四分。

(五) 茶叶。一年至少十斤，每斤二角，共二元。

(六) 工资。三十六元(此农人如不租田耕种，可往人家做工，一年可得工资三十六元，今不做工，便损失此项工资了)。

(七) 种子。每亩四升，十五亩六斗，值洋二元四角。

(八) 肥料。买牛浆，洋一元买二千四百斤，放一亩，十五亩共支粪钱十五元(如买猪粪，一元买二千斤，可放一亩，共十五元。如买豆子，每一石价九元，每一石毛谷田打豆三升，每亩有六石毛谷，应打豆一斗八升，每升价九分，共洋一元六角二分，十五亩共二十四元三角。如买菜枯——油菜子粕，每四十斤价一元，每斤二分五厘，每亩要打枯五十斤，价一元二角五分，十五亩共十八元七角五分。但豆与枯饼，种十五亩田之佃农无资格放)。又十五亩须打石灰一千五百斤，每千斤价二元，共三元。二项共十八元。

(九) 牛力。租牛，包秧下田(谓包犁好至秧可下田)，每亩租价一元，内除人工二角四分(本来租牛人工在内，但前面假定事实不加雇外面人工，故此佃农应往他家做零工弥补此项犁田人工，而于牛力租价内将人工除去)，计七角六分，十五亩共十一元四角。作十五亩田之佃农，总是自己喂了一头牛，且牛可踹粪，安得不喂？今以喂一头牛论，买一头中等牛，要费本钱四十元，依本处每元丝银百两息谷八石推算，四十元合元丝银三十两零七钱(大洋一元三

角合元丝银一两），计每年息谷二石四斗五升六合，每石价四元，值洋九元八角二分四厘。

（十）农具消耗。

（1）犁二架。十五亩田，每年要用二架犁。每架毛犁弯一角。毛犁底、犁把手、犁箭三样共一角。毛货做成犁要一个木匠工，工食三角四分三厘（木匠工价一元七工，每工一角四分三厘，伙食二角）。犁头、犁鋤四角。上桐油半斤，一角五分（每斤三角）。一犁共一元零九分三厘。二犁共二元一角八分六厘。

（2）铁耙一架。六元，可用十年，每年六角。

（3）耙头二把。每把五斤，一元四斤，二角五分一斤，每把一元二角五分。二把二元五角。可用三年，每年八角三分三厘。

（4）锄头三把。

（a）挖锄一把。五斤，一元四斤，一斤二角五分，五斤一元二角五分。可用十年，每年须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十年七角。以上共一元九角五分。以十年均分，每年一角九分五厘。

（b）田锄一把。三斤半，八角七分五厘。可用五年，每年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共含钢三角五分。五年共一元二角二分五厘。每年二角四分五厘。

（c）薅锄一把。一斤半，三角七分五厘，可用二年，每年一角八分七厘五。

锄头三把，每年消耗共六角二分七厘五。

（5）打禾桶一个。木料一元，钉子、钳子一元，木匠工八个一元一角四分（每元七工），木匠八工伙食一元六角，上桐油三斤一元，挡折一床（包做五串，每元三串三百计）一元五角。共七元二角四分。可用二十年，每年三角六分二厘。

(6) 篓筐六担。包做每元三担，共二元。可用二十年，每年一角。

(7) 络脚六担。每担百文，共六百文，合洋一角八分，只用一年。

(8) 鸟箕四担。“长携”“钩索”各二担，每担一角，共四角。只用一年。

(9) 摄箕三个。一个打禾用，一个晒谷用，一个盛米用，共值一元，可用十年，每年一角。

(10) 风车一架。六元，可用六十年，每年一角。

(11) 晒谷用具。谷筛子一，匀耙一，扯谷耙二，共一元五角，可用十年，每年一角五分。

(12) 南盘一个。一元，用五年，每年二角。

(13) 米筛二把。二元，用十年，每年二角。

(14) 推子一张。二元，用四年，每年五角。

(15) 碓一张。二元，用三十年，每年六分七厘。

以上十五种农具，每年消耗六元六角零五厘五。

按^[1]：农具之消耗固为一大项，而开办的本钱之利息乃为一更大项。十五种农具之置备共费本钱三十九元五角五分六厘，以二分月息计，每年利息九元四角九分。单农具一项已如此之巨，若将所有支出费用计算利息，当为一惊人之数，本篇均未计入。

(十一) 杂用。季节庆吊通情送礼，人客来往烟酒招呼，及此外一切零星用费，每月至少一元，全年共十二元。

以上十一项共计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

[1] 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按：衣服一项，每年三个人至少要穿六丈布（即两匹布），布价每尺八分，共四元八角，染水、缝工在外。但普通贫农的衣服都是由女人做了穿，很少耗钱买布，故上面不列。

第二 收入之部

（一）田收。每亩年获谷（稻）四石，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十分之七），自得十八石，每石价四元，共七十二元。

（二）喂猪。每年四十元（每月三元三角，至少有此数）。

（三）冬季或砍柴，或挑脚。一冬可寻钱二十元。

（四）工食省余。九、十、十一三个月出外砍柴挑脚，不在家里吃饭做事，应从支付项下除去这三个月一个人的伙食和工资。每月伙食二元七角四分（谷六斗二元四角，油一斤二角五分，盐十一两九分），三个月共八元二角二分。工资每月二元五角，共七元五角。二项共十五元七角二分。

以上四项共计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

第三 结论

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

即每年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之收入，还须假定在下列六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

（二）身体教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

(三) 精明会转计(本处会转计谓会计算)。

(四) 所养猪牛不病不死。

(五) 冬季整睛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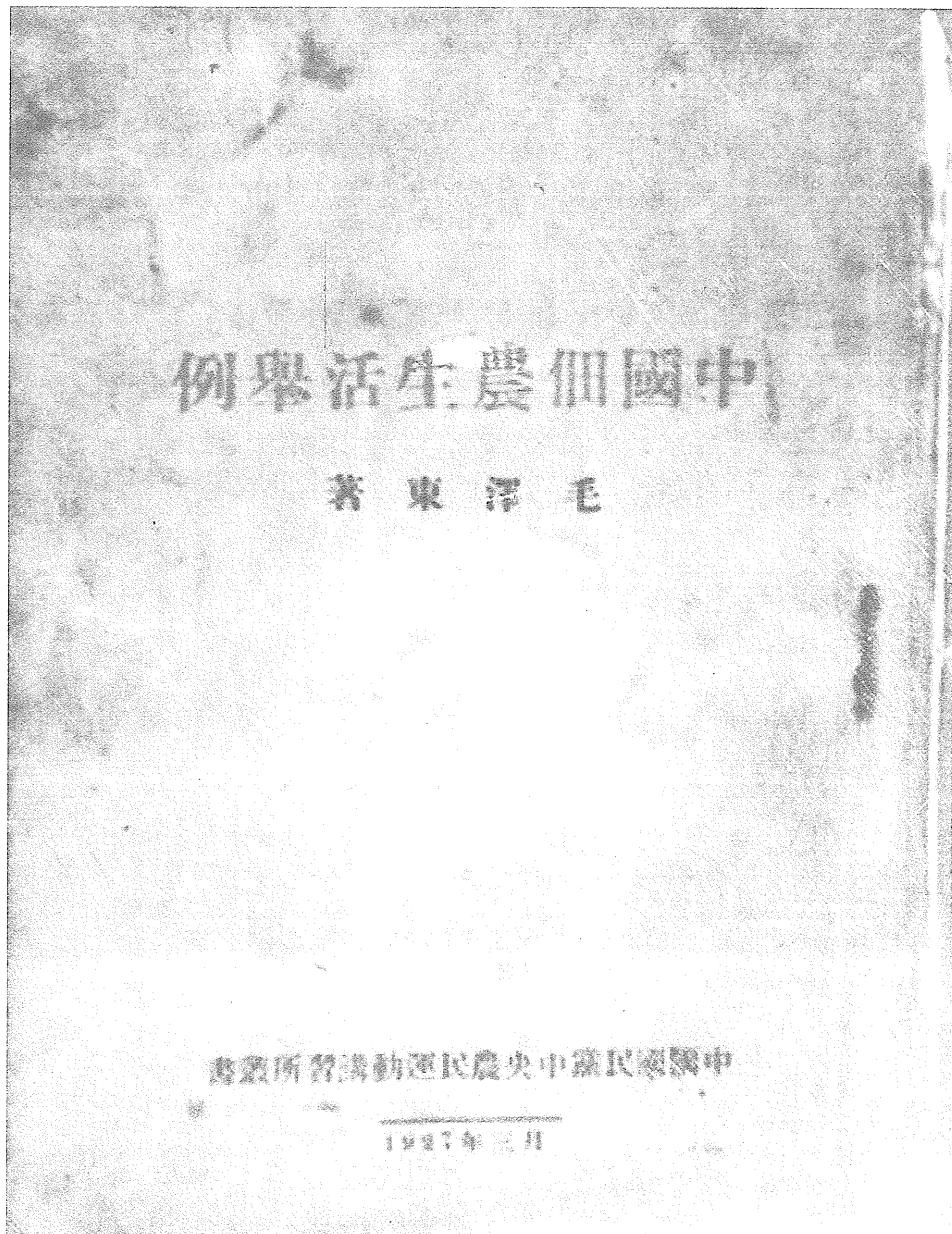
(六) 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事实上呢，六个条件具备者乃很少的，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个条件。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而冬天往往风雨连绵，害得穷苦农民大大减少砍柴挑脚之收入。至第一条之天然灾害，第二条之疾病，第四条之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第六条则表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

许多佃农每年尽其勤力所获之副业以与生活相挣扎，还觉得可以勉强遮敷不甚感亏折之苦者，则以工资一项全不计算之故。

(本文乃与佃农张连初君会谈之结果。)



毛泽东把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对佃农的调查情况写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作为农讲所学员的学习资料。

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1927年4月9日)

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各省省党部、省政府、全省农民协会、全省总工会、全省商民协会、全省学生联合会、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国民革命将士、各报馆公鉴：

全国农民运动之发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在成立省农民协会者，已有五省，成立省农协筹备处者，已有十余省，全国有组织之农民，已在一千万以上，急须有一全国之中心组织，以统一全国农民之战线。三月三十日，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容、陆沉、萧入鹄、方志敏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视事，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此为信不易之道，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封建阶级作最后之斗争，谨此电闻诸希教正。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青印

全國農協執委就職通電

前清中東當局，國民政府，全國紳士，各省公使部，省立府，全省農民協會，全省總工會，全省商民協會，全省學生聯合會，全省教職員聯合會，國民革命將士，各報紙公報，全國農民運動，三月三十日，粵湘鄂贛等省農民協會代表，及河南武漢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推舉毛澤東等十三人，為臨時執行委員會，就職視事，並排定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吾國農民之痛苦，皆為國際之發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勢。

已有五省，成立省農協，成者，已有十餘省，全省組織之農民，已在一千五百萬人以上，急須有一全國之組織，以統一全國農民之帝國主義之泛濫，與國際階級之壓迫，農民之革命，革命之成功，民革命勢力之發展農民之組織起來，同人深此不易之道，擬立革命地位，領導全國農民，努力門，以完成國民革命。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封紳階級，以最強之鬥爭，謹此電聞，數正，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時執行委員會責印，

1927年3月底，中华全国农协会临时执委会成立，毛泽东被推举为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图为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27年4月12日)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

[1] 1927年4月12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 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

(1927年4月19日)

—

政权问题，不过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切实实现本党的决议已经够了，即是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我关于土地问题有点意见，我以为这个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即：

(一)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我们确定这个意义之后，须加以大力的宣传。

(二)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土地有何标准，如何分配土地，此点实为问题的中心问题。

(三) 农民的政权与土地问题，即用什么机关来没收和分配。

(四) 土地没收了，耕者有其田了，是否禁止买卖？所以发生了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五) 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

[1]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5次发言。这个会议于1927年4月19日下午在汉口举行。

二

我很赞成主席的意思^[1]。我以为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事项。至于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农民协会时代。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个系统之下。农民协会与政府本来不同一个系统的，并且此种农民政权的行使，各省需要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村自治条例^[2]，湖北亦可开始，广东则在例外。这些条例，最重要的须规定某种人不能加入自治机关之内。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三

（一）农民政权问题可以另成一问题。

[1] 指会议主席邓演达在会上讲的以下意见：“农民政权问题，宜经下层着眼：（一）消极方面，应消灭封建势力。（二）积极方面，应建设农民自治机关。但乡村自治、区自治、县自治，均须顾到农民武力的保障，故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极关重要。故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的党和政府应设法给武装与农民，我们应作一决议，请中央由兵工厂出品中交百分之五或十与农民；第三步由农政部根据决议案，制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令公布出来。”

[2] 指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及附件《湖南区乡自治条例》。

(二) 增加土地分配之机关一项，加入上面解决土地问题纲要之内。

四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 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 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1]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 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五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 废除封建制；(二) 发展中国工业；(三) 提高文化。

[1] 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应包含下列六点，并应根据此六点草成纲要。

1. 解放农民
2. 增加农业的生产力
3. 保护革命
4. 打破整个的封建制度及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
5. 促进中国工业化
6. 提高文化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1927年4月22日)

一 原则

一、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

二、为使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必须使农民有充分的力量以取得政权及保障政权，因此国民政府应援助乡村农民对大地主及其他一切封建势力之斗争。

二 实行办法

三、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件，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

四、国民政府应督促各省政府切实执行本党历次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尤其是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案。

五、各省省市党部应从速会同各省农民协会根据上述之原则，

斟酌各该省实际状况拟具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法则，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后交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执行之。

六、为肃清乡村封建势力，防止反动势力向农民进攻起见，对于土豪劣绅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应由各省党部、省政府、农民协会及省党部所指定之各人民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以严厉方法处分之。

七、凡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兵器制造机关，应以出品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其保管及分配军械事项，由中央党部组织“人民武装委员会”处理之。

八、国民政府应从速调查各处气候水土及收获数量，确定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五十亩，瘠壤不过一百亩，在此限度之内，得享有地权。

九、国民政府应即颁布保护佃农法规。

十、国民革命军将士现有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其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事终了后，应由国民政府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其详以法规定之。

十一、关于土地问题之宣传纲领应由土地委员会拟定，呈请中央党部批准。

三 附则

本案所指土地是耕作之地，至于牧场、森林、矿山、家屋、工场等所属土地，不属于本案所指之范围。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报告的补充说明^[1]

(1927年4月22日)

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论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此为经济的。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自行分配。在财政上，土地问题不解决，亦是没有办法的，是无出路的。军阀在湖南，是剥削农民的。国民政府到湖南后，仍未能完全免除剥削，因战争关系，财政上不能不继续旧政策，此种情形，恰与现在革命发生矛盾。如没有出路，革命必遭失败。现在的财政如登记税是收不到，田税是有许多不缴纳的，苛捐杂税，更不能收。故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对全般革命有利益的。如湖南照现在的财政政策，每年收入不过千余万（十四年由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左右）。若土地问题解决后，以田税百分之十计算，即可筹得五千六百万，并且可增至百分之十五，如此财政之困难立可解决。故为解决财政困难，土地问题如不决定，是无出路的。尚有自耕农中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富农是要没收的；如十家之内五家是富农，即须将

[1]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邓演达代表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岳尔克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这是毛泽东对草案的补充说明。

富农土地分给其他五家。湖南的农民，现正在自己分配，自己开会分配。所以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故国民政府应明令定这样的法规（属于普通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如湖南）的法规。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当然不同。故一步做到经济没收，往往又与客观情形不称。……兹读中国土地调查，此表比较确实，可资参考。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关于讨蒋通电

(1927年4月)

各省区各特别市党部、海外各党支部，并转各级党部、各省政府，并转各级政府机关、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方面军指挥、海军总司令、各军长，并转各军全体将士、总政治部，并转各级政治部、全国各报馆，并转各民众团体及全国民众均鉴：

顷阅蒋中正巧日通电，知其已由反抗中央而违于自立中央。蒋中正此种阴谋，警之已久，由其平日以中央为傀儡，及见中央所为不便于一己之私，于是始则纠集督军团式之会议以示反抗，继则纠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谋分裂。同人对于蒋中正此种阴谋，虽早已觉察，惟调查已迟，及今横决，始谋堤障，实所疚心。蒋中正通电辞气之间，犹以劳苦功高自矜试闻北伐以来，牺牲无量数同志之血，虽否为蒋中正一人成就功名。□进吴佩孚、张作霖辈，以战事自矜，颐指政府，其结果遂使北京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蒋中正欲师其故智，其如革命的民众已非复可欺，徒见其不知景而已。同人民有欲为革命的民众告者，蒋中正所以反抗中央，自立中央，自其抵沪以来，首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相见之礼物。明知此种行为，必中央所不许，故不得不出于反抗中央之途。对于持正不附逆之军队，则以总司令名义，骗之出战，而

绝其援应，委之于敌。对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则随意逮捕，拘囚杀害，对于各省市党部党员，则嗾使走狗横加摧毁，迨至异己渐去，狡窟已成，则悍然自立中央而无所顾忌。于是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彼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民众，将无噍类。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加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各国民革命军□此厚辱，临电痛愤，不□欲□。

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政府委员
军事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 谭延闿 孙科 徐谦	
顾孟余 谭平山 陈公博 吴玉章 唐生智 邓演达		
宋子文 程潜 朱培德 张发奎 宋庆龄 何香凝		
林祖涵 王□□ 陈友仁 经亨颐 于树德 杨匏安		
恽代英 彭泽民 毛泽东 许苏魂 夏曦 黄实		
董用威 詹大悲 王乐平 陈其瑗 朱霁青 高语罕		
陈璧君 江浩 潘云超 邓口修 谢晋 孔庚		



1927年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图为蒋介石军队关押的民众。

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

(1927年4月)

一、全国农户五千六百万（地主在内）平均每户以六人计，共三亿三千六百万人。上数以百分之八十为农民比例计算，则中国全人口为四亿二千万人，若此数是确实的，则上列农民数是确实的（此是根据俄同志及外国人的调查）。

二、中国全国面积内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已耕种的土地。东南沿海几省人口超过于能耕之地积，以山东论，每一 acre（英亩当中国四十余公亩）住六百人，因此地价地租均甚高，因人多地少及租高农民有钱只能应付生活及付地价，无力发展农业技术。因此，技术很低，已经表现生产衰落的危险。

三、三亿三千六百万农民中：

(1) 有土地的农民（有一亩起以至大地主）在一亿二千万至一千五百万；

(2) 无地的雇农约三千万，游民、土匪、兵士、无固定职业之乡村小商人共约二千万；

(3) 全体农民三亿三千六百万中，减去有地的农民一亿五千万及无地的雇农三千万，游民、兵匪等二千万，剩下一亿三千六百万则是无地而租人田地的佃农；

(4) 依上统计有土地的一亿五千万占农民总数百分之四十五，

无土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共一亿八千六百万，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五；

(5) 以此知农民之多数是完全无土地而要求得到土地的。而且有地的农民中，又有许多是土地不够的，他们也是要求土地。

四、有地的农民（百分之四十五）中：

	亩 数	人 数	占 地
贫 农	一至十	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六
中 农	十至三十	百分之二十四	百分之十三
富 农	三十至五十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七
小中地主	五十至一百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九
大 地 主	一百以上	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十三

富农及小中地主及大地主三项人数共占有地农民中百分之三十，而其土地则占全数土地中百分之七十九。

五、以有地无地农民全数论：

(1) 无地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五

有地而地极少的贫农（一亩至十亩的）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七十五均是要求土地的；

(2) 有地十亩至三十亩的中农占百分之十二，他们不需要为土地而争斗，不反对贫农取得土地，反能帮助贫农；

(3) 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三。

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1927年4月)

一、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由区乡土地委员会没收，并分配于土地不足之农民。

二、农民分配土地以每户人口为标准，每人所得土地之数，又以年龄为差等。

三、土地之分配以乡为单位，但没收土地之数额甚大者，得以区为单位分配之。

四、区乡土地委员会由农民领导的区乡自治机关派员组织之，为区乡自治机关之一部分，负没收、分配、登记并管理第一条所述土地之责。

五、县省国三级政府均应组织土地委员会，县省国农民协会各得派代表参加。

六、没收并分配于农民之土地，其地租由区乡自治机关经收交于政府，租额由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商同全国农民协会定之。

七、没收并分配之土地禁止买卖。

八、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根据此决议制定一法规公布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图为大会举行开幕式的地方——武昌都府堤20号。

土地委员会报告

(1927年5月9日)

土地问题不独在革命理论上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事实上现在亦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湖南农民已有自动起来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的行动，广东、湖北、江西等省农民代表大会，无一不对于土地问题表示亟待解决的要求，甚而在奉鲁军阀压迫下的直隶农民，因为“旗地变民”的问题，也不知闹了多少次的冲突流血。再就政治上的观点看，革命运动，现时确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同时也伏着绝大的矛盾和危险，财政无法解决，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问题，这些矛盾和危险，亦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得一个出路。本党为着领导群众，为着保护革命，所以特别组织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这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土地委员会成立之后，已先后开过许多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了相当的结论，现在将讨论的经过，作一简括的报告如次：

土地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开了三次会议，觉得问题太重大太复杂了，非征集各省的材料和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遽尔得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开了三次会议后，即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共开会五次，后来为便利讨论起见，更组织专门委员会，负审查各种决议草案的责任，共开了四次会。扩大会议出席人数，最多者有四十人，少亦十余人，自四月十九日起，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至五月六日，再开

最后之第五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之同志代表十五省区，报告共四件，决议草案共七件，对于解决土地问题，虽未能得到十分完满的办法，但在革命进程中，亦算得尽了相当的责任。兹更分述会议经过如下：

(一) 开会的次数：

1. 委员会本身开会三次
2. 扩大会议五次
3. 专门审查委员会四次

(二) 出席同志：

1. 本委员会委员
2. 中央各委员
3. 各省区党部负责同志
4. 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同志
5. 军事负责同志（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或秘书）

(三) 出席人所代表之地：

1. 湖南
2. 湖北
3. 广东
4. 河南
5. 直隶
6. 山东
7. 安徽
8. 江苏
9. 浙江
10. 福建
11. 热河
12. 奉天
13. 察哈尔
14. 吉林
15. 山西

(四) 报告：

1. 俄同志达哈诺夫报告俄国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
2. 全国土地分配之概况
3. 直隶省党部报告该省土地分配情形
4. 热河省党部报告该区土地分配情形
5. 其他各省党部同志报告各该省土地情形

(五) 讨论之中心问题：

会议中根据各方面之报告调查及目前革命的需要，土地问题亟待解决，已为众所公认。但解决办法，是否立刻全部土地悉数没收为国有，抑为部分的没收，颇多讨论。结果认为理论上土地须全数收归国有，本毫无疑义，但目前客观事实，全国的政治环境及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做到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地步，在现在的客观事实中，只能做到政治的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尚未能完全消灭，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亦非中央会议所能详细规定，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应斟酌各省实际状况，由各省自行拟定。故会议之结果，有下列各决议案：

（六）决议案：

1. 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
2.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3. 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4. 佃农保护法决议案
5. 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
6. 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
7.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以上为土地委员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情形，所有各种决议案，尤其是4、5、6、7各决议案，土地委员会认为是适合本党目前的策略，与客观事实的需要，应由本党定为法规，分别颁布施行。是否有当，敬候

钧会详为核夺为荷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

附：

(一) 决议案七项

(二) 会议纪录一本

土地委员会委员 邓演达 谭平山

毛泽东 徐 谦 顾孟余

十六年五月九日

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

(1927年5月26日)

限即刻到。湘潭、湘乡县农民协会探转省农民协会、全省总工会鉴：

政府已派五委员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长沙事变，本日晨起程，望转告全省工友农友静候政府解决，避免冲突为要。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农民协会叩
宥印

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

(1927年5月29日)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皆为农民，其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与剥削，最为酷烈（田租苛捐之负担往往占其收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所以他们的革命要求，也最为迫切。过去的事，已经充分证明：农民因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或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职任，即在领导此主力军以完成农民的解放，亦即国民革命的成功，因为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欲达到此目的，客观上最后必须实现耕者有其田，始能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政治基础，而解放全中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

自从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确定扶助农工之政策以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历次之训令、议决案及宣言，对于此种政策，屡经厘定，承认农民减租及乡村自治的主张，更日见其具体化。因此全国农民，尤其是粤湘赣等省的农民，尽力拥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战，革命势力乃得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更将发展到黄河流域及中国全部。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湘鄂诸省农民获得相当的自由，更认识打倒军阀，不仅在打倒拥兵自卫、勾结帝国主义、压迫民众之个人，而在根本消灭军阀之基础——农村

的土豪劣绅。农村之土豪劣绅在一乡之中不啻小军阀，其常为大军阀之爪牙，尤为人所共晓。故当国民革命军与吴赵军阀搏战于沙场之际，亦即农民与豪绅搏战于乡村之时。农民之向土豪劣绅猛烈攻击，实所以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土豪劣绅深知此种争斗，为其生死关头，亦即用尽各种残忍手段，竭力反抗。于是各省农民之鲜血，乃满溅于土豪劣绅之手。农民欲求自存，欲求保障国民政府所付与之自由，乃迫不得已用革命的方法，回答土豪劣绅的反攻，此实为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此与国民革命军在革命战争时之军事紧急行动相同，实属无可非难。

革命势力愈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激烈，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等，更尽力扶植土豪劣绅，以摧残农民运动。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即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加以蒋介石及土豪劣绅等，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遂愈益激起农民的愤怒，使其不能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谋反抗，而图自存。同时过去的斗争，只是限于一个地方，未与全中国的革命过程，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革命战线，大形纷扰。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过去未及时实行对于农民的宣言、决议，使每个农民，皆知政府和革命军实系代表农民利益而奋斗，因此，在国民政府保护军人财产之命令未颁布以前，少数农民的行动，有时不免侵犯革命军人之利益，蒋介石辈及土豪劣绅，更乘时造谣，挑拨离间，或且故为左倾之煽动，随又诋毁农民运动。原军事式之紧急战斗行动，至革命势力确有优势之时，理应开始新的建设时期，农民运动，亦是如此，否则长此以往，反将障碍农民运动的发展，而被反动派所利用，以危害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巩固。

中国农民运动，到了现在，已有相当的发展，尤其是湖南湖北，必须采用新政策，始能适合新环境。此新政策首要的，即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以乡而论，此种民主政府，虽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群众，均得充分参加乡民会议及乡村政权，余则可以类推。

此种乡村民主自治机关建设之过程中，第一，必须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务使农民政权，可以完全由此种机关行使，举凡逮捕罚款等事，均由此种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自治机关，建设司法机关，按照国民政府的法令办理。第二，关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的家属——至多亦不过是小地主。在经济上应与农民一致获得解放，在政治上与农民同立于打倒反革命之战线；自然他们理应赞助农民之建设民主政权，所以农民协会，应当指导农民，力求与之合作，而乡村自治机关，对之更能切实保护。第三，乡村民主自治机关之成立，为唤起农民，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之有效方法。因为一方面可以由此种自治机关，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继续与土豪劣绅斗争，并辖治压迫剥削农民之土豪劣绅，使不得逞其凶残。他方面则此种乡村自治机关，既在国民政府行政机关系统之下，必可以使国民政府得到更深厚更广大的社会基础。第四，欲农民民主政权之确立，必须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群众，统一其指挥以保卫其利益，而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更可以使农民自卫军成为国民政府所承认所管理之保护村间治安的唯一武装势力，其他民团团防等组织，均不应任其存在。第五，改良贫农生计，亦为乡村自治机关成立后之主要任务。自乡村自治机关至国民政府，均须竭其全力，以求得此项问题之解决其具体方法，为设

立农民协作社及农民银行，无土地者及土地少者，设法使之得有生计与以田地，并使农民得到资本及工具，以冲破反革命派的经济封锁，振兴农村生产，关于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的规定则须遵照国民政府政策执行。第六，食米问题，从前因为没有良好的办法，又有奸商土豪从中操纵，农民为保障自己不致饥饿起见，往往不得不阻谷出境。今后则须由乡村自治机关解决或由乡村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共同解决。因为此等机关，对于乡村的需要，容易精详计算，对于革命军之军米，尤须尽量供给。并可在不妨害民食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之金融，购买必须的物品。第七，在乡村自治政府成立后，尤须切实施行佃农雇农保护法，以保障佃农雇农之生活。

要使这些工作，完全实现出来，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不然，革命初期农民运动的原始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则农民已得的革命胜利，不惟不能保障，而且有被反动派利用而摧毁之可能，或将因而大受挫折。

上述各事，关于农民运动的前途，至为重大，为此训令该省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并录令通告各县区乡各处，使农民群众彻底了解目前的新政策，以便努力工作。并将执行情形，具报本会，是为至要！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沉

在太平洋劳动会议^[1] 代表欢宴会上的开会词

(1927年5月31日)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国际帝国主义者，为反对中国革命，已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沿岸工人首举义旗，反抗此残酷之屠杀。中国农民自当更加团结，追随其后，作殊死战。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过程中主要的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1] 太平洋劳动会议，此次在汉口举行，其意义非常重大，是故全国农民协会及省农协，于5月31日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开会欢宴。武阳夏三县农协亦参加，计到会者全国农协为毛泽东，省农协有陈荫林、符向一、郭树勋、邓雅声、武阳夏代表百余人。来宾方面，有太平洋劳动代表28人。毛泽东在会议上致开会词。

湖北省兩農協歡宴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

△五月三十一號在普海春飯店

△賓主百數十人均有極重要之演說

太平洋勞動會議，先次在漢口舉行，其意義非常重大，是故全國農會及省農協，於五月三十一號假座漢口普海春開會歡宴，武昌夏三幹出席，公加，計到會者全國農協主席毛澤東，省農協有陳隆林、符向一，郭樹財，鄧穎蓀，武昌夏代表百餘人，來賓方面，有太平洋勞動代表二十八人。首先由毛澤東致開會詞，略謂：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過去只有空洞之口號，現在今天歡迎會上已充實了此口號的內在性，國際帝國主義者，反華中興軍命，已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沿岸工人首舉起成，反抗此殘酷之統治，中國農民自當更加團結，追隨其後，作殊死戰，中國農民運動，是革命進程中，不可少的一力，尤須與全世界工人聯合方可勝也。深願工人運動團之，以濟與振興，這證明是工人天然成為農民之領導者，今天中國農民能為深感榮幸及領袖之精神，其有本於革命前途，實在深可樂觀。

1927年5月31日，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参加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出席并致开会词。

全国农协致陈嘉佑电

(1927年5月)

郴州陈军长勋鉴：

庚电奉悉，移镇湘南，誓师讨贼，革命前途，实□□赖，尚斯努力奋进，全国革命民众皆为公之后盾。

全国农民协会 叩

全国农民协会要电六则*

(1927年5月)

电一

长沙各报馆转长沙全体武装同志均鉴：

自从蒋逆叛变以来，即派大批走狗，造谣生事，以图离间革命势力，传闻长沙驻军，不幸误听反动派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并将各机关负责同志屠杀十余人。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亦且弁髦政府，扰乱北伐后防。敝会闻讯，非常惋惜！革命军队，既为人民武力，武装同志又均来自民间，为农民工友同为革命战线上之亲爱弟兄，其间决无若何仇怨。即有误会，亦当请示政府，从容解释。今竟然箕自煎，何殊助敌杀友！返躬自省，当为怃然。尚望惩前毖后，静候国民政府解决，万不可一误再误，有辱令名，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谨电布达，无任神驰。

电二

西平唐总指挥钧鉴：

同志切实遵守总理主义，坚决拥护总理政策，久为革命民众所共见。迩来报章所载同志拥护三大政策之通电，尤令全国民众钦仰

不置！不料长沙驻军，误听反动派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协会武装，并屠杀各机关同志十余人。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更属直接扰乱北伐后防。敝会闻讯，非常震悼！同志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应请迅电湖南省政府从速宣布事变真相，慎重善后，是为至盼！

电三

湖南省政府钧鉴：

蒋逆叛变以后，即派大批走狗，造作种种离间革命势力之谣言，传闻长沙驻军，不幸误受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自卫军武装。遥听恶讯，不胜悲愤！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抑且直接摇动北伐后防。敢请迅将事变真相示知，并盼慎重善后。

电四

西平、上蔡一带探送唐孟濂、邓泽生、张发奎诸委员钧鉴：

长沙驻军，轻信谣言，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自卫军武装。本会对于此等重大事件，究竟应若何主张，即盼飞电示知。至为盼祷！

电五

驻马店四军十二师政治部李主任钧鉴：

皓电奉悉。敝会已与后方各革命团体组织慰劳伤兵委员会，专负慰劳救护负伤同志之责，请转知前方全体将士安心杀敌为盼！

电六

西平、上蔡一带探投唐总指挥、靳总司令、张军长并转前敌全体将士钧鉴：

迭奉捷音，欣悉奉逆精锐，已为我忠勇之将士歼灭殆尽。从兹肃清河南，直捣幽燕，指顾间事耳。谨电奉贺，并望继续努力，彻底肃清奉逆及一切剥削压迫农民之土豪劣绅，以荡涤北方之瑕秽，而解放幽燕之民众。敝会誓率全团农民一致为我全体将士之后盾。

菩薩蠻·黃鶴樓^[1]

(1927年春)

茫茫九派^[2]流中國^[3]，
沉沉一线^[4]穿南北。
烟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5]

黃鶴知何去？

[1] 黃鶴樓，舊址在湖北省武昌市區之西長江岸邊的黃鶴磯（一作黃鵠磯）上，即今武漢長江大橋南端西側。樓在歷史上曾幾經毀壞修復，1955年修建大橋時拆去遺留建築物，1985年6月在重新擴建後開放。《南齊書·州郡志》說有個叫子安的仙人，曾騎黃鶴（即鶴，古“鵠”“鶴”二字通）經過黃鶴磯。《太平寰宇記》說騎鶴仙人叫費文袆，一作費袆，每乘黃鶴到此樓休息。樓因此得名。許多文人曾題詩抒慨，唐崔顥的名句“黃鶴一去不復返”，尤為歷代傳誦。作者借這個題目，抒發了革命家的截然不同的感慨。

[2] 九派，派，水的支流。相傳在長江中游一帶有九條支流同長江匯合，所以稱“九派”。鮑照《登黃鶴磯》詩：“九派引滄流。”

[3] 中國，指中國的中部地區。

[4] 一线，指當時長江以南的粵漢鐵路和以北的京漢鐵路。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建成，兩條鐵路已接通，改名京廣鐵路。

[5] 龜蛇鎖大江，龜蛇指龜山和蛇山，蛇山在武昌城西長江邊，龜山在它對岸的漢陽，隔江對峙，好像要把長江鎖住一樣。

剩有游人处。
把酒醉滔滔，^[1]
心潮^[2]逐浪高！

[1] 把酒醉滔滔，醉是古代用酒浇在地上祭奠鬼神或对自然界事物设誓的一种习俗。这里是对滔滔的长江表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2] 心潮，作者自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8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茫茫九派流中國，一葉舟
南渡。細雨霏霏，東北風
大江，萬鶴，知何去，乘此快人
心杞。江山如此，浪淘風
揚子江，調萬象，俱爲我
主。一九三七

毛泽东手书《菩萨蛮·黄鹤楼》。



《心潮逐浪高》(诗意图)

农运策略*

(1927年6月1日)

各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

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口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

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国民政府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

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地发展。因此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

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

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得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一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

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

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驱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

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

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重任，要在最近口期间开始执行。

七、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出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对，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突。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官财，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口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口与以正确的指导。

八、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地实行，

而对于肃清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

须以农民群众为骨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彻底地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继续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

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

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

九、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

(1) 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

(2) 按照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

(3) 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

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口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

(4) 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

(5) 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

(6) 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增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

十、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

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分、农协机关的成分，都缺乏精确的考察；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察；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

十一、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分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

十二、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1) 必须

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分，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

(2) 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之基础。

(3) 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团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争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

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

中央常务委员会 安中原

中央农民部 宗容民

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

(1927年6月3日)

(衔略) 均鉴:

许克祥借口湖南农工运动过火，于上月马日在长沙围攻工会农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之武装，屠杀革命同志，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搜查教育机关，封闭长沙师范，驱逐查抄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劫夺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七万元，并仿蒋逆介石举动，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以破坏各级党部农工运动。过火与否？与党部、学校究有何项连带关系？建设厅长与教育厅长，岂亦为所谓暴徒？而须遭其放逐、抄查。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之劫夺，湘鄂交通之阻碍，尤为扰乱北伐后防。此等举动，即谓出于误会，而其破坏革命纪律，违抗军令及政府，则已昭然若揭！其结果不仅工农备受其摧残，中央威信亦为之扫地！省政府更在胁迫之下，形同解散，是完全反革命之行动也。初期民众运动，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原为革命同志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此而离开工农，更无论借口而加以压迫。即有意见，亦当绝对尊重党纪军纪，呈请政府办理。农工为革命之主力军，国民革命之目的，即在解除农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痛苦。是以本党从前有禁止武装袭击农民之决议，最近更有保护工人纠察队之命。许克祥何得故违法令，举兵袭击工

农，解散工农纠察队，一如蒋介石在沪宁之所为乎？至工农运动中，发现幼稚行动，原为政治指导尚未完全强固之民众原始现象。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对之早已拟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何图许克祥不守党部政府办法，擅用武力，横施摧残，解散党部，实行政变，显系目无政府，扰乱北伐后方，破坏总理农工政策；响应蒋夏诸逆，欲由湖南发动，推翻武汉革命根据地。事变以后，中央特派专员赴湘查办，复被许克祥拒绝。唐总指挥敬电指示解决方法，极为得当，亦抗不遵行。近更愈演愈烈，派兵袭击湘潭、常德等处口口口屠杀，是许克祥不仅为三湘工农之凶手，更已成全体武装同志之罪人，全国民众之公敌。曩者国民政府，尚未明令讨伐，原期其幡然悔悟，勒马悬崖。今彼竟公然拒绝调查，违抗唐总指挥命令，倘若再予姑容，则彼或将误认为政府默许其行动，而日益凶横，愈难制止。若然者，不惟湖南革命势力将被其消灭净尽，各地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亦将继之而起，使北伐之进展，及整个革命前途，均受极严重之打击。敝会为防止反动势焰之高涨，保护国民革命之胜利计，谨率全国一千万有组织之农民，恳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予免职查办。倘许克祥犹复不知修改，则请明令讨伐，肃清乱源，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全国农民协会江（三日）叩。

长沙湖南省政府勋鉴：

奉读卅电，骇异万分！民众运动之初期，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完全免去，原为革命同志所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噎废食，抛弃民众，甚或借口压迫。即有意见，亦应尊重党纪军

纪，呈请政府处理。此贵省政府唐主席之正当主张，民众与军人均应恪遵。事实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以及敝会，对于匡救民众运动初期之原始现象，均已厘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许克祥借口以谋叛，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封闭长沙师范，蹂躏教育机关，驱逐查抄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擅自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等反革命事迹，昭昭在人耳目，万难以巧辞掩饰。然长沙一隅，既为许克祥所盘踞，中央特别委员会，犹被阻止；唐总指挥电令，犹被窜改；省政府委员家属，犹被抄查。此等暴行，试问于农运何涉？卅电当系许克祥滥用政府名义所发，出言背谬，无怪其然！惟许克祥已为党部政府民众之公敌，敝会业已电请政府免职查办，贵省政府诸委员，虽不幸被其劫持，并宜设法自拔，除此元凶，以救党国。谨贡忠言，幸采纳焉。全国农民协会江印。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1927年6月6日)

各省委鉴：

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毋得息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分之缺少农民，致会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得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

（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现

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地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地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得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

（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运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协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地规定适当的物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决不可过于恐吓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

（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谨慎出之。

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地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地实行改选，一方面必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地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数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

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及将发布的第二号训令，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

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

厉执行，至要！至要！

安中原

宗容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全国农协请颁布乡村自治条例*

(1927年6月7日)

一 致国民政府农政部函

敬启者：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即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与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词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克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

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钧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之无政府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式，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除请中央及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外，理合备文函达。钧部职司农政，务盼迅予根据本党扶助农民之政策及民权主义，拟具乡村自治条例，提出国民政府颁布施行，实为公便。此致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谭。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二 致中央党部函

敬启者：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

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辞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克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农政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无政府之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式，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谨恳钧会，令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声，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三 呈国民政府文

为呈请事。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

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即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与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辞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免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农政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之无政府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势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谨恳钧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俾农民有所遵循，努力建立县区乡自政权，以慰全国人民喁

嘱之望，是否有当，仍请训示指导，谨呈国民政府。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1927年6月7日)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一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亦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是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 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做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地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

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 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为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地扶助商业之发展，以妨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1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 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 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

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 加紧宣传工作，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全国农协最近训令

(1927年6月13日)

为令遵事。农运过去因发展过速，组织上未所健全，加以土豪猛力反攻，遂使农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明令各级农协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协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继续与一切土豪反封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赣鄂三省中土豪进攻非常猛烈，党员农工人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于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污起而与土豪互相响应，共同捏词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贡冈农协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污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阀贪污土豪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国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词之传言，谨为审查勿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城土豪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污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

谋亦后层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及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情形下，各级农会极应一改请求国府（一）明令保护工人组织及工纠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口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CP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劣，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羽昆，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湘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收湖南请愿团之请愿，并令湘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CP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协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劣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之挑拨离间。因为土劣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六月十三日

农运策略的说明*

(1927年6月14日)

各省委特委临委鉴：

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五次大会之土地问题决议案，而具体地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于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部议决案的原则。

一 政权问题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自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

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然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抗。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农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权、选举权；第二，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条件。第三，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是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的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之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

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利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权利。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地加以纠正了，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地建立起来。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保卫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

农民不仅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

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为民选委员制。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民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地提高。

二 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巩固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提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取得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别注意，必须

明确地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志；在湘鄂赣三省则除根据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营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除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

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彻底求得解决，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阶段。

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点；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地实行。

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源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地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

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成为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

三 武装问题

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

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的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劣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 武装问题之决议案

- (1) 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
- (2) 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镖、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
- (3) 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 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军，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 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可，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 不能实行以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转移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来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4) 全国农协会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

(5) 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

(6) 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

(7) 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

(8) 应有计划地、经常地宣传□□□□□□□□□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

四 组织问题

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意思，应当十二分地注意。农民协会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甚清楚的地方，有的豪绅会联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我们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础。而应以佃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础。经济落后的地区，小手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

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国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进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五 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富农及知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知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使其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

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但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

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的联合战线，具体地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地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

六 会党问题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的感情很好，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如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里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惩处其首领，不要傍及群众，以防御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急，只宜以具体事实去暴露其首领，不能彻底为农民而谋利益的罪恶。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此。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而不能放任

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此。

七 国民党问题

从前农民对于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劣绅又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地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其实行。至于国民党部的农民部，第一，应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将统一于全国农协之下。但如国民党欲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部分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方农民以为国民党的名字都是革命的。

八 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少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

部则至少应有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地逐步筹划。

九 青年工作

CY 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 CP 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

十 协作社

协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协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盘剥、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而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协作社的人才，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从速创办协作社，以辅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 协作社之决议草案

1.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利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2.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

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

3. 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一、二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中得以减少压迫。

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取如下之方式：（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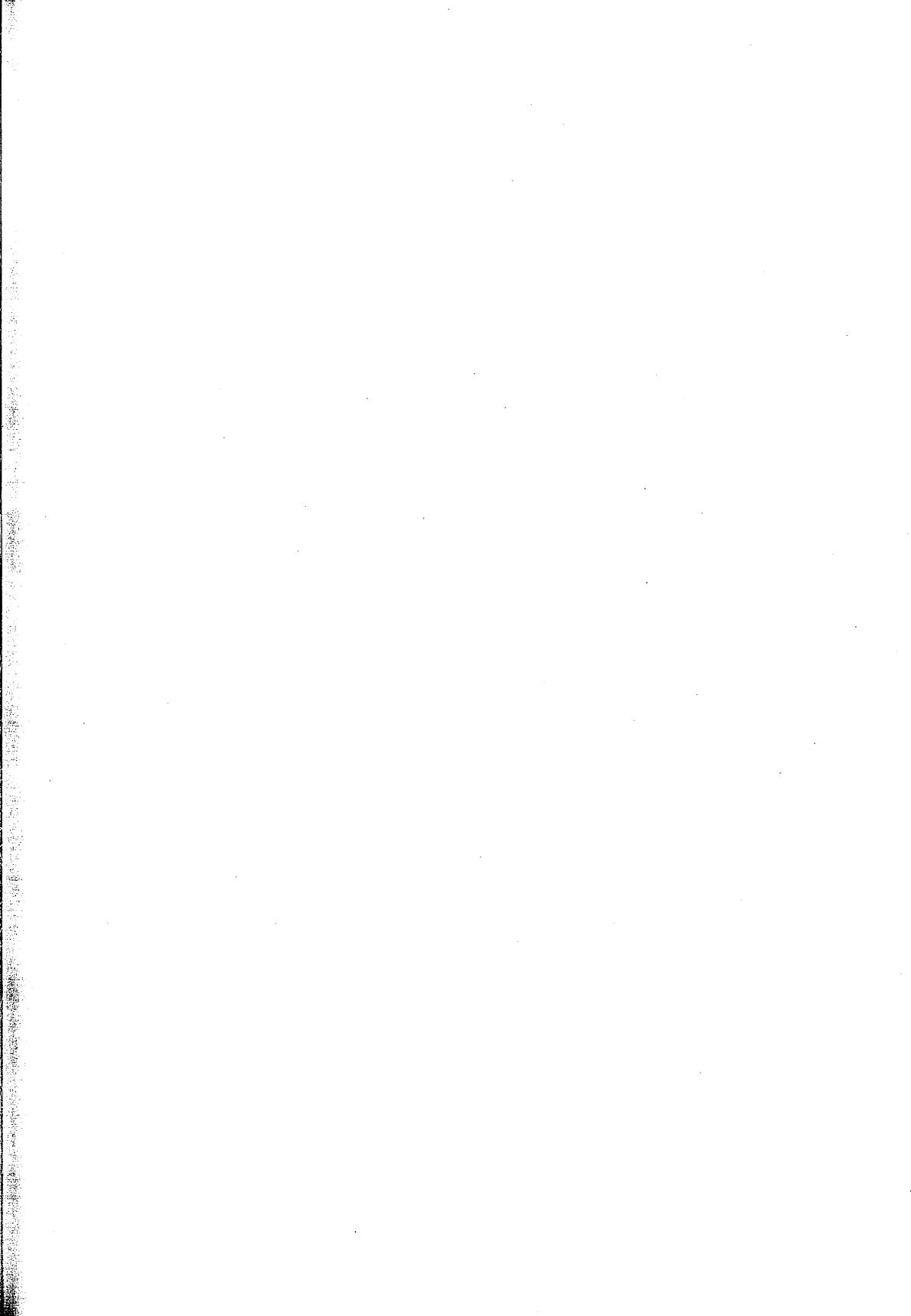
4. 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协作社自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

5. 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资产阶级及

压迫者之影响。同时，合作社社员，虽然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入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需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

6. 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掠（如英国集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尚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是要成效很快。这种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在那个有农产品输出的乡区（棉花、茶等），我们可以组织交易合作社。在目前最困难组织的为农民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农民社会事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形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

7. 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较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工业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46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 \$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